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福祥传/丁明俊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9

ISBN 7-227-02183-1

I. 马… II. 丁… III. 马福祥(1881~1932) — 传记

IV. K828.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670 号

马福祥传

丁明俊 著

责任编辑	何志明
封面设计	胡国旺
责任印制	白芝蕴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地 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网 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rs @ public.yc.nx.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25
插 页	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5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2183-1/K·236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出身传统穆斯林世家

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

马福祥的家乡河州是我国有名的西陲重镇,距甘肃兰州市西南约 100 公里,是我国回、东乡、保安、撒拉等穆斯林民族主要聚居区,解放后成立临夏回族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地临夏市,归甘肃省管辖。

由于临夏土地肥沃,形势险要,且地联藏区,是古丝绸之路通往西南边疆和中原大地的重要孔道。加上历史上战争、移民、屯田和茶马互市等原因,到明清时期逐渐发展成为西北地区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一个贸易中心与货物集散地。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许多穆斯林或经商、或传教落脚河州,并定居下来,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心也逐渐移到河州并盛行起来,至清末,河州便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伊斯兰教发展活动中心,故河州始有中国“小麦加”之称。

这里有千余座清真寺、拱北、道堂分布在各村镇,有些清真寺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闻名遐迩。这些众多的清真寺琼楼玉宇,辉煌壮观,风景各异。有的庄严雄伟,绚丽典雅,有的苍松翠柏,林木掩映,有的雕梁画栋,肃穆静谧,充分体现了中国回族特有的文化艺术氛围和独特的建筑风格,也显示出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清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人员日益增多,河

已无从考证,有传说其祖上是北京牛街人。据马福祥在《马氏族谱》中记述:“吾宗之居韩家集阳洼山,历数世矣,世业商农,无读书者,自曾祖以上不能考其派系。”

马福祥曾祖马玉玺,字国宝,祖父马泰(1784~1850),字翊运,农商兼营,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中上等。马福祥祖父马泰秉性爽直,多智谋,乐善好施,能急人所急,有求必应,“远近亲戚交游有困难事,辄倾身赴之,凶岁(饥荒年)倾家振贫,义声满乡闾,一时所称为六四太爷者也。”

马泰生有二子:千龄、有仓。马千龄(1826~1910),字松坪,即马福祥父亲。随着两个儿子日渐长大,马泰开始考虑其婚事,他常说结婚缘与交朋友不能相比,其人贤否恒关数世利害,不可不慎,如某家姑娘长得漂亮、贤惠,家教好,守规矩,方可与其论婚事;某地“俗恶人劣”,则不可与其论。道光二十二年(1842),马泰为长子千龄择同乡磨川王氏完婚,第三年生下福财。继配同乡大沟马公女,生福禄;三配同乡北塬韩公女,生福祥;四配河州大西乡大河家何公女,生福寿。马千龄四房夫人,共生八男八女,但儿子中活下来的只有四子,其他早年夭折。马福祥兄弟四人,为四母所生,但四兄弟感情很好,长子福财帮助父亲料理家务,务农经商,供养三个弟弟读书习武。马福祥为马千龄三房韩夫人所生,比四房何夫人所生福寿年龄小,兄弟四人,马福祥排行第四,家人称他“小四”,后来一般长辈、亲戚朋友也以“马四”相称。

马千龄年轻时,“喜任侠,不屑治家”,家庭经济不如从前宽裕,在宗教方面用功甚勤,“奉行教典,必敬必诚,七聚五功终身不懈,智略不及吾祖而忠厚过之。”^①

马千龄曾跟随河州回民商帮前往藏区做些小本生意,他们从河州收购藏民生活所需铁制品、布匹、针头、火柴、麻线、瓷器、茶叶

^① 《马氏族谱》卷三。

等,卖给蒙藏民,又从藏区收购药材、皮毛、马匹、牛羊等项输出,往返利润较大,许多回民商人很快致富,拥有雄厚资本。而马千龄本钱少,与当地蒙藏人不熟悉,生意并不兴旺。然而一个偶然机遇,马千龄结识一位海西蒙古头人,时来运转,生意日渐兴旺。

这位蒙古头人名叫尤务,新婚之际伴新娘从河州回青海海商老家,马千龄置办一批货物正好要去那里贩卖,他们一块骑马结伴而行。途中至一人烟稀少的山谷,突然有伙人窜出,杀气腾腾,拦住他们去路。这伙人声称他们是尤务仇家,寻尤务夫妇报仇,与其他人不相干。那时的生意人,为沿途贩运安全,大多带有刀矛等防身武器。马千龄性格豪商,好行侠仗义,曾练过刀枪等武术器械。他弄明白这伙人的意图后,转过身去叮嘱尤务照顾好夫人,独自一人怒马挥枪冲入敌阵。马千龄以一抵十,混战中背部被砍一刀,鲜血直流。马千龄忍痛使出全身力气,竟发枪连挑数人,余敌不支,惊慌逃窜,尤务夫妇幸免于难。马千龄舍命救尤务夫妇的壮举很快在蒙藏地区传开,许多蒙藏群众争先与马千龄结识,而贸易也日渐兴旺。

马千龄每次来这里做生意,都落脚在尤务家,有专门房屋供马千龄经商使用,马千龄一到,尤务派人通知周围蒙藏民来购物,交易方式或付白银,或以物易物,若有纠纷发生,尤务出面调解。马千龄的交易、居住、饭食及安全一切依靠尤务。他每次来时,必备一些礼物,赠送尤务太太。有时在尤务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如有余货,交与尤务代销。如此往返,数年后,马千龄家境日渐兴旺,购置大片田地,并盖起一座四合院式砖瓦房,成为阳洼山一大富户。

马千龄参加河州回民反清斗争

时隔不久,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族反清斗争,从此以后,整个西北动乱不堪。同治元年(1862)五月,在太平天国运动和

第二章 河湟事变与组建安宁军

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河湟事变”^①,是清朝末年西北地区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回族、撒拉族人民起义,曾蔓延甘、青、宁三省,为时一年有余。在这次事变中,马福禄、马福祥两兄弟乘机而起,组建一支200余人的义勇队,又发展成为500余人的安宁军,为清政府效力,屠杀自己同胞,取得清政府信任,为马氏家族的发迹奠定了基础。

河湟事变的起因

1872年,马占鳌等降清后,从一个回族起义领袖转化为清政府官吏,他所率领的三旗马队作为另一支马家军的胚胎逐步壮大。其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他们作为清政府的官员维护当地统治秩序;另一方面,作为回族内部的宗教集团首领,支配着河湟地区各教派门宦势力的消长变化。马占鳌手中的权力在广大回族看来,是背叛民族事业换取的,在短期内很难被部分回族群众所接受。河州南乡的回族首领闵殿臣因反对马占鳌降清,曾被马捆绑压制。1874年,闵殿臣联合南乡回族,准备再次起事,被马占鳌亲手捕杀,并下令将500余名参与事变回民处死,充分暴露了马占鳌

^① 所谓“河湟事变”,河指河州,湟指当时西宁府所辖7县,起事地点在主要由撒拉族聚居的循化县。

等人为了自己的权利与地位,不惜镇压同胞。“马占鳌等人的这种态度正适应了“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要求。这就是他们既充当回族的代表,在回族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又不完全站在回族的立场上,而是兼顾着中央王朝的统治利益。这种源于回族而又多少脱离回族的状态,正是回族军事政治集团选择的成长发展道路。王朝统治与回族利益的缝隙中为回族军事政治集团成长留下了一条通道。”^①

马占鳌本为河州花寺门宦著名阿訇,而马永瑞则为花寺门宦教主,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在光绪年间极大地发展了花寺门宦。马永瑞之子马如彪在河州八坊老王寺念经时,拜一名阿拉伯传教士为师,对经典研究较深,后来又去麦加朝觐和学习了三年,拜访了一些宗教学者和苏非派名人,回国时领了沙孜林耶道堂的“口唤”,准备对花寺门宦进行改革,并在河州、循化一带传播教义,信徒日众。

马如彪势力的增大引起马永瑞族弟马永琳的不满。根据门宦世袭制度,马永琳亦为花寺门宦教长,斥责其侄马如彪所传是新教,于是花寺门宦内部又分裂为二派,分庭抗礼,斗争十分激烈。但由于当时能左右河湟政教两权的马占鳌支持马如彪,马永琳未敢轻举妄动。1886年,马占鳌病卒,马永琳联合一些教众,要打倒马如彪。马如彪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于是两派经常发生摩擦。

光绪二十年(1894)循化花寺门宦中的新派阿訇韩木撒与老派阿訇韩努勒因讲经发生争执,引起械斗,老派人多势众,放火烧了新派房屋,新派遂向循化厅、西宁府上告。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认为是花寺内部相争,就派花寺头面人物马永瑞(马如彪父亲)和马永琳(老派头人)兄弟俩到循化厅解决处理。

马永琳已有反清之意,表面上从事调解教派内部纠纷,但暗地

^①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页。

里却火上加油,他给老派韩奴勒出谋划策说:“我曾派人到东边侦察,潼关以西没有清兵,你们先打循化,再打河州。”并怂恿韩奴勒打死两名新派阿訇,把事态扩大。新派上告兰州,总督杨昌浚采取高压手段,命西宁道陈嘉续带兵弹压,他们一到循化,就关闭城门,不问青红皂白,把新旧两派教争的 11 人全部捕杀,并枭首示众。无理的残杀引起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抗,于是新老派教众一轰而起,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八围攻循化城,从此揭开了光绪二十一年的回族、撒拉族人民反清斗争序幕。

马福禄、马福祥组建义勇队效力清政府

循化被围后,清廷惊恐不安,从各地调动兵力救援。固原提督雷正綰坐镇河州,甘州提督率军进攻西宁,河州总兵直趋循化,下令“不分新老,一律剿办”和“务剿勿抚”。于是新老两派放弃教争,一致反抗清军,他们在积石关一举击溃凉州练军王正坤,声势大振,很快传遍甘宁青地区,宁夏海原李昌发、马四虎、马匡匡等于 5 月 30 日也聚众响应。6 月,西宁韩文秀、乐都冶主麻、化隆马成林、洮西闵伏英等均举义旗。

战火很快燃烧到河州大西乡马福祥老家,马福禄愤然说:“大丈夫不能保卫井里,何好弓马?”主动向州牧请示,愿带兵出击,为清政府效力。马福禄兄弟在这次起义一开始就站在清政府的立场。清军连吃败仗,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被马永琳率领的数万回民军包围。在此情形下,官府号召地方回绅招兵买马,“练士勇以资防卫。”马福禄抓住机会,征得父亲同意后,在本乡亲友中召集青壮年 200 余人,征集骡马多匹,以土枪、大刀为武器,组成义勇队。为了防止回民军报复,马千龄将家中老弱妇女及孩童分散安置在亲友家,惟独马福祥母亲韩夫人坚决不走,只身一人留守家中。

马福禄、马福祥率义勇队驰往积石关,接受雷正綰调遣,解救

被回民军围困在此的王正坤部。当时义勇队没有统一服装,作为一支乡勇武装,很难与回民军相区别。当马福禄兄弟率领义勇队赶往积石关时,回民军以为是自己援兵,没有丝毫警惕,继续全力攻打积石关。马福禄率义勇队从背后杀进回民军营,救出王正坤部。管带王正坤为感激马福禄兄弟救援之功,赠来福枪 10 支。之后,马福禄兄弟又率义勇队向河州西乡进发,策应汤彦和部向河州城撤退。汤彦和军失败后,起义群众乘机攻占了河州西乡、东乡各堡寨。接着马永琳、周世祥和东乡的闵伏英等聚集回民军围攻河州城,提督雷正綰不敢出兵应战,只有困守待援。

10月下旬,董福祥率 30 营入甘,采取剿抚兼施,分化瓦解回民军的策略。利用马福祥诱降了马永琳、马永瑞兄弟,使斗争形势趋于缓和。然后由狄道(甘肃临洮)进军河州,以武力优势,接连攻陷洮河西岸的虎狼关、王家咀等险要关堡,直趋河州。闵伏英率起义军聚集三甲集,与董军力战失败,三甲集、太子寺也相继失陷,河州之围被迫撤退。闵伏英、马古禄、马匡匡等几位投降的起义军首领被清军杀害。

河州城围被解之后,当天晚上,马福禄兄弟率义勇队到河州城下,要求入城歇息,城内汉族官兵以马福禄兄弟及义勇队是回民,不许入城。经雷正綰与汤彦和从中斡旋,向城内官兵解释义勇队是助官军平乱,并保证义勇队之忠良,才勉强允许入城一宿。第二天清早,被汤彦和护送出城。

义勇队所需之粮草,最初由马千龄供给,时间不长,马家储存百余石粮即将用完,马千龄向汤彦和求助,汤认为义勇队有功地方,始按月拨给粮草,并发土枪数十支。

马福禄兄弟“助官军,戮回教”的行为,引起回民军的极大愤怒,回民军骂义勇队与马千龄是“回教身子汉人头”,并纵火烧毁阳洼山马家房屋,“阳洼山庐舍、金帛付之一炬。”当时马鸿逵刚满 4 岁,被送往距阳洼山数里之外的姑母家避难,藏身于小阁楼中,居

高凭窗,看到阳洼山浓烟滚滚,又想到平时最疼爱他的韩奶奶一人守家,不禁大哭起来,姑母急忙掩住马鸿逵口制止说:“现在到处都捉拿你们家人,你还敢哭!”

韩夫人看到几十年经营的家业被付之一炬,更是悲痛欲绝,几次昏死过去,及醒过来,欲投火自尽,幸被人救出。马福祥听说阳洼山家业被回民军烧毁,更担心母亲安危,带几名随从,在黑夜赶回阳洼山,“韩集庐舍,只见瓦砾遍地,一片荒凉,家人逃散。”“韩夫人结蓬以居。”母子相见,抱头痛哭。韩夫人叮嘱马福祥“好从父兄戡乱报国,勿以我为念。”并告戒马福祥“勿乱杀无辜”。天快亮时,挥泪与母亲告别。后来马福祥记道:

道经我旧庐,荒凉剩瓦砾;
我母结茅居,家人窜无迹。
母见一恸绝,移时执手泣;
方慰三数词,烽燧烛云施;
椎胸断裾去,悲风鸣凄恻。^①

义勇队即不被河州城清兵接纳,出城后又遭到回民军追杀,其狼狈相可想而知,马福祥曾感叹曰:“人我阳洼山,庐舍一炬赤,回既视如仇,汉亦怀忌嫉,含沙与下石,此身何处立”。反映了义勇队当时的两难处境,惟有固原提督雷正綰认为马福禄兄弟“忠勇无他志”,命令义勇队前往双城增援汤彦和。马福禄赶到双城与汤军会合,马福禄察看周围地形后对汤彦和说:“此地距积石关仅百里,距州城四十里,如果叛民来犯,我势甚孤危,宜至邢家河宿营,既可镇抚西南两川,也可与城内防军联系,”并建议迅速转移,“迟则恐变”,汤不听。

^① 《马氏族谱·文艺集》。

马福禄、马福祥义勇队在兰州经几天休整，正式改名为安宁军，甘肃总督府营务处准许扩大队伍至500名，并组建一支80余骑的马队，补充装备，任命马福禄为督带，马福祥为管带，辅助清兵剿抚回民起义军。如此，马福禄的地方民团一跃变成正式官军，继马安良、马海宴之后又一支回族武装运用而生。

镇压回民起义

马福禄兄弟义勇队被接收改编为清朝正式军队后，更使他们死心塌地地为清政府效力。

迤邐至兰会，当道嘉其绩；
命募安宁营，部伍重整饬；
步骑即成军，军容一何赫。

马福禄的乘机崛起，曾引起董福祥部下马安良的嫉妒，马安良在背地向董福祥说：“河湟之乱系受马福禄煽动而起，应杀马福禄以平民怨。”董原为土匪出身，思想简单，容易义气用事，未加追查，即对马安良的话信以为真，并对马安良保证“见到马福禄后一定杀之。”会师河州时，汤彦和密告马福禄不可见董，否则命不可保。马福禄表示不能含冤莫白，不听汤的劝阻，亲往董营求见，行叩头请安礼。董背向不理，马福禄长跪不起，向董详述河湟事变起缘及以前助官军平乱之经过。董始明真相，转身扶起马福禄，并安抚说：“我几乎听信翰如（马安良字）的话，错怪了你。”马福祥在后来所作《光绪乙未河湟克捷平乱纪事》中也述及此事：

仲兄屡谒见，未得瞻颜色，
青龟古所畏，为能变黑白，

父子三人及马永寿、马如彪、马显文，并将马永琳、周世祥二人分尸示众，随后又将马永琳四个孙子钉死在木笼。马福禄为向主子显示大义灭亲，其岳父因参加回民起义亦被斩首示众。

事变之后，马安良、马福禄向河湟群众“勒纳赎罪银三次，共三十余万两，捐粮河州市斗一千数百石”^① 名义上银子是赔偿汉民修房，粮食救济难民，实际上大部分都进了董、马等人私囊。

这次起义规模较小，时间短，因教派之争及宗教上层人物之间矛盾而引起的，但同样具有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性质。马福禄在“河湟事变”开始就站在清政府立场，背叛民族利益，残杀自己同胞，马福祥此时 20 岁，跟随兄长为清政府效力，所犯血债是无法回避的。“通过这次事变，西北回族集团势力日益巩固，所以回族军事集团为清政府所重用，恰因为回族的屡屡反清，每一次反清都造成回族军事集团的发展。”^② 河湟事变给马福祥家族得以崛起的机会，成为继马安良、马海宴之后成长起来左右甘宁青局势的显赫人物。

① 《平回志》卷二。

②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 页。

带,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壮大使清廷惊恐万状,眼看局势无法控制。此时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也极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速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将“出兵办理”。清廷被迫答应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调兵入京,但人数必须有限,待“和平”恢复,外军必须撤退。6月中上旬,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竟率八国联军 2000 多人由天津进犯北京。消息传到北京,董福祥甘军迅速占领车站,准备迎头痛击入侵者。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出城迎视”,至永定门与甘军争道,其无礼恃强,被甘军士兵击杀之。甘军此举违犯国际法,董福祥落得一个击杀外国公使的罪名,被慈禧太后问罪。董福祥矢口否认杉山彬为甘军击杀,并说“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有变。”“清廷已感觉到甘军是一支不易控制的武装。杉山彬事件,其实质已成为清军抗击外敌入侵的开端。”^①

马福祥对廊坊之战的描述

外国侵略者并没有遵守清政府提出“保护使馆”人数有限的要求,而是组成大队联军入侵北京。消息传至北京,使整个朝廷为之震惊,慈禧太后更是慌了手脚,草草了结甘军击杀杉山彬一案。八国联军的大举入侵激起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将士的强烈愤慨。当天,甘军统帅董福祥即上奏要求带兵阻击八国联军,“董军门福祥,今日呈请效力,愿亲自带领所属甘肃各兵往阻西兵进京。”同时,廊坊为京津铁路干线要道,位置十分重要。第二天,甘军统帅董福祥命令部将马福禄、姚旺、马海宴统领各部前往黄村(今北京大兴县)竭死抵抗西摩尔所率之八国联军进京。

回族将领马福禄、马福祥两兄弟所率领的简练军,是一支以其家乡河州的回民子弟及东乡、保安等穆斯林官兵为主体组建的部

^① 薛正昌:《董福祥传》,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5 页。

第一章 出身传统穆斯林世家

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

马福祥的家乡河州是我国有名的西陲重镇,距甘肃兰州市西南约 100 公里,是我国回、东乡、保安、撒拉等穆斯林民族主要聚居区,解放后成立临夏回族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地临夏市,归甘肃省管辖。

由于临夏土地肥沃,形势险要,且地联藏区,是古丝绸之路通往西南边疆和中原大地的重要孔道。加上历史上战争、移民、屯田和茶马互市等原因,到明清时期逐渐发展成为西北地区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一个贸易中心与货物集散地。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许多穆斯林或经商、或传教落脚河州,并定居下来,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心也逐渐移到河州并盛行起来,至清末,河州便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伊斯兰教发展活动中心,故河州始有中国“小麦加”之称。

这里有千余座清真寺、拱北、道堂分布在各村镇,有些清真寺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闻名遐迩。这些众多的清真寺琼楼玉宇,辉煌壮观,风景各异。有的庄严雄伟,绚丽典雅,有的苍松翠柏,林木掩映,有的雕梁画栋,肃穆静谧,充分体现了中国回族特有的文化艺术氛围和独特的建筑风格,也显示出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清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人员日益增多,河

已无从考证,有传说其祖上是北京牛街人。据马福祥在《马氏族谱》中记述:“吾宗之居韩家集阳洼山,历数世矣,世业商农,无读书者,自曾祖以上不能考其派系。”

马福祥曾祖马玉玺,字国宝,祖父马泰(1784~1850),字翊运,农商兼营,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中上等。马福祥祖父马泰秉性爽直,多智谋,乐善好施,能急人所急,有求必应,“远近亲戚交游有困难事,辄倾身赴之,凶岁(饥荒年)倾家振贫,义声满乡闾,一时所称为六四太爷者也。”

马泰生有二子:千龄、有仓。马千龄(1826~1910),字松坪,即马福祥父亲。随着两个儿子日渐长大,马泰开始考虑其婚事,他常说结婚缘与交朋友不能相比,其人贤否恒关数世利害,不可不慎,如某家姑娘长得漂亮、贤惠,家教好,守规矩,方可与其论婚事;某地“俗恶人劣”,则不可与其论。道光二十二年(1842),马泰为长子千龄择同乡磨川王氏完婚,第三年生下福财。继配同乡大沟马公女,生福禄;三配同乡北塬韩公女,生福祥;四配河州大西乡大河家何公女,生福寿。马千龄四房夫人,共生八男八女,但儿子中活下来的只有四子,其他早年夭折。马福祥兄弟四人,为四母所生,但四兄弟感情很好,长子福财帮助父亲料理家务,务农经商,供养三个弟弟读书习武。马福祥为马千龄三房韩夫人所生,比四房何夫人所生福寿年龄小,兄弟四人,马福祥排行第四,家人称他“小四”,后来一般长辈、亲戚朋友也以“马四”相称。

马千龄年轻时,“喜任侠,不屑治家”,家庭经济不如从前宽裕,在宗教方面用功甚勤,“奉行教典,必敬必诚,七聚五功终身不懈,智略不及吾祖而忠厚过之。”^①

马千龄曾跟随河州回民商帮前往藏区做些小本生意,他们从河州收购藏民生活所需铁制品、布匹、针头、火柴、麻线、瓷器、茶叶

^① 《马氏族谱》卷三。

等,卖给蒙藏民,又从藏区收购药材、皮毛、马匹、牛羊等项输出,往返利润较大,许多回民商人很快致富,拥有雄厚资本。而马千龄本钱少,与当地蒙藏人不熟悉,生意并不兴旺。然而一个偶然机遇,马千龄结识一位海西蒙古头人,时来运转,生意日渐兴旺。

这位蒙古头人名叫尤务,新婚之际伴新娘从河州回青海海商老家,马千龄置办一批货物正好要去那里贩卖,他们一块骑马结伴而行。途中至一人烟稀少的山谷,突然有伙人窜出,杀气腾腾,拦住他们去路。这伙人声称他们是尤务仇家,寻尤务夫妇报仇,与其他人不相干。那时的生意人,为沿途贩运安全,大多带有刀矛等防身武器。马千龄性格豪商,好行侠仗义,曾练过刀枪等武术器械。他弄明白这伙人的意图后,转过身去叮嘱尤务照顾好夫人,独自一人怒马挥枪冲入敌阵。马千龄以一抵十,混战中背部被砍一刀,鲜血直流。马千龄忍痛使出全身力气,竟发枪连挑数人,余敌不支,惊慌逃窜,尤务夫妇幸免于难。马千龄舍命救尤务夫妇的壮举很快在蒙藏地区传开,许多蒙藏群众争先与马千龄结识,而贸易也日渐兴旺。

马千龄每次来这里做生意,都落脚在尤务家,有专门房屋供马千龄经商使用,马千龄一到,尤务派人通知周围蒙藏民来购物,交易方式或付白银,或以物易物,若有纠纷发生,尤务出面调解。马千龄的交易、居住、饭食及安全一切依靠尤务。他每次来时,必备一些礼物,赠送尤务太太。有时在尤务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如有余货,交与尤务代销。如此往返,数年后,马千龄家境日渐兴旺,购置大片田地,并盖起一座四合院式砖瓦房,成为阳洼山一大富户。

马千龄参加河州回民反清斗争

时隔不久,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族反清斗争,从此以后,整个西北动乱不堪。同治元年(1862)五月,在太平天国运动和

第二章 河湟事变与组建安宁军

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河湟事变”^①,是清朝末年西北地区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回族、撒拉族人民起义,曾蔓延甘、青、宁三省,为时一年有余。在这次事变中,马福禄、马福祥两兄弟乘机而起,组建一支200余人的义勇队,又发展成为500余人的安宁军,为清政府效力,屠杀自己同胞,取得清政府信任,为马氏家族的发迹奠定了基础。

河湟事变的起因

1872年,马占鳌等降清后,从一个回族起义领袖转化为清政府官吏,他所率领的三旗马队作为另一支马家军的胚胎逐步壮大。其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他们作为清政府的官员维护当地统治秩序;另一方面,作为回族内部的宗教集团首领,支配着河湟地区各教派门宦势力的消长变化。马占鳌手中的权力在广大回族看来,是背叛民族事业换取的,在短期内很难被部分回族群众所接受。河州南乡的回族首领闵殿臣因反对马占鳌降清,曾被马捆绑压制。1874年,闵殿臣联合南乡回族,准备再次起事,被马占鳌亲手捕杀,并下令将500余名参与事变回民处死,充分暴露了马占鳌

^① 所谓“河湟事变”,河指河州,湟指当时西宁府所辖7县,起事地点在主要由撒拉族聚居的循化县。

等人为了自己的权利与地位,不惜镇压同胞。“马占鳌等人的这种态度正适应了“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要求。这就是他们既充当回族的代表,在回族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又不完全站在回族的立场上,而是兼顾着中央王朝的统治利益。这种源于回族而又多少脱离回族的状态,正是回族军事政治集团选择的成长发展道路。王朝统治与回族利益的缝隙中为回族军事政治集团成长留下了一条通道。”^①

马占鳌本为河州花寺门宦著名阿訇,而马永瑞则为花寺门宦教主,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在光绪年间极大地发展了花寺门宦。马永瑞之子马如彪在河州八坊老王寺念经时,拜一名阿拉伯传教士为师,对经典研究较深,后来又去麦加朝觐和学习了三年,拜访了一些宗教学者和苏非派名人,回国时领了沙孜林耶道堂的“口唤”,准备对花寺门宦进行改革,并在河州、循化一带传播教义,信徒日众。

马如彪势力的增大引起马永瑞族弟马永琳的不满。根据门宦世袭制度,马永琳亦为花寺门宦教长,斥责其侄马如彪所传是新教,于是花寺门宦内部又分裂为二派,分庭抗礼,斗争十分激烈。但由于当时能左右河湟政教两权的马占鳌支持马如彪,马永琳未敢轻举妄动。1886年,马占鳌病卒,马永琳联合一些教众,要打倒马如彪。马如彪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于是两派经常发生摩擦。

光绪二十年(1894)循化花寺门宦中的新派阿訇韩木撒与老派阿訇韩努勒因讲经发生争执,引起械斗,老派人多势众,放火烧了新派房屋,新派遂向循化厅、西宁府上告。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认为是花寺内部相争,就派花寺头面人物马永瑞(马如彪父亲)和马永琳(老派头人)兄弟俩到循化厅解决处理。

马永琳已有反清之意,表面上从事调解教派内部纠纷,但暗地

^①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页。

里却火上加油,他给老派韩奴勒出谋划策说:“我曾派人到东边侦察,潼关以西没有清兵,你们先打循化,再打河州。”并怂恿韩奴勒打死两名新派阿訇,把事态扩大。新派上告兰州,总督杨昌浚采取高压手段,命西宁道陈嘉续带兵弹压,他们一到循化,就关闭城门,不问青红皂白,把新旧两派教争的 11 人全部捕杀,并枭首示众。无理的残杀引起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抗,于是新老派教众一轰而起,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八围攻循化城,从此揭开了光绪二十一年的回族、撒拉族人民反清斗争序幕。

马福禄、马福祥组建义勇队效力清政府

循化被围后,清廷惊恐不安,从各地调动兵力救援。固原提督雷正綰坐镇河州,甘州提督率军进攻西宁,河州总兵直趋循化,下令“不分新老,一律剿办”和“务剿勿抚”。于是新老两派放弃教争,一致反抗清军,他们在积石关一举击溃凉州练军王正坤,声势大振,很快传遍甘宁青地区,宁夏海原李昌发、马四虎、马匡匡等于 5 月 30 日也聚众响应。6 月,西宁韩文秀、乐都冶主麻、化隆马成林、洮西闵伏英等均举义旗。

战火很快燃烧到河州大西乡马福祥老家,马福禄愤然说:“大丈夫不能保卫井里,何好弓马?”主动向州牧请示,愿带兵出击,为清政府效力。马福禄兄弟在这次起义一开始就站在清政府的立场。清军连吃败仗,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被马永琳率领的数万回民军包围。在此情形下,官府号召地方回绅招兵买马,“练士勇以资防卫。”马福禄抓住机会,征得父亲同意后,在本乡亲友中召集青壮年 200 余人,征集骡马多匹,以土枪、大刀为武器,组成义勇队。为了防止回民军报复,马千龄将家中老弱妇女及孩童分散安置在亲友家,惟独马福祥母亲韩夫人坚决不走,只身一人留守家中。

马福禄、马福祥率义勇队驰往积石关,接受雷正綰调遣,解救

被回民军围困在此的王正坤部。当时义勇队没有统一服装,作为一支乡勇武装,很难与回民军相区别。当马福禄兄弟率领义勇队赶往积石关时,回民军以为是自己援兵,没有丝毫警惕,继续全力攻打积石关。马福禄率义勇队从背后杀进回民军营,救出王正坤部。管带王正坤为感激马福禄兄弟救援之功,赠来福枪 10 支。之后,马福禄兄弟又率义勇队向河州西乡进发,策应汤彦和部向河州城撤退。汤彦和军失败后,起义群众乘机攻占了河州西乡、东乡各堡寨。接着马永琳、周世祥和东乡的闵伏英等聚集回民军围攻河州城,提督雷正綰不敢出兵应战,只有困守待援。

10月下旬,董福祥率 30 营入甘,采取剿抚兼施,分化瓦解回民军的策略。利用马福祥诱降了马永琳、马永瑞兄弟,使斗争形势趋于缓和。然后由狄道(甘肃临洮)进军河州,以武力优势,接连攻陷洮河西岸的虎狼关、王家咀等险要关堡,直趋河州。闵伏英率起义军聚集三甲集,与董军力战失败,三甲集、太子寺也相继失陷,河州之围被迫撤退。闵伏英、马古禄、马匡匡等几位投降的起义军首领被清军杀害。

河州城围被解之后,当天晚上,马福禄兄弟率义勇队到河州城下,要求入城歇息,城内汉族官兵以马福禄兄弟及义勇队是回民,不许入城。经雷正綰与汤彦和从中斡旋,向城内官兵解释义勇队是助官军平乱,并保证义勇队之忠良,才勉强允许入城一宿。第二天清早,被汤彦和护送出城。

义勇队所需之粮草,最初由马千龄供给,时间不长,马家储存百余石粮即将用完,马千龄向汤彦和求助,汤认为义勇队有功地方,始按月拨给粮草,并发土枪数十支。

马福禄兄弟“助官军,戮回教”的行为,引起回民军的极大愤怒,回民军骂义勇队与马千龄是“回教身子汉人头”,并纵火烧毁阳洼山马家房屋,“阳洼山庐舍、金帛付之一炬。”当时马鸿逵刚满 4 岁,被送往距阳洼山数里之外的姑母家避难,藏身于小阁楼中,居

高凭窗,看到阳洼山浓烟滚滚,又想到平时最疼爱他的韩奶奶一人守家,不禁大哭起来,姑母急忙掩住马鸿逵口制止说:“现在到处都捉拿你们家人,你还敢哭!”

韩夫人看到几十年经营的家业被付之一炬,更是悲痛欲绝,几次昏死过去,及醒过来,欲投火自尽,幸被人救出。马福祥听说阳洼山家业被回民军烧毁,更担心母亲安危,带几名随从,在黑夜赶回阳洼山,“韩集庐舍,只见瓦砾遍地,一片荒凉,家人逃散。”“韩夫人结蓬以居。”母子相见,抱头痛哭。韩夫人叮嘱马福祥“好从父兄戡乱报国,勿以我为念。”并告戒马福祥“勿乱杀无辜”。天快亮时,挥泪与母亲告别。后来马福祥记道:

道经我旧庐,荒凉剩瓦砾;
我母结茅居,家人窜无迹。
母见一恸绝,移时执手泣;
方慰三数词,烽燧烛云施;
椎胸断裾去,悲风鸣凄恻。^①

义勇队即不被河州城清兵接纳,出城后又遭到回民军追杀,其狼狈相可想而知,马福祥曾感叹曰:“人我阳洼山,庐舍一炬赤,回既视如仇,汉亦怀忌嫉,含沙与下石,此身何处立”。反映了义勇队当时的两难处境,惟有固原提督雷正綰认为马福禄兄弟“忠勇无他志”,命令义勇队前往双城增援汤彦和。马福禄赶到双城与汤军会合,马福禄察看周围地形后对汤彦和说:“此地距积石关仅百里,距州城四十里,如果叛民来犯,我势甚孤危,宜至邢家河宿营,既可镇抚西南两川,也可与城内防军联系,”并建议迅速转移,“迟则恐变”,汤不听。

^① 《马氏族谱·文艺集》。

马福禄、马福祥义勇队在兰州经几天休整，正式改名为安宁军，甘肃总督府营务处准许扩大队伍至500名，并组建一支80余骑的马队，补充装备，任命马福禄为督带，马福祥为管带，辅助清兵剿抚回民起义军。如此，马福禄的地方民团一跃变成正式官军，继马安良、马海宴之后又一支回族武装运用而生。

镇压回民起义

马福禄兄弟义勇队被接收改编为清朝正式军队后，更使他们死心塌地地为清政府效力。

迤邐至兰会，当道嘉其绩；
命募安宁营，部伍重整饬；
步骑即成军，军容一何赫。

马福禄的乘机崛起，曾引起董福祥部下马安良的嫉妒，马安良在背地向董福祥说：“河湟之乱系受马福禄煽动而起，应杀马福禄以平民怨。”董原为土匪出身，思想简单，容易义气用事，未加追查，即对马安良的话信以为真，并对马安良保证“见到马福禄后一定杀之。”会师河州时，汤彦和密告马福禄不可见董，否则命不可保。马福禄表示不能含冤莫白，不听汤的劝阻，亲往董营求见，行叩头请安礼。董背向不理，马福禄长跪不起，向董详述河湟事变起缘及以前助官军平乱之经过。董始明真相，转身扶起马福禄，并安抚说：“我几乎听信翰如（马安良字）的话，错怪了你。”马福祥在后来所作《光绪乙未河湟克捷平乱纪事》中也述及此事：

仲兄屡谒见，未得瞻颜色，
青龟古所畏，为能变黑白，

父子三人及马永寿、马如彪、马显文，并将马永琳、周世祥二人分尸示众，随后又将马永琳四个孙子钉死在木笼。马福禄为向主子显示大义灭亲，其岳父因参加回民起义亦被斩首示众。

事变之后，马安良、马福禄向河湟群众“勒纳赎罪银三次，共三十余万两，捐粮河州市斗一千数百石”^① 名义上银子是赔偿汉民修房，粮食救济难民，实际上大部分都进了董、马等人私囊。

这次起义规模较小，时间短，因教派之争及宗教上层人物之间矛盾而引起的，但同样具有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性质。马福禄在“河湟事变”开始就站在清政府立场，背叛民族利益，残杀自己同胞，马福祥此时 20 岁，跟随兄长为清政府效力，所犯血债是无法回避的。“通过这次事变，西北回族集团势力日益巩固，所以回族军事集团为清政府所重用，恰因为回族的屡屡反清，每一次反清都造成回族军事集团的发展。”^② 河湟事变给马福祥家族得以崛起的机会，成为继马安良、马海宴之后成长起来左右甘宁青局势的显赫人物。

① 《平回志》卷二。

②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 页。

带,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壮大使清廷惊恐万状,眼看局势无法控制。此时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也极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速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将“出兵办理”。清廷被迫答应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调兵入京,但人数必须有限,待“和平”恢复,外军必须撤退。6月中上旬,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竟率八国联军 2000 多人由天津进犯北京。消息传到北京,董福祥甘军迅速占领车站,准备迎头痛击入侵者。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出城迎视”,至永定门与甘军争道,其无礼恃强,被甘军士兵击杀之。甘军此举违犯国际法,董福祥落得一个击杀外国公使的罪名,被慈禧太后问罪。董福祥矢口否认杉山彬为甘军击杀,并说“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有变。”“清廷已感觉到甘军是一支不易控制的武装。杉山彬事件,其实质已成为清军抗击外敌入侵的开端。”^①

马福祥对廊坊之战的描述

外国侵略者并没有遵守清政府提出“保护使馆”人数有限的要求,而是组成大队联军入侵北京。消息传至北京,使整个朝廷为之震惊,慈禧太后更是慌了手脚,草草了结甘军击杀杉山彬一案。八国联军的大举入侵激起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将士的强烈愤慨。当天,甘军统帅董福祥即上奏要求带兵阻击八国联军,“董军门福祥,今日呈请效力,愿亲自带领所属甘肃各兵往阻西兵进京。”同时,廊坊为京津铁路干线要道,位置十分重要。第二天,甘军统帅董福祥命令部将马福禄、姚旺、马海宴统领各部前往黄村(今北京大兴县)竭死抵抗西摩尔所率之八国联军进京。

回族将领马福禄、马福祥两兄弟所率领的简练军,是一支以其家乡河州的回民子弟及东乡、保安等穆斯林官兵为主体组建的部

^① 薛正昌:《董福祥传》,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5 页。

肉薄毒焰更包围，敌势不支渐披靡。
仓皇乘车车东驰，逝者如斯不可追，
平明寻视敌遁处，遗屣满地血淋漓。

马福禄为国捐躯，马福祥接替兄职

廊坊之战，在西摩尔看来，即然正规军起来攻击联军，便意味着中国已向八国联军宣战。6月19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的消息传至北京，满朝震惊，迫使清政府最终作出了对外宣战的决定。6月20日，以载漪为首的主战派组织清军和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区，这本身就是策略上的失误，反映了清政府的愚昧无知，因为各国使馆是受国际公约保护的，由于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甘军官兵更不懂得什么国际公法，他们把爱国热情和打击侵略者的强烈愿望都倾注在攻打使馆的战场上^①。6月24日至26日，董福祥率甘军向外国使馆发起猛攻，马福禄、马福祥奉董之命调守正阳门城楼，马福禄即对弟弟说：“我辈惟有恪遵朝命，以身报国”，两兄弟相互鼓励，决心与入侵之敌血战到底。6月27日，联军大举进攻北京，慈禧与光绪帝看大势不妙，率少数随从离开北京，董福祥部也不知去向。简练军中有人建议放弃正阳门，遭马福祥严斥，决心与城共存亡。6月28日，联军攻城甚急，马福祥族弟福贵、福全及侄耀图、兆图先后阵亡，简练军损失较大，但马福祥兄弟仍坚持不退。当时英、法兵于城上设十道栅，阻止简练军进攻。双方展开对射，互有伤亡，马福禄登城，“挥弟福祥夺其二栅，复交力环攻。”敌人死守待援。马福禄决定在敌人援兵赶来

^①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第四章 扈驾两宫西遁

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传说

马福禄阵亡后，马福祥率所部一营，将马福禄及阵亡官兵遗体抬出平子门，葬于城外三里河回民公墓，命其余官兵绕道西直门出城，至平子门集合。马福祥集结队伍后，不知开往何处，正彷徨之际，一身着长衫，品貌不凡之人走上前来，问马福祥是何部队，准备开往何处？此人自称叫岑春煊，为宫廷大臣。马福祥回答所部属甘军之简练军，岑又问：“是否是董福祥部？”马福祥回答“是，但主帅已不知去向。”并将简练军防守正阳门及马福禄为国捐躯之事相告。岑称：“慈禧及光绪圣驾离京北行，何不前往扈驾？”马福祥挑选战马一匹供岑春煊乘骑，派两名军士护卫，随军同行，立即动身追赶两宫。行抵南口，得悉两宫行止，乃率轻骑百名，驰往宣化。

8月初，眼看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清军已纷纷溃败，两宫仓惶逃窜。8月15日（农历七月二十一），两宫北逃至贯市时已天黑，决定驻蹕此地，贯市为一回民小村，两宫驻当地清真寺内^①。西太后自逃出京城，仅食两个鸡蛋，此时已是饥肠辘辘，当地李、杨二姓回民进面饭及小米粥，甚觉可口。西太后见米粥里漂几根绿油菜叶，便问身边大臣，这是一道什么菜，此大臣犹豫了片刻说道：“回

^①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庚子国变记》，第180页。

败后,有七八十万回民死于清军屠刀之下,许多劫后余生的陕西回民被强迫安置在偏远及荒凉之甘肃各地,被迫赶出美丽富饶的陕西关中家园。而甘肃回民在起义投降后损失相对较小,原居住格局基本没变,经济损失较小,并且有一批回族上层及宗教人士如马占鳌、马海晏之流投降清军后取得兵权,反过来为清政府效力,屠杀自己同胞,取得清政府信任,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影响西北政局的地方武装势力。两宫西逃的最后落脚地是西安,而甘肃与陕西临近,如今两宫仓惶西逃,深入西北,甘肃回族态度如何,深可忧虑,所以慈禧西逃途中极力拉笼西北回族诸马为其保驾。马安良父子自降清后 20 余年,在甘肃回族中树立了权威,已成为公认的回民代表人物。马福祥家族武装起源于 1895 年的河湟事变,其影响及兵力虽不及马安良,但也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非常有战斗力的队伍,在家乡河州及兰州有地方绅士支持,已逐渐打开局面。前文提及马福祥与岑春煊偶然相遇,倒不如说岑春煊奉旨在寻找马福祥部回军为两宫保驾。此后,岑春煊曾任陕西巡抚,与马福祥结盟兄弟,成为莫逆。

马福祥作为一个下级军官,能得到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召见,甚为感激,他在途中竭力侍奉两宫,“扶銮上下徒步走,骄阳中,不以为劳。”^① 太监张兰德曾回忆说:“马福祥对老祖宗的扈驾那真是尽心尽力。”马福祥还与太监张兰德结为换帖兄弟,反映出马福祥善于交际,能与各类人相处很好,避免在政界树敌。这些人在后来马福祥政界升迁中都起过不小作用。

马福祥为两宫扈驾,一方面可以摆脱董福祥的摆布,直接受命于宫中大臣调遣;另一方面为这支家族武装力量的发展找到强有力的后盾,不致于被别人吃掉,也算对得起战歿在正阳门的兄长及家乡诸同胞。马福祥逐渐从亲人战歿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扈驾

^① 《马氏族谱·叙事集》。

途中赋诗四首：

一

虏骑附城阴，东风吹血腥，
居庸星宿驾，驿路雨淋铃。
感愤军增壮，酬知剑有灵，
帝乡回望处，宫树晚烟青。

二

云气杳天涯，军行卜翠华，
海明黄捧日，尘定碧流霞。
万马烈仙仗，六龙转帝车，
桓桓夫了勛，拱卫静无哗。

三

亚夫擐甲冑，帝谓是将军，
顾我无长策，敢论不世勳。
扶耒下峻坂，伴雁宿秋汾，
天语多恩宠，人间几得闻。

四

表里山河古，春秋晋国强，
时艰怀霸业，俗俭溯陶唐。
风辇千旗拥，鸦军两翼张，
欢呼诸父老，不解阅沧桑。

此年马福祥只有 25 岁，自知肩负重责。9 月 10 日，扈驾两宫抵太原，驻蹕兼旬，某大臣奏报八国联军掠保定向西而来，遂决定逃至西安，于 10 月 1 日起驾南行。一路地方官供给周至，慈禧甚为满意。10 月 19 日两宫銮辂始入潼关，至浦州黄河渡口，西太后见船小水急风浪大，船夫均是烟民，孱弱不堪，不敢上渡。正进退

两难之际，马福祥上前奏报，称简练军中许多回民士兵自幼在黄河边长大，善驾羊皮筏，且水性好，用他们代替船夫，可保太后及圣上万无一失。太后称善。马福祥乃从部下挑选熟悉水性士兵数十人，分任各船船夫，载清室及大臣一行，安全平稳渡过黄河。西太后对马福祥信任有加，“天颜颇喜，赏银二十两，银牌百面，”给撑船士兵。当晚两宫用膳时，又犒赏菜肴，马福祥向两宫奏明其部下大多为回民，不食大荤，乃改赏鸡蛋。马福祥再次受到西太后赏赐，一时高兴，乃赋诗四首：

一

黄河天堑比鸿沟，四扇潼关在上头。
底事今朝风浪大，鲤鱼效顺负龙舟。

二

画楫轻摇鹅鹤扶，健儿踏浪等飞鳧。
黄流稳渡龙颜喜，络绎八珍进御厨。

三

从军未饫大官羊，赐食舟中禁鬻香。
九曲黄河走东海，滔滔不及圣恩长。

四

迤邐翠华来自东，五陵佳气郁葱葱。
长安巡幸称明圣，万叠红云罩汉宫。

渡过黄河之后，马福祥扈驾两宫至华山脚下，召来襄办皇差之陕西总管黄直刺，垂询华山地形。西太后问：“何处可以拈香？”黄奏：“山路险峻，已派兵一营修路。”西太后又问：“驻蹕一日可修竣否？”黄奏请西太后至华阴驻一日，或可赶修稍平。后因北京方面急电频传，军情吃紧，乃传旨不登山，即在华狱庙拈香。太后率皇帝、皇后、妃嫔、大阿哥、大臣在灏灵殿行六叩礼，列祖灵牌前行九

叩礼。太后想起京城陷入外人之手，有负于列祖列宗，禁不住泪涕涟涟。又登上万寿楼，向京城方向凭眺良久。

10月26日傍晚，两宫至西安，由长乐门直抵北院行宫，御道甚长，皆用黄土铺垫，沿路各商铺悬灯结彩，当地居民跪迎道左，均欲亲睹圣容。皇上命扈从等毋需驱逐，皇太后赏赐沿道两旁诸民银牌甚多。抵北院后，各办事大臣亦纷纷至，当夜令马福祥率250人为侍卫，以后日夜轮班护守。西安自秦以来为各朝古都，历史上名人辈出，马福祥引以为慨，赋诗两首：

一

秦中自古帝王州，陆海接天据上游，
莫谓去邠能避狄，须知有勃即安刘。
星河夜动蓬莱阙，钟鼓更严花萼楼，
万里君门今咫尺，饱闻絳帻报鸡筹。

二

淡月疏星绕建章，禁城秋色晓苍苍，
相君戾止簪缨集，兵卫森严剑戟光。
百战艰难惟李广，两京收复忆汾阳，
不时召见天颜喜，衣袖常沾御案香。

在长安行宫的一年里

两宫驱往长安途中，由各省派遣前来效命扈驾之官兵很多，太后均令就地驻守，惟令马福祥等率军随扈。抵长安后，简练军经补充装备、整训后，改名为“志胜军”，取消甘军番号，任命马福祥为统帅，担任宫禁警卫及北辕周围防务。马福祥因“扈从出力，奖参将加副将衔”，至此，马福禄、马福祥创立的这支家族武装，由地方军

而改属为中枢正规军，彻底摆脱董福祥控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两个多月沿途扈驾，马福祥与宫内大臣及太监混得相当熟，他们皆以马福祥小名马四相称呼，慈禧太后大总管李连英，二总管崔玉桂，三总管筱德张、张祥斋皆与马福祥建立关系，并相处很好。

两宫驻蹕长安后，太后因水土不服，常有胃痛之疾，夜不能寐，再加心情不好，动辄嚎啕大哭，数名太监轮流捶背，日夜不休。有一天，太后对王中堂说：“我要看看百姓是如何苦楚”。于是率皇帝及大臣乘御车行至乡间，许多乡农远远立田间翘望，并不回避，太后没有加罪。皇上因没有与下层人民接触过，看见乡民衣衫破烂形状很惊奇，太后对皇上说：“你们那里知道百姓如此困苦”。当年关中旱灾，粮食欠收。回到行宫后，太后命岑中丞开粥厂，赈济灾民。

马福禄战歿正阳门的消息传至其老家河州阳洼山，全家人陷于无限悲痛之中，韩太夫人听说马福祥扈驾两宫已至长安，思儿心切，立即携带马福祥夫人及马鸿逵乘马车千里迢迢，经十多天跋涉，终至西安。马福祥与家人离别已近3年，母子相见，抱头痛哭。据马福祥在《韩太夫人墓表碑阴跋语》中说：“先妣携妻子降临，福祥戎马余生，不获归里闾侍起居，转令白发高年驰驱千里。远道相逢，忽若梦寐，福祥伏而哭，先妣持而泣，天下伤心事至斯极矣。越日，行在退食，乃从容谕曰：‘汝父四子，福财老矣，福禄殉难，福寿暂助汝父理家政，所望以光大门闾者，惟汝耳。日近天颜，好为之，勿诒汝父兄羞。’”马福祥是个孝子，对母亲感情很深。当年马鸿逵刚满8岁，随祖母及母亲来到长安，每日上午读书写字，下午则在行宫戏耍，因宫中别无其他小孩，一些太监无事时常找马鸿逵玩，称小马四。太后心情好时，还亲自为马鸿逵梳理发髻。

两宫驻蹕长安时，行宫内发生一次火灾。当年12月，天气渐冷，因取暖不慎，寿司房起火，火势凶猛，直逼内宫，皇上仓惶避灾

辛劳与忠诚多加慰勉,不禁泪水盈眶。马福祥扈送两宫至石家庄,列军正定火车站,当时袁世凯也率军前来迎驾,将两宫扈驾之责交袁接替,即恭送太后及皇帝启程。事后马福祥赋诗一首,题为《辛丑八月两宫回銮随扈至正定》:

蜗石补天后,銮舆动地回,
旌旗函谷暗,宫馆洛阳开。
灵雨随龙降,仙云拂马来,
小臣恋恩处,伫立望燕台。

庚子事变,加速了清朝统治的崩溃,帝国主义向清政府勒索赔款白银达 42672 万两。清政府为筹措庚子赔款,便向各省进行摊派,各地方官层层加码,向劳动人民进行疯狂勒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了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十年后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对马福祥家族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兄长及家族亲人五人同时战歿,简练军元气大伤。后来马福祥有机会为两宫扈驾,途中尽心尽力,得到两宫信任,原指望两宫回京后能得到朝廷重用,无奈因洋人反对,不能进京,失去了一次很重要的升迁机会。后来清政府危危可岌,不能自保,更没有人会想到重用马福祥这样远在西北的一个下级军官,因此,马福祥及这支武装力量仍前途未卜。

第五章 摆脱董福祥控制 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随着中外议和而告终,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向八国联军赔款白银达四亿两,联军还提出要求清政府严惩董福祥,裁并甘军,西太后不敢违洋人旨意。尽管马福祥在护驾两宫西遁时赢得西太后信任,因其隶属甘军,没有得到提拔重用,马福祥只好率军返回甘肃老家。但在扈驾一年里,结识不少宫中要员及慈禧身边的太监小德张,为以后升迁赢得政治资本。与马福祥相比,甘肃统帅董福祥却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灾难,议和期间,中外惩董之声咄咄逼人,面对列强的强大压力,董福祥没能得到公正的保护。但立即惩办董福祥恐激成事变,清廷向洋人陈明利害,要求从缓处理。故先将董福祥“军职留任”,继又将其“即行革职”,遣回老家,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

任靖远县镇协

马福祥率所部,由正定返回西北,途径平凉时董福祥派人迎候,请马福祥往其老家庆阳府毛曲井相聚,遭马福祥拒绝,率军至兰州然后回到河州。

马福祥转眼间已离家四载,与家人及亲朋相聚,又悲又喜,心情非常复杂。看到当年跟随他与兄长的义勇队已牺牲大半,生还者寥寥无几,许多妻子没能盼回丈夫,儿子失去父亲,整个阳洼山

于亲子。马鸿宾生于 1884 年,任营长时只有 22 岁。

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后,遇到了一件很棘手的问题。当时由于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西藏宗教界两大领袖班禅与达赖发生矛盾,十三世班禅受英人煽动,被迫仓惶北逃,避居库伦(今外蒙乌兰巴托),于 1906 年 9 月移驻青海塔尔寺。从此,外蒙、西康、西藏及青海各地僧众前来膜拜者络绎不绝,塔尔寺活佛阿嘉图克图难以容忍,认为达赖以客压主,盛气凌人。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又逢阿嘉图克图活佛突然暴死,谣传系达赖部下暗用魔术放咒致死。塔尔寺僧众遂即拿起武器与达赖卫兵发生械斗,马福祥闻讯,即刻与青海办事大臣前往调解,这时塔尔寺僧众 2000 多人齐集在经堂南面社火院,持枪怒目包围达赖卫兵。马福祥为安全起见,单骑前往,劝双方停火。至塔尔寺又被僧众包围,许多僧人向马福祥投掷石块,情况非常危险。马福祥镇定自若,仍以善言开导,由翻译转达。马福祥在烈日下站了 3 个多小时,终于将塔尔寺僧众说服,一场械斗始告平息。同时为避免达赖与班禅矛盾加深,必须制止达赖返藏。10 月 18 日,陕甘总督升允致电驻藏大臣有泰,告诉达赖喇嘛抵甘,现驻塔尔寺,奉旨款留,暂不回藏,因而达赖又在塔尔寺滞留了一年多时间。由于马福祥从中调解,并不时到塔尔寺看望,双方相处很好。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为支付洋人赔款,财政拮据,于 1907 年决定在青海开采金矿。上谕陕甘总督升允筹办,升允深知青海民情复杂,特别是藏民认为凿山开矿,破坏风水,将大祸临头,坚决反对凿山开矿。一些藏民在活佛煽动下,手执武器,保卫山脉,致使开矿之事难上加难。故决定先在汉民地区试办,并设立西宁矿务局。1907 年,任命马福祥为西宁矿务局总办,并成立一支由 30 余骑组成的矿务马队,马福祥交由其侄马鸿宾带领,维护矿局秩序和缉私工作。马鸿宾以此队人马为班底,后来发展壮大,渐为人知,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07年10月,碾伯县农民采樵困难,而附近地区煤炭蕴藏量十分丰富,地方政府决定开煤矿,被瞿县寺藏族僧众所阻,双方发生械斗,互有死伤,当地驻军前往弹压,事件平息,煤矿自此得以开采。同年拉卜楞僧众与杂由阿目绰和发生仇杀事件,马福祥从中斡旋,双方“涣若冰释”,放弃争斗,重归和好。第二年,西宁矿务局组织矿工准备开采十族阿密瞿律山金矿,遭沙冲寺僧阻拦,双方出现僵持,驻部某兵怒从中来,杀死二名僧人,十族藏民纠众数千人,欲以兵戎相见,矛盾激化,消息传至甘肃省府,甘肃总督长庚怒斥擅杀启衅,将矛盾激化。此时马福祥正好在省垣,向总督请命,自称熟悉当地民情,愿亲自前往排解纠纷。请示得到批准后,马福祥带少数随从,日夜兼程,行至青海循化夜渡黄河时,风浪大作,“天螟如漆不辩人”,小船几乎被大浪掀翻。马福祥镇定指挥,出险境,没有休息继续前进,至茶铺族。一些僧众闻讯,十分惊慌,当地藏民立刻组织起来,并约马福祥至沙冲寺外之一窑洞庄谈判,并只准带十名随从。许多人为马福祥安危担忧,劝小心行事。马福祥坦然率十骑至,沙冲寺法台佛僧集众鸣号角,突然间有许多藏民手执武器从四面围拢而来,其中有持血衣喊冤者。马福祥镇定自若,“温语抚慰之”,当场给两家受害藏民家属许诺给予经济赔偿。对在场藏民进行耐心开导,强调开矿系国家新政,不可阻挠。在场的沙冲寺法台提出阿密瞿律山有一小寺,系宝贝佛修行处,当地藏民目之为福地,若一开凿,则大伤黄教命脉,蒙藏教民将会痛心疾首。马福祥后来说:“余闻宝贝佛为黄教之祖,蒙藏皆皈依尊仰,相传诞生后其母埋胎衣处,上生贝树,树叶肖佛形,人甚宝之,故称为宝贝佛。云就其地造浮屠、建佛龕,金碧辉煌,即塔尔寺也。沙冲寺则其削发处,与瞿律山均为番人所呵护。”^① 考虑到藏民的风俗及尊重其宗教信仰,马福祥提出可以免开瞿律山矿,在其他地方开矿,

^① 马福祥:《前抚番·序》载《马氏族谱》。

方风气大为改观。后来杨增新出任新疆总督,他竭力荐举马福祥任阿尔泰护军使,协助新疆军务,并许诺将来可继其位。马福祥非常感激其知遇之恩,只因其母韩夫人年逾八旬,不愿远离,婉辞不就。

宣统六年(1909),陕甘总督升允实行新的军队编制,成立马步四标,其中马队标统为马安良,所属各营是由镇南军和督标部队改编而成。步兵第一标标统为张定邦,后调署西宁镇,标统由陆洪涛担任;步兵第二标标统为马福祥,所属各营由西宁镇、河州镇和固原镇所属部队改编成立;步兵第三标标统为周学务,所属各营全系招募新兵。同年10月,清廷新任命的陕甘总督长庚到任后,又将马步四标改编为东、西、南、北四路巡防队,马福祥任西路巡防统领兼代新疆巴里坤镇总兵。

宣统二年(1910)八月十九日,马福祥父亲马千龄归真,享年85岁,马福祥回籍理丧。此年发生临洮下八沟藏民杀人越货抢劫洮州商民财物,积案累累。陕甘总督长庚派遣河州镇总兵马臣阁进剿,结果无所收获,继委派马福祥前往处理。因下八沟一带地形复杂,道路险阻,马福祥与三兄马福寿、侄马鸿宾于九月十二日一同前往。马福祥并没有率大军进剿,而采取软硬兼施手段,说服当地藏民放弃邪念,归顺朝廷。马福祥沿途接见各地藏民头人,并晓以大义,劝其各安其业,勿持观望之态度。至黑错(今甘肃合作县)有数名藏民自动来迎接,至嘉木冈,“兵番交迎,道为之塞”。马福祥看到这里人多,鱼目混杂,必有一些犯科之人混于一般藏民中,当即颁发《汉番合璧告示》,谕令悔罪输诚。同时颁布《办理番案布告一》称:

照得洮属八沟等处,为番匪出入之区,抢劫商旅,杀伤我商民,犷悍成性,肆无忌惮,已非一日。近因黎主麻子被抢各案办理棘手,蒙督宪札委洮州协厅及循化营马参将等查办累

此》，用诗歌体形式记述了整个案件处理经过^①。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陕西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联合会党响应起义，建立了陕西革命军政府。陕西的独立极大地震动了毗邻的甘肃全省，一方面甘肃各地反清反封建起义此起彼伏，纷纷响应革命；另一方面甘肃的满州贵族和封建军阀官僚集聚反革命力量，妄图利用偏僻的地理条件负隅顽抗。西安光复后，解职移居陕西长安的前陕甘总督升允逃至平凉，和驻兰州的现任陕甘总督长庚，分别致电清政府，要求“勤王”，组织“勤王”之师，镇压陕西革命活动。清廷得知后，即任命升允为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镇压陕西革命。长庚也积极配合，组织反革命大军，准备围剿陕西革命。首先对原有的甘肃反动武装进行改编调整。改陆洪涛部为振武军，周学务部为忠武军，张行志部为壮凯军，吴炳鑫部为建威军，崔正午部为骁锐军，马福祥部为昭武军，马安良部为精锐军。

一切准备就绪，诸将会集兰州，商讨进军事宜。马安良最为积极，且大言不惭称：“陕西几个革命小娃娃，一打就跑，何能成事。保证我军一到，即可剿灭。”马福祥思讨再三，发表意见说：“甘肃地方复杂，连年战乱，再加自然灾害，农民苦不堪言。现全国烽火遍地，甘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今日之事，惟保境安民为上策。”由于马福祥的消极态度，长庚命马福祥率昭武军驻守兰州，派马安良招募10营兵力赴陕。马安良对马福祥的消极态度极为不满，借口兵力不足，向甘督要求，请调拨马福祥两营兵力为助，以此削弱马福祥实力。马福祥迫于无奈，当场表示：“军队乃国家所有，国家有事，理应出力，马安良即有需要，自无异议。”乃调派昭武军中马麒骑兵一营及马孝忠步兵一营交马安良节制。马孝忠认为马安良为人奸诈，且其先祖于同治年间与马安良家族因收编问题有过节，宁愿杀头，也不愿追随马安良，只好作罢。马麒愿受命，被马安良委

^① 马福祥：《磨盾余墨》，第19页。

任为邦统。1912年1月,马安良集中兵力向冉店桥、亭口进犯,马麒占领汾州,升允也亲自赶至汾州督战,他一面派马麒攻陷永寿,另一面派马安良直逼乾州。

张云山领导的陕西革命军在乾州展开血战,陕西革命军领导人之一马玉贵,他利用自己回族身份致信马安良,劝说其顺应潮流拥护革命。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2月南北议和,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甘肃的长庚、升允对清帝退位的消息秘而不宣,陕西方面战事还十分紧张。陕西革命军在前线散发清帝退位的大幅传单,一时舆论四起,军心浮动,长庚不得不将清帝退位的消息公布于众。此时甘肃的政局也发生重大变化,秦州宣布独立,成立了临时军政府,进攻陕西的反动军队也只得看风转舵,罢兵息战。

2月24日,马福祥、王之佐、水梓等联络省内外甘肃籍人士,倡议组织甘肃省临时议会,推李镜清为议长。马福祥、王之佐、水梓、慕寿祺、周学务等30人为议员,主张承认共和。甘肃省临时议会虽成份复杂,但大部分议员包括李镜清等都是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名义上宣布赞同共和,暗地里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甘肃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化,升允等人坚决反对共和,长庚则迫于形势,表示对地方事“不再闻问,愿早离甘”。以代理布政使赵惟熙为首的另一些封建官僚看到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于是见风使舵,企图借承认共和之名夺取政权。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正式任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甘肃军政府建立后,就出现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一是受袁世凯支持的以旧官僚赵惟熙为首的“甘肃军政府”;一个是秦州起义后由黄钺领导成立的“甘肃临时军政府”,两个政权,两种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黄钺曾致书马福祥,劝马在此鼎新革故之际,切不可“抱模棱

之志,存观望之心”,更不能继续“操同室之干戈”,应与秦州军政府联成一体,马福祥看到清廷大势已去,“度德量力,无能挽回”,表示赞成甘肃共和。3月22日,黄钺再致函马福祥,对其力主承认共和之举“钦佩无量”,并指责省垣所谓共和仅以五色旗换下清朝的黄龙旗,而通省上下“皆无共和之实迹”。事实也是如此,新建立的甘肃军政府,只不过是换了块“民国”空招牌,实际上仍是清制不改,一些旧官僚仍把持地方政权。马福祥毕竟是旧官僚出身,在此问题与黄钺发生分歧,认为秦州独立是:“犯不韪之名,而为行险之事”,指责黄钺“私举都督,扰乱治安”,要求黄钺早日取消秦州独立,否则“在甘肃必有迎抵之师,深恐衅端一启,祸结兵连。”马福祥为袁世凯、赵维熙张目。袁世凯多次给黄钺拍电报,施加压力,指责黄钺“拥兵抗令,且有侵掠杀伤,似此行为,真是甘心破坏”,并勒令黄钺“务即克日取消独立,撤去临时军政府,听候赵都督命令。”1912年6月7日,马福祥出而与秦州军政府司法司司长周昆分别代表省、秦双方签订《和平解决条约》14款,秦州临时军政府宣布取消,不久黄钺解甲返回湖南。

与马安良之间的矛盾

马福祥与马安良为同乡同族,但不同宗,马安良起家于同治年间,马福祥家族武装源于1895年的河湟事变。马安良对马福祥家族的后来崛起堪为不满,表现出马安良为人心胸狭窄,猜忌多疑,且骄横至极,妄自尊大。他即瞧不起马福祥,但眼看马福祥家族武装势力日渐强大,内心总是不安。前文已操到早在河湟事变时,在马福禄、马福祥背后向董福祥告黑状,说河湟事变为马福禄背后操纵,一手造成,企图借董之手铲除这支刚刚萌芽的家族势力。

马福祥以办事稳健和干练而被各方所信赖,曾代表甘肃军政府与秦州黄钺谈判,马福祥说服黄钺取消秦州独立,赢得各方人士

袒汉人，是“回人身子汉人头”，马福祥以其愚昧无知，竭力容忍，不与争执。

马安良曾借故提出马福祥在任西宁镇总兵时主持淘金工作，贪污黄金甚多，要马福祥必须吐出，迫令马福祥交出所部昭武军，并扬言否则将以武力征讨。马福祥感于自己实力不及马安良，为避免再启战祸，提出愿意将所部交与马安良统领，个人引退。然而昭武军全体官兵跟随马福祥征战多年，与马福祥生死患难与共、一致反对马福祥忍让态度，愿听命马福祥，与马安良一拼高底。马安良看到马福祥部团结一致，也不想两败俱伤，致于要马福祥交出黄金一事，最后不了了之。

李镜清被刺后，甘督赵维熙与马安良之间矛盾又加剧，赵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任意安插亲信，把持甘肃省各要害部门，这就引起了在野官吏和长期得不到实缺的候补官吏的不满，马安良利用这一时机打击赵维熙。1912年7月，赵维熙再次任命马福祥为西宁镇总兵，任命通知即将发出，马安良得知这一消息，勃然大怒，坚决反对，迫令赵维熙收回成命，赵畏马安良手握重兵，不得已将任命通知撤回，改委马麒为西宁镇总兵，重新任命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赵亲自到马福祥处解释一番，并说：“老弟，你是清白正直之士，国家贤能有用之材，不必与彼等相争。为避免争端，最好请你去宁夏，因宁夏总兵张子克辞职，而内蒙发生独立运动，请你到宁夏就近剿抚。”马福祥考虑到如坚持留甘，势必发生与马安良争执，殃及地方，再三容忍，接受赵维熙的任命。而马安良的跋扈，专横及狂妄自大，为自己家族势力最早消亡种下了恶果。

当马福祥奉命调任宁夏镇总兵，由兰州启程赴任时，与马安良之间还发生过一件不愉快之事，令马福祥很伤感。原来马福祥有两个部下与马安良差官纠伙赌博，双方发生口角，殴斗伤人，被马安良拘捕扣押。马福祥由兰州启程赴任时，马安良率部队及军乐队至兰州黄河以北送行，表而对马福祥很友好。马福祥向亲朋好

友及前来送行的兰州各界耆绅、朋友告别，上马准备启行间，不料马安良部巡捕押解参与赌博的马福祥两名部下到场，当众斩首，并声称为马福祥钱行。因事出突然，马福祥及送行各界人士大为震惊。马福祥随属部队见此情形，更为愤怒，欲即捕杀马安良而后快。一时间剑拔弩张，情势极为紧张，送行的各界人士相继躲避。马福祥看到在场民众及各界士绅代表甚多，惟恐当场火拼，伤及无辜。何况马安良率大军有备而来。马福祥严令部属，不得妄动，从容走向马安良，强压胸中怒火对马安良说：“你对我的侮辱，我可以忍让，不与计较，惟你为一点小事无故杀人，绝非大将风度，天理也当有报应。又在此场合，杀人钱行，草菅人命。地方父老、民众对你观感如何，不难想像。望自重、自爱，好自为之，后会有期。”说完即上马率部黯然离去。

第七章 为马氏家族治宁奠定基础

1912年8月底,马福祥率昭武军步骑13营,约3000人赴任宁夏镇总兵,其侄马鸿宾任骑兵中营营长,子马鸿逵任营副,亦随军同往。宁夏平原为甘肃省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黄河贯穿其中,历史上有“塞上江南”之美称及“天下黄河富宁夏”之美誉。贺兰山耸立于银川西部,构成天然屏障。东北与绥蒙接壤,东连陕北,具有重要战略位置。更为重要的是宁夏为回族聚居区,马福祥作为回族军人,来此掌政,易得到当地回族人支持。而宁夏也不是一块平静之地,民国肇建后,一些杆子队、土匪及蒙古上层复辟及分裂势力横行,对当地统治阶层及社会安定都有潜在威胁。面对宁夏杂乱纷呈的政治局面,马福祥主政宁夏后,以武力镇压各种分裂势力及反抗集团,团结满、蒙、回等上层地方人物,加强武装军事力量,以巩固他在宁夏的统治地位。

施计活捉分裂祖国活动的旺丹尼玛

外蒙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清政府对外蒙古一直采取怀柔政策。伴随着清廷的衰弱,沙皇俄国对外蒙加紧渗透和扩张,笼络和收买外蒙上层封建王公、贵族、喇嘛,扶植亲俄势力。1911年底外蒙亲俄分裂主义分子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向清政府最后通牒,称外蒙“宣布独立”,此时穷途末路的清政府已无力顾及外蒙事态的发展。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提出稳住

内蒙,然后再设法解决外蒙问题。当时在外蒙“独立”的影响下,内蒙少数王公企图附和库伦当局,鼓噪“独立”。1913年,靠近宁夏地区的伊克昭盟达拉特旗萨克喇嘛旺丹尼玛在沙俄和外蒙某些王公挑拨下拥兵叛乱,烧杀抢掠,后套一带“腥风扑鼻,尸骸枕藉,愁云暗暗,路无人迹,盖蒙匪肆虐久矣。”^①袁世凯曾派绥远驻军多次进剿,均遭失败。又派山西大同镇守使孔庚率晋军进剿,亦收效不大。马福祥任宁夏镇总兵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决心剿灭以旺丹尼玛为首的分裂分子。

内蒙地广人稀,这些叛乱分子善骑射,又熟悉地形,行动迅速,飘忽不定。“善走驰骋沙漠,疾于风雨,旺亦能军,故行踪飘忽,此出彼没。虽以晋军节制之师,莫能挫其凶锋。包人闻旺将至,勇者色变,弱者骇奔,鸡犬不宁焉。”^②马福祥吸取以前袁世凯多次派大军进剿收获不大的教训,决定采取智取的办法。他认为擒贼先擒王,只要捉住旺丹尼玛,叛乱分子群龙无首,就会很容易被击跨。

马福祥先派阿拉善旗的总管安久到旺丹尼玛处接洽。据说安久为清朝公主下嫁到阿拉善旗的满旗随员后代。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讲和失数。马福祥立即调兵遣将,做好军事部署,以防旺丹尼玛进攻。派马鸿宾、马鸿逵率兵至后套,分驻各要塞。

1913年6月,为了摸清叛乱分子动向,马福祥率百名精锐部属,乘船沿黄河而下,察看后套一带地形及旺丹尼玛行踪。行至官渠,“有匪骑十余,见我舟,鸣号角跃马,作攫拿状”,反被马福祥擒获。经审问得知为旺丹尼玛部游骑,并获悉旺丹尼玛就在附近一所喇嘛庙内驻息。马福祥认为擒获旺丹尼玛时机已到,立即向这十余骑兵佯装道歉,并称久闻旺大名,要他们转达愿追随旺成就一番大事业,然后将这十余人释放。这些人见旺后,将与马福祥遭遇

① 《马氏族谱·叙事集》。

② 同上。

经过如实汇报,旺丹尼玛认为在自己地盘内,马福祥也不敢轻举妄动,并表示愿与马福祥会谈。6月29日马福祥至汇德城。原定在此会面,而旺丹尼玛迟迟没有露面,派人暗中观察马部动静。马福祥遣人给旺送去厚礼,旺也遣使者答礼,一来一往,旺消除几分疑虑。同时随马福祥一起前往的阿拉善旗王府官员也致函旺德尼玛,说有要事相商,邀他到船上计议,旺乃率精骑数百蜂拥而至,这些人打着黄旗,笳鼓乐队吹吹打打,“声闻数里”,看上去很气派。马福祥准备大船三只,作为会见之所,在渡船结彩,并设丰盛宴席。

胆大心细的马福祥策划好智擒办法,一方而派都司景山渡河北岸迎接,邀请旺丹尼玛登船相会;另一方而派都司董继祖持密函速往距此不远的晋军处联系策应。

旺丹尼玛对马福祥的到来表示欢迎,送羊14只犒劳马部。这天旺“冠宝石顶,曳孔雀翎,盛服而来,义容甚赫。”^①看到在马福祥船上会谈,旺心存疑虑,不愿上船,都景山指天发誓,说马将军绝无二心,请旺上船。旺率护驾一行14人来到黄河北岸大船后,马福祥表现出极大热情欢迎旺的到来。景山密告马福祥说旺丹尼玛身带手枪,应小心提防。马福祥不露声色,请旺入座,相互寒暄。此时旺丹尼玛带领的其他随员已被分别请进准备好酒菜的其他船舱,然后就忘乎所以大吃大喝起来。

吃饭当中,马福祥微笑着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没有装子弹的手枪。假言相赠,又假装要欣赏一下旺的手枪,旺不好拒绝,遂即掏出交给马福祥。就在此时,埋伏在一旁的马万良,接到马福祥眼色,抢上一步将旺抱住,众士兵一拥而上把旺捆了个结实,旺丹尼玛随从有几个反抗,被当场击毙。分散在其他船的旺部也被缴了械。同时擒获巴图得胜、韩浮海、彭素胡、鄂木嘉等旺的得力部将。

马福祥看到擒获成功,迅速命令部下解缆离岸而去。留在黄

^① 梁集斌:《宁夏护军使云亭马将军德政序》。

剿灭会匪，保境安民

1914年，马福祥就任宁夏护军使后，面临来自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及甘肃东部各种“独立队”的侵扰，这些成分复杂的“独立队”对马福祥在宁夏的统治构成很大的威胁。

河套地区多为不毛之地，间或有天然牧场和可耕之地，人口稀少，蒙汉民族杂居，各地流民来此较多。又属陕甘绥交界，属于“三不管”地区。民国以来军阀连年混战，许多失败的军阀头目、失意的官僚政客和各路散兵游勇充斥其间，陕绥甘等省对这里均无法实行有效的统治。因此，这里经常出现许多“拉杆”起事的武装组织，当地人称“独立队”或“杆子队”。势力较大的独立队头目有弓占元、卢占奎、金占奎、白彦公等。这些“独立队”成分复杂，经常攻城略地，寻衅闹事，甚而打家劫舍，伺机抢劫经过这一带沿途商旅，“择其肥者劫杀之，弃尸原野，案萃如鳞”^①。由甘肃、宁夏通往绥远、北平的商道几乎中断，成为死亡商道，商人生命财产不能得到保障。这伙匪徒，行动诡秘，聚散无常“饥则攫食，饱则还引如鸟兽散。”^②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的打出“替天行道”的幌子，有的亮出“反袁”的旗帜。另有一些官逼民反的武装群众组织和辛亥革命中的会党残余势力，如陕北的哥老会头目高世秀和甘肃环县的张九才等，也混杂其间。这些武装势力多则几千人马，少则数百人。他们时而联合行动，时而各走他方。从河套平原到陕北、陇东、宁夏到处活动。物产丰饶的宁夏平原成为他们抢掠的主要目标。

下面就会匪几位主要头目作一简略介绍：

① 《朔方道志》卷十。

② 梁隽冕：《宁军剿匪纪略》，见《马氏族谱·叙事集》。

捉住,于是脱离孔军、入伙后套为匪,“匪自得占魁,势益张。以其生长边陲,惯蹶奇险,走间道飘忽如风,命令一队以骑官军。”

从1915年起,马福祥将主要力量用在消灭这些会匪,保护当地商人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以巩固其在宁夏的统治地位。

1915年秋,绥远变兵及会党在河套发难,公推弓占元为首,以狼山为根据地,在五原县东皮房起事,“民国四年八月,会匪弓占元纠众滋扰,出没东西场一带,九月占我东皮房,绥军骑三营分队往击,遇伏稍挫,匪势益张。”“幸宁夏马护军使云亭力顾大局,轸念邻邦,令马统领鸿宾率队援套。”^①马鸿宾率百余精骑,追匪入山,一天一夜急行300里追至科布尔,遇悍匪数百人,博战终日,歼匪百余,缴获许多枪械。当地人称200年来官兵从没深入此地,对马鸿宾冒险猛进,以少胜多啧啧称颂。11月,弓占元率大股悍匪复出狼山,蹂躏河岸各村庄,马鸿宾率骑兵追剿,在五原县巡警配合下,将弓占元逼至汇德城,血战数小时,击毙匪首弓占元、包永华及悍匪10余人,余匪已是群匪无首,各自逃窜。马福祥到五原县巡视,当地人奔走相赞称“当年马帅力擒旺丹尼玛于此地,今日又为我们扫除匪患。”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马福祥与当地军队建立联络,部署共同作战防御计划,之后奉电进京。

袁世凯听了马福祥关于宁夏及绥西地区情况汇报后,袁意识到后套地区社会急剧动荡,对自己统治很不利,竟然有人公开亮出反袁旗帜,令袁世凯很震怒,而暂时还没有力量顾及这一地区。通过智擒旺丹尼玛之事,他看到马福祥是位智勇双全的难得人才,遂委任马福祥会办绥西军务,并准许马福祥扩充军队。

1916年2月,白彦公、金占奎纠合各股悍匪由西山嘴进犯五原,马鸿宾率百余人迎战,一战乌拉濠,再战于百家地,力挫强虏,解五原城围。2月6日,马福祥自京返宁途经五原,适逢金占奎、

^① 王文樾:《马护军使援五原表功记》,载《马氏族谱·叙事集》。

马福祥的营副马成元“怒马贯贼中，枪不虚发当披靡”。其坐骑突然受惊，马成元从马背率下，被众匪所执，敌人看是个当官的，被捆送到卢军营部，有个匪徒为马成元松绑，并温语相问，想从马成元口中探听宁夏城内虚实及军事布防，马成元乘其不备，夺过枪，击倒两名匪徒，跌倒后被周围敌人一拥而上，乱枪刺死，可谓壮烈。

清水营一战，使卢匪元气大伤，卢占奎看到宁夏防备很严，“贼以黄河天堑不能飞渡，欲攻灵武，又怵我军之威势”。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金占魁又一次出来献计，劝卢占奎向西进犯，并声称吴忠、金积两堡有原旧部千余人，良马利械无数，只要我们军队一到，他们会纷纷归附，并可作内应。卢占奎想，如果能将这千余人马纳入自己部下，不但壮了声威，还可进一步向甘肃发展，乃听从金占魁言，决定向西进攻。

马福祥闻讯，立刻调马鸿宾部驻守灵武大寨子，这里是卢匪西犯的必经之地，在卢匪到达之前已布好阵势。马鸿宾空出大寨子诱敌，各道口布下步兵，以绝其归路，左右两边埋伏精骑。5月的宁夏平原，田埂水渠交错，林木掩映。5月4日，卢占奎率部下进驻大寨子，进入马鸿宾伏击圈。卢占奎发现周围一片宁静，没有一个人影，心里难免有些发怵，便问金占魁说：“这里地形不利驻军，我们听了你的话到此，何以至今无人前来响应？”金无言以对，感到危机四伏。其实这里的确有金占魁旧部，他们看到马鸿宾部队的精密布置，料定卢占奎必遭伏击，所以不敢轻举妄动。诸将眼看敌人已进埋伏圈，纷纷请求速战，马鸿宾仍按兵不动，正在想如何将敌人聚歼。此时敌人发现了马鸿宾送弹药的后勤部队正在渡河，一哄而起前往抢劫。马鸿宾登高望之，发现敌人乱作一团，命令出击，一声令下，埋伏在各要隘的步兵一跃而起，切断敌人归路，埋伏的骑兵部队左右出击。敌人反扑各寨，寨门已关闭，不得入，伏兵四起，枪声大作，弹如雨下，卢匪死伤践踏于道。金占魁发觉中了埋伏，准备率众夺路而逃，马鸿宾军中有认识金占魁相貌者，大喊

心理,将张九才部下一个营长叫吴生彦的,改名达尔六吉,冒称清室后裔,奉之为“皇帝”,高世秀自封为御林将军。

吴生彦,甘肃静宁县人,曾以巫医之术在环庆一带谋食,一日环县常仲祥之小孩病危,请吴生彦前往医治,吴装神弄鬼,折腾一阵后小孩病愈,吴生彦“故神其术,恣为妖异之谈”^①。之后,大凡环县有病者,往往请吴生彦住其家,好饭菜供之,惟恐伺候不周。吴生彦又“扶箕问休”,听信阴阳家之言,认为自己有帝王相,是真命天子。时张九才欲肇乱,便利用吴生彦,谎称吴为清室后裔,称达尔六吉,奉以为帝,远近传播。官军到处搜捕,吴生彦东躲西藏,日子很不好过。不久,卢占奎率残部自沙漠窜至环县,与之合势,势力大增。在张九才等的欺骗宣传下,许多老百姓深信达尔六吉有天命,纷纷归顺。张九才、卢占奎拥达尔六吉走陕北定边,“定边乱首高世秀附焉”,贼势益更强大。他们合力攻下定边县城,大掠七日,县城被抢劫一空,直接威胁宁夏地区。马福祥命马福寿率兵讨之,卢占奎闻讯,先与达尔六吉、张九才率新附之贼向北窜到后套蒙古地区,高世秀带领千余人迎战马福寿,被马部击溃。

达尔六吉到达后套蒙古地区,用“清帝号诱协蒙人,鱼肉商民,乘机逐利,四出侵暴。”达尔六吉为取得蒙古王公的信服,以磷磺涂抹于衣帽之上,或在坐卧处画以龙形,夜间显出磷光进行蒙骗^②。经过这一系列装神弄鬼活动,骗得蒙古王公的信任,其部也得以在蒙古地区休整和发展。

1916年底,高世秀、张九才利用假皇帝之诏令,联合蒙古诸部发动了乌兰脑包之战,迎战前来征讨的绥军,结果绥军大败,缴获大量军械弹药,达尔六吉声威大震,盘踞河套地区的许多散兵游勇和小股势力纷纷归顺,其部众号称数万人,力量大增。“蒙古各王

① 梁勇疑:《宁军剿匪述略》。

② 高广昌:《高世秀传略》,载《宁夏文史》第12辑。

公都恒怯瑟缩莫敢抗，纷纷遣使贡珍物械马”。六吉愈恣睢无忌，面受朝贺，用玉玺封官爵，乘黄缎驼轿，并有銮驾随从。所到之外黄袍加身，一些蒙旗的王公仕官都得九朝六拜，普通人很难看见他的容貌，可谓显赫一时。后来卢占奎率部下投降绥远军，被编入绥远都统蔡成勋的北洋第一师。达尔六吉很不高兴，失卢占奎如失左右手。“高世秀遂进西犯之策，以为胜可以据宁夏，图中原；败则乃走陕北，入黄陇山，号召三边豪杰再议大举，末晚也。”六吉大喜，连夜引汉、蒙数千人自绥区西山咀渡河上犯。这一策略导致了达尔六吉的彻底覆灭，因为他们低估了宁夏马福祥的实力。

1917年3月，高世秀拥达尔六吉渡过黄河后，一度攻占了磴口，此地为水路要冲，各洋商均集于此，货财山积。这帮贼人早已垂涎已久。“世秀拥六吉疾走登口，掠米谷货宝达数十万金。烽火亘天，男女避难沙窝，死者垒垒。”在此之前，高世秀派遣心腹，化装成商人密布宁夏城“以重利啖诸奸民，谍暗杀作内应。”这时高世秀密探打听到马福祥不在宁夏城，高世秀认为机不可失，立即决定分两路攻打宁夏城（今银川），一路由军师于凌云率领绕道阿拉善旗，越过贺兰山由西面包围宁夏城，一路由高世秀自己率领与达尔六吉经石嘴山、平罗，沿贺兰山东侧向宁夏进攻。

当时马福祥正送太夫人灵柩回老家河州安葬。马福祥母亲韩太夫人早于1915年4月去逝，临终前一再叮嘱马福祥把自己送回老家安葬，由于当时宁夏政局未稳，匪患未除，暂将太夫人遗体葬在新城双渠口。1916年底，绥远抚局告成，马福祥向兰州政府乞假葬亲，准备把母亲遗体搬回老家河州安葬。1917年3月，马福祥扶柩西行三日至宁安堡（今中宁县境内）接到马鸿宾发来急电，得知高世秀挟伪皇达尔六吉上犯宁夏，马福祥遂嘱其兄福寿送“埋体”^①回河州。马福祥先派遣一名卫兵乘快马到达宁夏城，密令

^① 即遗体，回族专用语。

福祥剿匪战斗评价说：“论守则狼山三百里据险扼要，丝贯绳连，势如山立，兵不可撼；论战则风驰电掣，离奇变化，无敌不摧，无坚不破，此岂有异道以致此哉。马军使恢廓大度，珍爱士卒，翕然如家人、父子，故人皆用命。”^①

马福祥的剿匪行动也得到各地方各阶层人士的好评。五原县知事王文犀撰《马护军使援五原表功记》，宁夏护军使署军佐梁隽冕撰《宁军剿匪纪略》，兰州市各界人士公立《马上将军功碑记》，宁夏文人王树楠撰《马护军使功碑记》，朔方商民公立《马护军使云亭公德政碑》。这些碑记对马福祥组织的剿匪经过进行了详细记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朔方商民公立《马护军使云亭公德政碑》反映了宁夏商民对马福祥绥靖地方，保护商贸流通之功绩进行记述，全文如下：

附：马护军使云亭公德政碑记（朔方商民公立）

辛亥改革之初，宁夏惨遭兵燹，市面萧条，商旅交困。民国二年，护军使马公来镇是邦。迄今五载，疮痍尽复，百货畅销，富商大贾，接踵而来。市廛繁盛，闾阎栉比，商战之利，甲于全甘。微公频年用兵，竭力保护，凡百商民其不流离转徙者希矣。公莅宁阅月，库伦犯顺，内蒙旺丹尼玛应之，沿河抢掠船只，杀人夺货，宁夏大震。公亲率健卒擒旺于汇德城，而河运通，公之保商一也。

民国三年，公还至京师，值犯匪乱甘，烽火亘天，城市邱墟。公派队追剿，并布置宁防，贼难蹂躏窥向宁夏，公之保商二也。

民国四年，倏匪肆扰，行踪飘忽，后套千里一片贼氛，宁夏

^① 王文犀：《马护军使援五原表功记》。

第八章 与陆洪涛争夺甘督

马福祥任宁夏护军使后,消灭了盘据宁夏及后套一带为匪多年的杆子队,活捉伪皇达尔六吉,宁夏局势稍为稳定。之后,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发展地方生产和民族教育上,“匪氛廓清,四民乐业,至今咸利。”“赖之其兴学,以宏教育筹巨款,扩充中学,设立各县小学数十处。为培养宁民子弟,复捐款遣送学生赴平津留学,至今戍村颇多桃李,尽在公门。”^①此外如筹办旗民生计,厉行禁烟,繁荣城市,疏浚河渠,整理路政,通惠工商,赈恤震灾,主修《朔方道志》,“凡为地方弭祸患,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巩边防,为西边浚文化者,无不竭尽心力而为之,十年如一日。”马福祥治宁八年,民乐边实,社会治安良好,人民安于生产,百货畅销,富商大贾接踵而来,市场繁盛,街市栉比,“商战之利,甲于全甘”。几年后,确实使宁夏地区社会面貌有较大改变,回、汉、蒙各族人民和睦相处,马福祥本人也在宁夏各族人民中赢得很高声誉。其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在宁夏建立了稳固的统治秩序,充分显示了马福祥文治武略及治理地方才能。但他并不满足宁夏一隅之地,他曾积极活动,广结四方朋友,与北洋政府及西北地方上层人物设法建立关系,将争取甘督作为下一步进取目标。甘肃为西北第一大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谁坐稳甘督之位,就等于控制了西北政局。加之甘肃是马福祥的家乡及家族武装势力起源地,随着马福祥在西北地

^① 《马氏族谱·叙事集》。

区声望日隆，遂参与了一系列角逐甘督的斗争。

联名发起驱逐张广建

辛亥革命后，整个甘肃又陷入了封建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时期，先是清朝旧官僚赵维熙与回族军人马安良之间明争暗斗。赵维熙深恐马安良势力过大，抢夺自己的都督宝座，乃网络亲信，暗地里发起一场迫使马安良退出兰州的阴谋。1913年农历除夕，赵维熙指使其门生甘肃巡警道赖恩培密谋挑起回汉军队之间的斗争。先由赖恩培派人持函向马安良说陆洪涛部和周学务部两军有变乱动向，意在驱逐回军，要马安良多加戒备。同时又函告陆洪涛、周学务部，说马安良回军将袭击汉军，请加戒备。双方得信后都半信半疑，马安良认为回汉士兵虽时有摩擦发生，但上层长官常保持来往，何至无端滋闹。想至此，急忙派人去陆、周两部访问，才知有人背后挑唆。赖恩培阴谋败露，赵维熙感到自己难以在甘肃立足，遂于1913年6月请假赴京，保荐内务司长张炳华护理甘督。

张炳华是赵的亲信，他不仅为报答赵维熙而滥用权力，继续与马安良进行斗争，引起各界群众的普遍不满。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在西北的统治，在张炳华仅护督8个月后，即派北洋军阀张广建代替张炳华为甘肃都督。

张广建入甘后，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极力排斥和削弱地方军阀势力。首先整编军队，将自己带来的混成旅千余人扩编为新建左右两军，左军由吴樊桂统领，驻省城；右军由吴桐仁统领，驻军临洮要地，余力对付实力最强的回军马安良。同时又从淮河北精挑千余人，组成卫队三营，以亲信孔繁锦为统领，驻扎督署。这些军队受袁世凯支持，配备了较精良的武器，实力远强于甘肃原有回汉地方驻军。

张广建的新军扩编成后，为清除马安良势力出兰州，他一方面

州进发,自己率骑兵为后援。一切准备就绪,马福祥想了解一些外界舆论,随便问身边幕僚何朴:“此次出兵驱张,外边有啥舆论?”何犹豫片刻便回答:“将军此举,知道内情的人说是为民除害,不知的人说回回又造反了。”这句话刺激到马福祥神经,立即电令行至中卫的马鸿宾停止待命,不得前进一步。

马福祥自认为是科第正途出身,一生小心行事,平素以和睦民族、维持和平为职志,平生最忌有人把“造反”二字加在他身上,所以他宁可不当督军,也不愿冒此逆耳之名。但事已发动,势难终止。马福祥通电各镇守使,决定放弃武装进攻的办法,改为和平夺取的方式。1920年12月,乃联合各镇通电声明与张广建脱离关系,不受张节制,直接听命于北洋政府^①。

此时,在北京上学的甘肃学生、同乡会、同乡议员等集会游行,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罢黜张广建。曹锟、张作霖等向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保举马福祥出任甘督,但北洋政府不愿放弃对甘肃的控制,曾有调绥远都统蔡成勋为甘督之议,遭到甘肃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兰州各界人士上街游行示威,并通电全国,反对“蔡老虎”(蔡成勋,字虎臣)督甘,抵制了北洋政府继续伸手甘肃的企图。一时间甘肃政局动荡,人心浮动。

甘肃各镇军人认为在驱张活动中马福祥出力最大,因而马福祥出任甘督的呼声最高。马福祥也认为机不可失,如果能抓住时机,取得成功,就可以完成多年来督甘心愿。决定亲自出马,致电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望他追念前劳,婉转表达出希望任命自己为甘督。原电大意:庚子之际,联军入侵,先兄马福祿率兄弟子侄保卫清室,前门喋血,以身殉职,忠骨累累,丛葬京师……福祥束发受书,敬恭桑梓。乙未河湟变起,团结汉藏,毁家纾难。辛亥革命,翊赞共和,拥护中央,调停黄钺独立,弭患无形……

^①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张广建看到省内外反对他的声势很大,势难再恋栈下去,匆匆收拾行李,于1920年底被迫离职。

与陆洪涛争夺甘督

张广建离甘后,继任督军人选一时成为甘肃回汉八镇争夺的焦点。属于回族军事集团的是:宁夏镇守使马福祥,凉州镇守使马廷勳,甘州镇守使马璘(东乡族),西宁镇守使马麒;属于汉族军事集团的是: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陇东镇守使陆洪涛,肃州镇守使吴桐仁,河州镇守使裴建淮。这两个军事集团都基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成见,进行割据称雄,互不相容,在反对和罢黜张广建的行动中,回族军事集团起了主要作用,也有裴建淮等汉族集团参与。一旦驱逐成功,他们内部矛盾就马上表现出来,即有回与回、汉与汉之间,又有新旧不同,地域不同,教派不同的矛盾,因而所谓“甘人治甘”的要求,在这些矛盾中是无法实现的。

由于他们本身的利害不同,回族军事集团以马福祥为首,汉军集团以陆洪涛为首,各自标榜,明争暗斗。回族军事集团为巩固和扩大地盘,拥戴马福祥出任甘肃省督军。而汉族军集团中的陆洪涛亦急欲取甘督而代之,于是陆、马之间矛盾尖锐对立,彼此使出浑身解数。当时马麒联合马廷勳、马璘及伊斯兰教哲合林耶教主马元章,遗代表聚集宁夏,计划以武力拥护马福祥赴兰州,出任督军。

马福祥亦派遣其子马鸿逵前往北京活动。马鸿逵先后拜访曹锟、张作霖等几位实力派人物,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与保荐。徐世昌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也表示支持马福祥出任甘督,但任命书却迟迟没有发表。靳云鹏派秘书长张之潭与马鸿逵接洽,问及马福祥治甘的计划与意见,马鸿逵说不能代表其父回答,张要马鸿逵转达其父,请马福祥尽快以书面形式答复此问题。几天后,张之潭通

过同乡向马福祥父子婉转提出要求筹款40万银元送国务院,任命即可发表。马福祥听后,一笑置之,认为自己无力筹此巨款。这可能是马福祥督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马福祥在与陆洪涛争夺甘督斗争中,为了壮大声势,将伊斯兰教哲合林耶教主马元章也拉入自己阵营。当时马元章为重振哲合林耶门宦,曾主动联络汉族商绅及政界要人,在政界非常活跃,在甘肃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马福祥以同教关系,请马元章向总统府保荐,促成此事。马元章满口答应,而背地里向徐世昌发电称:“要想西北民众安居乐业,愚见还是陆公适宜,而当地人做当地官没有不培植私人势力的,此千古通例,祈总统明察。”^①徐世昌对马元章意见很重视。这封电信对马福祥争夺甘肃增加了不利因素。马元章从兰州回到西吉滩不几天,在1920年12月16日那场震惊中外的海固大地震中遇难。

再说以陆洪涛为首的汉族军人一致反对马福祥督甘,也与张广建挑拨回汉关系有关。张广建离甘时,有意将督军信印交给陇东镇守使陆洪涛,并在北京力荐陆出任甘督。陆洪涛为抵制马福祥,指令其邦统张兆钾召集陇东将领在其私邸开会,插血为盟,领衔通电北洋政府及各方,反对马福祥督甘,电文中有“汉回世仇,如果中央不顾舆情,演成事实,彼等将以死周旋”等语。陆洪涛和孔繁锦部也会集兰州,准备武力对抗马福祥,迎接陆洪涛就任督军。他们还激化回汉之间矛盾,声称“回军当权,汉军将无立足之地”。张兆钾也宣称“愿领八千健儿,送陆赴兰”就任督军。

至此,马福祥与陆洪涛争夺甘督发展到剑拔弩张之局势,特别是陆的邦统张兆钾把个人的争权夺利故意夸大为回汉民族之争,故意煽动,蓄意制造民族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马福祥审时度势,担心僵持下去会酿成战乱,祸害地方,当即表态说:“甘督问题自当

^①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近代卷)。

服从北京政府命令决定,本人毫无成见,不愿为争个人权利而引起回汉两族之间的恶感,轻启衅端”^①。表示为顾全大局,愿自动退出甘督之争。

在京的甘绅、国会议员秦望澜、宋梓等深恐酿成战乱,向北洋政府力荐陆洪涛督甘。1920年12月31日,北洋政府为缓和矛盾,乃调马福祥为绥远都统,由陆洪涛护理甘肃督军,任命马鸿宾为宁夏镇守使,张洸钾为陇东镇守使,甘肃移督风波自此告一段落。

马福祥在甘督之争中虽没能如愿,但对取得绥远都统一职却出之意料之外,其侄马鸿宾也继承他的职位,代理宁夏护军使。宁夏与绥远相联,可互为策应,马福祥对最终取得这一职位还是满意的。

争夺甘督风波平息后,西宁镇守使马麒对马福祥遇到阻力自动退出的行为一度不满,特别对陆洪涛争督时提出“回汉世仇”之语甚为气愤,在陆洪涛督甘期间,回汉军人之间对立情绪仍十分严重。马福祥多次去信,向其他三位镇守使解释他主动放弃的原因,希望得到他们谅解,同时对他们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马福祥劝他们从维护民族团结及社会安定大局出发,服从北洋政府的决定。

出任绥远都统

绥远地处我国北疆,当时是一个特别区域,辖一道、四厅、八县,兼管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1914年设绥远特别行政区,改将军为都统。民国初年,与内地相比,这里相对较落后,依然是单烟疏村,野色苍茫的地方。马福祥将宁夏工作交与其侄马鸿宾后,于1921年春与其子马鸿逵率一旅人马赴绥远就职。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授予马福祥二等文虎勋

^① 宋干臣:《我所知道的马福祥》,原件藏甘肃档案馆。

章、晋勋二位以示安慰。

马福祥离开宁夏时,将昭武军和新军留给三兄马福寿和侄马鸿宾在宁夏看家。马鸿逵的“第五混成旅”只是从北洋政府那里刚刚要来的一个空番号。他上任绥远都统后,甘肃诸马都给他拨添人马,以示支持。马麒派其子马步青带一团骑兵前来,甘州、凉州也各派来步兵一营,三马相帮,使第五混成旅有三千人马的基础。同时收容过去在绥远驻过防的毅军、淮军、绿营及张绍曾、潘矩楹、蒋雁行、蔡成勋等历任将军都统遗留下的失意官佐和散兵游勇,组建成第二混成旅,郑金生被任命为旅长。给河州人蒋辉若在包头成立了一个骑兵支队。这样,看似兵力不少,而实际上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队战斗力及兵员素质很差,也难以驾驭。

马福祥到绥远后,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首先是绥远地区社会很混乱,盗匪多如牛毛,势力较大的股匪如王英、苏雨生、赵有六子等共约两三万人。另有帮会组织及哥老会遍布社会各阶层,过去曾多次清理,但收效不大。特别是一些地方军政人员与匪暗中勾结,互通信息,甚至与匪进行弹药、武器等买卖交易,当地人民深受其害。马福祥决定一方面整训军队,加强实力;一方面清除官府内通匪内奸。

马福祥派马鸿逵驻兵包头,配合保安司令蒋辉若进剿绥西匪患。两年后,绥西股匪大部分肃清,王英、苏雨生等头目向马福祥降服,一些小股散匪见大势不好,自动放下武器,改邪归正,回乡务农。

归绥一带哥老会势力也很大,并拥有武装,时常与马福祥做对。哥老会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革命党人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后来由于其组织松散,为各地方派系拉笼利用,特别在地方乱征粮饷,演变成地方一大祸害。

马福祥考虑到绥远哥老会势力过大,对自己统治不利,便采取一系列分化、瓦解、利用哥老会的措施。其中以王同春势力最大,

20年代,一些势力想拉笼利用他,也有一些势力想吃掉他,所以马福祥只能在缝隙中求生存。袁世凯上台后,他一味讨好袁世凯,以后又依附了段祺瑞和曹锟。但根基很浅,一直没有一个坚实的靠山。只因为马福祥拥有一支回族武装势力,北洋军阀想利用他来笼络西北回族。虽然他晋升为上将,但北洋政府很少给他补充给养,而是由自己筹划。他到绥远后组织了一支商队,从甘肃、宁夏、绥远至北京一线做生意,贩卖皮货及烟土,以解决军饷。绥远是个蒙汉民族杂居区,民族关系较为复杂,马福祥作为一个回族来这里执政,不容易得到当地民众支持,加之绥远哥老会势力很大,常与他做对。对汉蒙民族及各种上层人物尽力拉笼,小心谨慎,将局面勉强维持下来,所以马福祥在绥远五年的政绩不比在宁夏突出。

第九章 投靠蒋介石

冯玉祥国民军开进西北，给西北各派回族军事实力带来很大的压力，马福祥自知势单力薄，不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对手，很不情愿地让出了绥远都统位置，并将马鸿宾所率领的部队并入国民军建制，而自己则以“西北边防会办”一职闲居京津。这一时期马福祥一边潜心钻研伊斯兰经典，一边静观时局变化，等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

拜谒孙中山

民国初期，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刻，由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缔造的共和政体不断遭到破坏，多种政治势力并峙发展。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称雄发展，段祺瑞当政一年后，又出现张勋复辟，西南军阀纷起，护法运动、南北议和、直皖战争、直奉联盟。中国社会陷入风雨飘摇之中。马福祥认为，只有寻到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才有发展的机会。否则，在没有法律约束，没有秩序可依，强敌如林的对手中很难立足，这支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武装力量很容易被吃掉。

马福祥自清末以来，挤身宦途数十年，在各种势力较量中能清醒认识自己的地位与作用，练就了圆滑世故、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的本领，能在动荡不安的政治斗争中认清方向。辛亥革命时期，他通观达变，由“清朝元老”变为“北洋军阀”，投靠蒋介石又变为“国

任命马福祥为师长,统帅三个骑兵旅与张作霖作战。因三个旅分头行动,马福祥的师长也是徒有虚名。

1926年,段祺瑞又任命马福祥为“航空督办”,驻节山西平地泉(今山西丰镇),那时国家四分五裂,哪有实力搞航空事业,实际也是有名无权的虚职。马福祥拜见了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成了阎的座上客,二人并成了换贴兄弟。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此时马福祥居于北京、天津,潜心钻研伊斯兰经典,静观时局变化。这期间他先后捐资委托北平清真书报社刊印明清之际伊斯兰经学大师王岱舆所著《希真正答》和马注《清真指南》,并为之作序。

国民军人甘后,马福祥父子表面对冯玉祥表示臣服,但对冯夺其宁夏、绥远地盘,一直耿耿于怀。1927年还在北伐进行之中,马鸿逵敦促其父南下谒见蒋介石。马福祥也看到蒋介石的黄埔系已形成了一个比效坚固的军事集团,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民党军队统一,是可依靠的实力派。马接受其子建议,于当年夏末专程去南京拜见蒋介石。

要面见蒋介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福祥花钱送礼给蒋的随从人员王世和,才有了与蒋接近的机会。有人曾说:“马福祥真会做人,见不到蒋委员长并不抱怨,不发牢骚,也不说自己坐了冷板凳,更不发脾气。反而逢人便说蒋委员长工作真忙,连我去见他都抽不出时间来相会。这种情形常此下去,会把委员长的身体累坏了。马去求见蒋的次数多了,说过这种话的次数也就更多了。你传我,我传他,传到蒋介石耳中,蒋认为马是诚心诚意拥护自己的人,遂得以被接见。”^①马福祥以西北回民领袖的身份向蒋陈述统一安定北方之大计,他说:“国家在和平统一以后,必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才可以巩固统一。而团结民族,首先要疏通各族的意见

^① 曹福谦:《补充马福祥、马鸿逵父子的几件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和关系,重用各族的代表人物,并使他们对三民主义有所了解,以期团结各族,共同为国民革命努力。”正要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听后十分欣喜,认为马福祥是西北回族中的实力人物,有政治头脑,熟悉北方政情,又拥有马鸿逵、马鸿宾两支军事实力,是一方可资借用的力量,即委任马福祥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后马福祥看到蒋介石势力不断壮大,乃设法与蒋接近,对蒋介石极力迎合。并吹捧蒋说:“当今之世,统一中国,舍介公其谁。”将自己刊印的伊斯兰经书送予蒋介石阅读。蒋介石本生长在南方,对回族与伊斯兰教了解其少,通过与马福祥接触,知道了一些实情,这对后来国民党对回族伊斯兰地位的界定及政策的制定具有较大影响。1939年7月26日,蒋介石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讲话时称:“中国有许多佛教、基督救、回教,可以说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称回民。宗教传布之目的,在于普遍,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资格,未免将本身资格变得狭小,不是宗教之本意。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族人不能信仰回教么?过去我和马云亭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以为中国的回教,多半是汉族信仰回教。”^① 1940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蒋介石的这次谈话发布通告,认为回民“除其宗教上之仪式外,其他一切与汉人无异,这与信仰耶稣教、天主教之教徒相同,故只可称回教徒,不可称为回族。”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②。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马福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马鸿逵看到其父在国民党中地位日益巩固,也积极筹划,准备叛冯投蒋。他将自己与冯玉祥内部专用的电台密码通过其父泄露

^① 《回民言论》第2卷第2期(1939年7月30日)。

^② 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收买。5月马鸿逵到达河南开封,韩对马进行拉笼,劝其叛冯投蒋,马鸿逵早有叛冯之心,当即答应。可是马鸿逵在召开旅以上会议,商量此事时,马的参谋长罗震提醒说:“不可叛冯,况且老都统(指马福祥)还在潼关,与冯住在一起,如随韩东开,岂不要连累老都统吗?”马鸿逵左右为难,如不随韩,恐被消灭,急得大哭一场,最后还是决定叛冯。马鸿逵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当然事已过去,怎么说都由他自己,他说:“我在洛阳起义时,父亲适在潼关冯处,当时有人警告我,老太爷在潼关,安全甚尤,劝我考虑,我说:‘起义决心已定,不可动摇,如果父亲遭遇不幸,系为国牺牲,人生总有一死,但求得其时,死得其所耳。’”^①

马福祥接受蒋介石旨意,上华山游说冯玉祥后,还没来得及返回,听到儿子叛冯的消息,非常震惊,心想这不孝之子,也不选个时机竟不顾老子安危,在此节骨眼叛冯。冯玉祥听到马鸿逵背叛自己消息后,非常恼怒,责骂马福祥父子脚踩两只船,将马福祥软禁在华山。驻防陕西朝邑的马鸿宾听到叔父的危险处境后,亲自上华山,向冯玉祥求情。冯考虑到自己要对付蒋、阎,正是用人之际,不可因此事得罪马鸿宾。马鸿宾见冯后,首先说由于他们平时教育无方,发生了马鸿逵的叛逆行为,现在愿将部队立即交出,请冯派人接管,自己在冯身边听候差遣,以赎前愆,冯听后怒气稍平,说:“马鸿逵的事,不干你的事,事实上你们父兄也管不了他,我对你仍旧相信,不必顾虑,好好练你的兵。”当时冯玉祥正商量对付蒋、阎的办法,马鸿宾建议讨伐蒋、阎不可并举,冯听取马鸿宾意见,决定联阎讨蒋,提出要派一人前往山西与阎锡山联络,马鸿宾乘机说叔父与阎锡山是换贴兄弟,是最合适的人选。冯表示同意,马福祥乘机脱离险境,回到南京。

马鸿逵、石友三、韩复榘于5月22日在洛阳发出通电,声明维

^① 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香港文艺书屋,1984年版。

第十章 “雷马事变”时的马福祥

1929年,蒋冯战争爆发以后,刘郁芬奉调赴陕,就任国民军后方总司令,吉鸿昌部也相继赴豫作战,冯玉祥分任孙连仲、马麒、马鸿宾为甘肃、青海、宁夏省主席。国民军的大部东调使甘宁青三省防务空虚。冯以为“打倒蒋介石是破釜之举,必须全力以赴”,因此只将驻张掖的雷中田旅留守甘肃,进驻兰州。1930年4月,孙连仲东调,甘肃省由八大委员主持,冯玉祥任命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但因时局动荡,中原大战尚无结果,马鸿宾认为前途未卜,托故不就,以便观望。

推荐马鸿宾出任甘肃省主席

1930年10月,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彻底失败,经马福祥多方奔走游说,蒋介石收编马鸿宾部为新编第七师,马鸿宾任师长。同时蒋介石为控制甘肃,拟委派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因马是甘肃人,熟悉当地政情,在反冯中原大战中对自己忠心耿耿,且立有战功。此时马福祥出面,要求改派自己侄子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理由是马鸿逵脾气躁,容易得罪人。而马鸿宾性情柔和,有儒将风度,完全可以胜任。蒋介石还没有见过马鸿宾,对他也不太了解,但在马福祥的竭力推荐下,遂发表马鸿宾为甘肃代主席,同时发表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认为宁夏地盘太小,对堂兄得到甘肃省主席职位不服气,产生抵触情绪,坚辞不就,并给父亲耍脾气,

要求辞去一切职务，到海外留学。

马福祥偏爱马鸿宾还有另一原因，他认为自己是继兄长马福祿的余荫才有今天，所以对兄长之子关怀倍至，视如亲子。他对马鸿宾出任甘肃省主席很有信心，曾说：“子寅（马鸿宾字）要是治不好甘肃，再没人能治好。”

马鸿宾由于有其叔父马福祥撑腰，宁夏省政权还掌握在自己手中，临行前他让叔父马福寿代理宁夏省主席，欣然接受蒋介石任命，于1931年元月率步兵一团，骑兵一营和一个手枪营到兰州就职。

当时甘肃省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马鸿宾上任后对甘肃政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引起部分人不满，尤其与雷中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1931年，冯玉祥为了东山再起，授意雷中田扣留马鸿宾，夺取省政权。8月7日，南京政府改组甘肃省政府，正式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雷中田看到马鸿宾的地位日益巩固，而自己连个省府委员职位也没得到，而蒋介石派到甘肃省的视察员马文车也只得到一个省政府委员的虚职。他们认为甘肃省政府改组名单是由马福祥在南京内定的，因此迁怒于马福祥叔侄，马文车与雷中田联合起来共同倒马。

8月25日，雷中田发动军事政变，拘留了马鸿宾。经过激烈战斗，解除了马鸿宾在兰的全部武装。26日上午，兰州市各交通要道贴出雷中田的布告，一般群众才知道发生了马主席被扣的事变，布告原文如下：

为布告事，照得军阀马福祥、马鸿宾夙蓄扩张地盘之阴谋，冀填自私自利之欲壑，蒙蔽中央，把持甘政，蔑视全陇汉回蒙番，重兴帝国主义，实与先总理革命宗旨大相违背。溯自马鸿宾擅代甘肃省政府主席以还，所为罪恶，罄竹难书，举其大

者如：(一)庇匪殃民；(二)把持财政；(三)私运枪械；(四)操纵金融；(五)侵吞公款。已属罪无可逭，还复招收土匪，且外引马廷贤率部北犯，扰乱治安。中田驻师是邦，除暴安良，自属天职，兹遵从中央视察员马心竹暨陕甘边防督办代表赵晚江之协商，重以全省党政军学农工各界大义之责请，不得不随诸父老兄弟之后，先事预防，共维甘局。凡我汉回蒙番同胞，自当一视同仁，无有畛域。除呈报中央外，为此布告周知，其安居乐业，无得自相惊扰，致貽伊戚，切切此布。^①

“雷马事变”发生后，引起甘肃省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响，甘肃地方实力派表面上倾向马文车、雷中田组成的临时政府，青海省主席马麒和师长马步芳在复电中表明：“军事政事又得兰政(雷中田号)总司令、心竹(马文车号)暨各委员协力维持，此诚甘民之幸福。”当时甘肃的一些人对马福祥父子叔侄在甘、宁各省的扩张倾向也有不满，这其中也有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在回汉之间所造成的矛盾和隔阂因素，如甘、宁、青旅北平同乡会在通电中称：“马福祥以昏庸老朽之官僚，侧身中枢，自以为精通西北政情，俨然西北霸主。”就连蛰居四川多年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了利用甘肃的混乱局面，拉笼各方势力，准各东山再起，以“兴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由四川入甘。总之社会各界倾向及各种舆论对马福祥、马鸿宾都极为不利。

出面为马鸿宾辩解

雷中田在布告中，将矛头直指马福祥。当时马福祥由安徽省主席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他接到宁夏省政府和马鸿逵的电报后非常吃惊。没想到马鸿宾刚上任半年时间，就出现如此状况，认

^① 张慎微：《“雷马事变”见闻》，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察之员，马主席鸿宾对之推心置腹，并迭电保其为省委兼民厅或财厅，虽仅发表省委，而鸿宾总算仁至义尽，不料以视察之员，有此不法之举动。至雷中田布告鸿宾各罪，尽皆无稽之辞。

接着马福祥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在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时说：“马鸿宾主席系由中央任命，决听候中央处理。该省驻兰暂编师长雷中田原系冯玉祥旧部，月前石友三叛乱，雷曾受某军军长；此次政变事先与陇东陈珪璋、鲁大昌勾结，将马主席监视于兰州城内，借口称马鸿宾为军阀余孽，祸害甘省，为此组织临时政府……至政变后，驻宁夏之马福寿、肃州、凉州、甘州之马步云，西宁之马麟各部，亦不出兵向兰州前进，惟有听候中央办理。”^①

马福祥给蒋介石的加急电报发出四五天后，仍不见回音，很是着急，又电调驻泰安的马鸿逵十五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议海涛来南京，面授机宜，然后派海涛飞往南昌求见蒋介石，提出释放马鸿宾的要求。海涛见到蒋介石后转达了马福祥的意见，蒋很客气地说：“我接到马委员长（指马福祥，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电报后，即电马文车叫他回来，他给我回电说已启程到兰州东郊不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即东岗镇），不知这个家伙为啥又回去了。”

蒋介石又亲拟一份口气较为强硬的致雷中田、高振邦的电稿，命秘书立即发出，将原电稿交海涛转马福祥过目。蒋介石又对海涛说：“我本想让少云（即马鸿逵）到甘肃去，但马委员长说，甘肃是他的家乡，少云脾气躁，容易得罪人，子寅柔和还可以应付环境。我料到子寅去了，会出这样的事来。”

海涛办完事回到南京，将经过向马福祥做了详细汇报，并转交了蒋介石亲拟致雷中田转马文车的电文原稿，内容如下：

^① 张慎微：《“雷马事变”见闻》，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权，纵庇匪恶，并以凉州镇番各地所遭兵燹亦诬为福祥与鸿宾所为。其颠倒是非，混淆事实，凡稍知甘肃政情者，均能立辨其伪。原不值置辩，惟犹不能不为钧座一言者。

查鸿宾被任代理甘肃省主席，事在去年十二月，时值甘肃大战之后，兵匪横行，流亡载道，如无政府，民犹倒悬。鸿宾以本省之人，受命于丧乱之际，支撑应付，倍感艰难。迭以才力弗胜，屡请另简贤能，以免丛胜。其后阅时两月，迫于中央一再之电促，省方各界络绎之呼吁，义无可却，始轻骑简从，由宁赴兰。同时又向钧座声明暂代，时间至多两月。

抵省以后调解纠纷，安辑流亡。对于兰州原驻各军加意抚恤，对于中央所派视察诸员马文车等，和衷共济，迭次电保，足为明证。凡此事实皆具案牘，岂福祥个人所能曲为解脱？至此次改组省政府之举，亦因半年以来，甘省除主席外各委员均未任命，遇事推诿，无法处理。中央念边政重要，始于旧日各委员及各视察员中分别任命，俾专责成。鸿宾虽仍任主席，而受命之后，仍迭电恳辞，声明暂任过渡。则其平日对于名利尚知淡泊之心，亦当为钧座所共鉴。通电竟以攘窃政权妄想裁诬，殊乖事实。至福祥个人，离省已十余年，对于桑梓虽有恭敬之心，对于子侄切实殷满之戒。前次顾军长祝同奉命入甘，福祥迭电敦促，并迭恳钧座令促速行。原虑阴谋日久，隐患方滋，鸿宾若得早卸存肩，实所厚幸。

今通电所列，对祥个人亦复任意罗织，横加诬蔑，抑何可哂。至甘肃连年惨遭兵祸，均归咎于祥之所为，则于事实相去益远。查镇番凉州前后迭遭兵匪，事在民国十七八年，而鸿宾于十六年已由宁夏率队东征，福祥亦离甘已久。对于乡邦灾乱，实仅耳闻。且是年兵匪之患，福祥全家受害最烈，导河、宁夏两处庐舍，同为煨烬，事实俱在，尸咎为谁？至马廷贤等与祥既非一族，平日意旨尤不相合。去冬鸿宾奉命主甘，马廷贤

即首反对，文电俱在，均可覆按，何以张冠李戴，混为一谈。鸿宾受代主席，事事退让，省府及城垣警卫，均由雷中田部驻守，出入办公未携一卒，曾身家责任之所在，何便衣入城之足云。凡此颠倒蒙蔽之词，更不值识者一噓。是该电所云各节，是否事实，公道天理如未尽泯，是非顺逆不难立白。现时兰州附近少数部队，全数撤退宁夏，肃、凉、青海各处驻军，亦严守原防，悉听中央公允办理。惟甘省久苦兵旱，省中各界，方日拥护中央，祈祷和平。今忽有此横逆之电，苟非威胁，定系捏名，其中操纵，亦仅一二人而已。钧座德威，无远弗届，伏乞鉴别是非，整饬纲纪，绥定西服，奠安边圉，国家幸甚，甘省幸甚。临电屏营，敬候训示。

福祥老矣，远离乡土，垂十余年，素怀息影之心，竟召无因之谤，自惭凉德，无补时艰。惟是弁髦纲纪，国有常刑，颠倒是非，世存公论，诚恐远道传闻，淆乱事实，用布区区，诸希明教。

马福祥叩三十日

再说蛰居四川多年的吴佩孚突然给马福祥来电说他要游历西北，并调解马鸿宾事件。马福祥曾与吴是换贴兄弟，不好拒绝，但他知道吴北上肯定是另有企图。马福祥持电向蒋介石请示，蒋嘱他复电欢迎，同时令杨虎城率陕军入甘，接收省政权，宣慰地方，以防止吴插手甘肃政府。吴佩孚没接到回电即动身，很快到达天水。马福祥闻讯，立即发去电报一份：

吴玉帅二兄勋鉴：久疏音候，怀想弥殷。欣悉行抵秦州，即将来京，欢晤匪遥，欣慰无比，当即转呈介公，切囑电公命驾来京，共商国事。外交国联主张崔日撤兵，内部粤代表至沪商统一办法。因其主张不合党章，又违约法，中央及介公表示决不容从。粤方主张，万难实现。内政外交，中央已有具体办

法,昨日汉卿到京,闻有完善计划,可抱乐观。惟盼我公早日莅京,以慰介公及弟等渴望之殷,是为至禱。何日命驾,盼电京以便欢迎。如弟马福祥叩江。

这份电报中,对“雷马事变”只字未提,说明马福祥不愿吴佩孚插手此事,但也可以看出,当时正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全国人民陷人悲痛之中,而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蒋介石正忙得焦头烂额。

吴佩孚至天水后,给马文车、雷中田发去急电,表明来意:“此次游历到甘,突闻政变,深虑以政治纠纷,佩起民族意见,迭电各方袍泽,停止军事行动。佩闻东北噩耗,日人欲乘我内乱,大肆并吞,全国震惊,国亡无日。除迳电日政府劝告撤兵外,复经致电各方一律息争御侮,以保国家一线命脉。甘肃虽处边陲,关系国防至深且巨,务望各饬所部,勿启衅端。”^①11月7日,吴佩孚经临洮到达兰州,受到马文车、雷中田等热烈欢迎。吴提出的调解条件是释放马鸿宾,准许率部回宁夏;马鸿宾获得自由后,由吴保证,对雷不采取军事行动。因当时国难临头,雷马双方接受了条件,事变告一段落,马鸿宾率部回到宁夏,继续担任他的宁夏省主席。

“雷马事变”对马福祥的创伤很大。由于马鸿宾行事软弱,整个事变也把自己牵涉进去,将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加在他头上,值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产生误会,对值进行攻击,在家乡父老面前大丢脸面。因蒋介石对马福祥的信任与支持,才平息了事变,但也使蒋介石对于马福祥在西北的影响力产生怀疑。事件平息后,马福祥已是心力交瘁,病情加重,向蒋介石辞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年后便逝世。

^① 张慎微:《关于“雷马事变”的见闻》,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第十一章 积极向内地进取

蒋介石国民党经过新军阀混战后,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然而中国政局依然混乱,各种矛盾日益加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仍相当尖锐。蒋介石为稳住政局,急需与一些地方之间建立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蒋介石认为以马福祥的阅历、政治地位及在西北回民中的影响,正是与西北回族军人建立政治联盟的最合适人选,通过对马福祥父子的重用来体现对西北回族诸马的安抚政策。马福祥投靠蒋介石后时来运转,官运亨通。

任青岛市市长

青岛位于山东半岛,依山傍水,风景优美,周围矿产丰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德国占领,德国战败后,1919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提出归还在大战后被日本夺取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废除日本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山东省青岛及铁路权和矿山权。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中国代表拒绝签字,收回了青岛,但仍有许多外商在青岛拥有工厂。至1929年7月,在“五四”运动10周年之际,青岛工人开始反日罢工,青岛市长吴思预无力应付。蒋介石认为驻青岛外国侨商及领事较多,处理不好会影响国际邦交,当时正值蒋冯大战,在危难之时,蒋介石派经验老道的马福祥任青岛市市长,处理罢工事件,并嘱马福祥“以邦交为重”妥善处

十有余年矣。华府之会还我疆土，森严壁垒之地，一易而为登临凭吊之区，而汇泉胜处，尤为游履所萃。己巳冬，余受命来长是邦，观政之余，继览海峤，循太平、浮湛而南，登其巅，水石冲冲，洪波荡其东，薛岛峙其南，诚天然形胜也。及观德人构筑之伟，窃叹穷十年之力，耗亿万之资，方自谓金汤之固，世莫与京。曾几何时，而物归故主，巨工宏址，徒留折戟沉沙之感，供后人吊古之资而已。信乎，疆域之变迁，兵力固可恃，而未可恃也？顾岬临荒野，无庐舍以避风雨，长夏烈日，游者金以为苦。爰命工选材，筑亭其上。亭居山脊，海水澎湃汹涌，与岛屿相吞吐。风雨晦明，沐日沐月，汪洋恣肆之势奔赴眼底，辄曰观澜，纪其实也。夫德人经营青岛之烈，已成过去之历史，亦如海水滔滔，东逝不复返矣。今者，山川如旧，风物依然，此邦之人宜如何观感淬励。守祖宗尺寸之业，念光复旧物之功，思有以保持而恢美之！然则斯亭之筑，又宁仅资登临供游憩而已哉？庐陵醉翁之亭，意不在酒，后之未者，其有感于斯文。

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陇右马福祥记^①

1930年3月，马福祥又改任安徽省主席，临行前拟《致青岛各国领事暨各侨商留别书》，对一些侨商出面调解青岛工人罢工及劳资问题表示感谢，“每次商榷，相见以诚，卒使数万执业之人戢然无间”。现在“青市事业日新，商务日盛。”表现出马福祥在处理涉外事件中有礼有节，即维护了国家主权也保护了工人利益。同时马福祥还写了《告青市父老书》和《告别青市属僚书》，对长青市数月来的工作做了总结。

^① 据《马氏族谱·艺文集》。

第十二章 主持蒙藏委员会工作

近代以来,我国内忧外患迭起,国力日衰,外国势力大肆侵吞我国领土,边疆告急。沙俄曾乘机侵占我西北、东北大片领地,外蒙古脱离祖国分裂而去,分裂势力进一步向内蒙渗透,英人从印度派兵入侵西藏。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军阀混战,无人顾及边疆民族问题,内蒙、西藏、新疆等地分裂势力抬头。马福祥在边疆为官多年,曾主持蒙藏委员会工作,已清醒地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在一次蒙藏会议上曾大声疾呼:“蒙藏之存亡,即中国之存亡,中国绝不能使蒙藏脱离中国之版图,蒙藏亦不能脱离中国而独立。”

筹划治理蒙藏策略

1929年马福祥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中间又任青岛市市长和安徽省主席。1930年9月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治理蒙藏事务及加强国防建设中去。

马福祥任西宁市镇守使和绥远都统期间,多次调解蒙、藏、汉之间民族纠纷,对蒙藏地情、民情及风俗习惯较为了解,他认为治理蒙藏地区最有效可行的策略应尽快发展那里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实力,而发展经济必须交通先行。1929年9月30日在蒙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马福祥发表《治理蒙藏回部计划》的演说时指出:“窃谓今日为蒙藏二族谋福利,不外广设学校、振兴实业,而亲爱蒙藏僧

俗各领袖,尤为先务之急。……清季自达赖出走,而前藏政权几归于英。蒙旗自哲布尊丹巴独立,而外蒙几归于俄,其最章章者也。亲爱蒙藏首领,以收蒙藏之心,再于学校实业急起直追。”马福祥认为,振兴蒙藏民族实业,首宜发展交通为最要。因蒙藏地区交通阻塞,直接制约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果运输便利,蒙藏地区工商业自然随之兴旺起来。马福祥还指出,政府及国人除应重视蒙藏地区发展外,新疆问题也不可轻视,应与蒙藏摆在同等重要位置。新疆缠回(维吾尔族)与甘肃撤回(撒拉族)人数不少,而教育之落后甚于蒙藏,他感叹曰:“同在晴天白日旗帜之下,岂宜任其长此闭塞,独抱向隅,似应并顾兼筹。”

1930年9月,马福祥调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后,立即在南京召开蒙藏各部王公会议,提出消除各民族间隔阂,发展民族教育,开发蒙藏地区,加强西北国防建设。在蒙藏委员会下设筹边社,他在《蒙藏委员会筹边社开幕词》中说:“蒙藏委员会为蒙藏最高行政机关,自成立以来,无日不本‘脚踏实地’四字去做,每提一案,建一议先以能实行为提前,不做欺人之谈,不为无益之计。”字里行间表现出马福祥为蒙藏人民办实事的良好愿望,反映了一位二三十年代的回族政治家希望民族振兴,国防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多灾多难,东有八国联军从海路人侵我国,西有阿古柏分裂分子猖狂新疆,西南英帝国主义出兵西藏,外藏分裂分子加紧活动,清政府已是焦头烂额,无力两头兼顾。朝廷内部出现加强“海防”还是加强“塞防”之争。民国建立后,东南海防稍为稳定,马福祥认为此时应全力经营西北边疆,因为“西北皆为大陆,历代以来成有邻国强族为吾外患,故戒备不可不严。而东南滨临大海,不与他国土壤相接,故史书之记载实不足与西北并称”。自鸦片战争,五口开埠,英法称兵北京,丧琉球、台湾于日本,全国目光亦聚焦东南海防为忧,西北延绵数万里之国防几于无人过问,“然西北之国防果无顾虑之必要乎?吾言及此,请先定所

本也，吾回教之礼虽因信仰不同、仪式有别，然言礼之本亦未尝或殊。吾教拜真主、信穆圣、敬天仙、诵经典，其道则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其义则孝弟忠信，睦姻任恤；其致力则格致、诚正、修齐；其造极则穷理、尽性、知命，此其概要也。吾家素奉回教，行其礼重在诚心，奉教修己养性，专意为善，其礼拜仪式之意义至重也，故应切实遵行之。”在《家礼》中，马福祥对子侄儿孙的信仰、五功、礼拜、封斋、饮食、婚姻、丧葬、服饰等按伊斯兰教义都做了严格规定。他认为伊斯教念、礼、斋、课、朝五功中，念为心之功、礼为身之功，斋为性之功，课为财之功，朝为命之功。他同时教育后代要遵守中国传统礼法，凡一家之中必有礼法以为根本，“循之者未有不兴，悖之者未有不败。”

修身与处世

马福祥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极重视交友，上至国民党军阀政客下至三教九流或结为朋友或拜为金兰。曾受马福祥资助上大学，后在马福祥身边工作多年的马廷秀回忆说：“马福祥好读书、善书法、留心时政，喜欢接近汉族中上层人士。幕府中所揽的人中，有擅长时文的，有长于研究金石书画的，也有能写电文书札的。温文典雅，蔚然大家风范。……他长于交际，善于游说，清朝的翰林进士，北洋的督军、省长，以及国民党的显要如戴季陶、何应钦、陈果夫等人，相与往还，或订为金兰，或亲密交接，常语人‘生平无不可言之事，天下无不可交之人’，这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也取得了不小的帮助。”马福祥认为，交友之道“如交聪明之人，须耐他几分妄气；交沉着之人，须耐他几分滞气；交刚硬人，须耐他几分戾气；交圆滑之人，须耐他几分滑气。”“以光明存心，以正大立身，以谦和做人，以诚信交友”是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他认为修身、持家、居乡、处事、处人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人生问题，如果处理得好，

对家庭、社会都有益处。作为一个君子，应心胸开阔。他在《六事箴言》中说：“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马福祥关于修身处世的论述极多，这与他读书广泛有关。1930年闲居北京时，曾节抄顾亭林《日知录》、吕惺吾《呻吟语》、陆桴亭《思辩录》、魏非子《日课》各书，加之平时看书随手抄录各朝各代贤人达士论述修身处世的精彩段落，马福祥加以分类整理，共分15类，每一类前加马福祥自己按语，取名《先哲言行类钞》，刊印出版。现将马福祥对每一类的按语择录附于后，其中不乏闪光之处，其精僻透彻的论述对我们有很大启发。

一 慎言：福祥按，言为心声，无言不能述事，而多言适足以贾祸。忠言固戒逆耳，而辩言又足以乱政。言出诸口，利害祸福随之，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古人讲学论道，大抵皆经世之言，故语焉而不厌求详。若经常高谈，滔滔不竭，而无涵养以济之，非失言即妄言矣。易曰：吉人辞寡。寡则防其失与妄，可以脱却口过矣。盖慎之至也。

二 寡过：福祥按，人非圣贤，不能无过。改过则愆尤日少，文过则疵累日增。一转移间，而天理人欲两途，判若霄壤。君子约束自爱，惟恐寡过未能。小人怙恶不悛，终至滔于匪僻。君子之过，可以克治身心而去之。小人之过，可以欺世盗名而成之。故君子适成为君子，小人适成为小人。爰择古人寡过之方，藉作他山攻错之助。

三 忿忿：福祥按，论事必须衡情，衡情始能合理，但盛怒之下，出言过激。激则矫情悖理。事所恒有，不制其气而使之平，必至意气用事，往往具充分之理由，反因一朝之忿，一语之误，而终归失败。《大学》云：“心有所忿嚏，则不得其正，正因其不得其正，及宜平其气而使之正也”。爰择古训，垂为金鑑。

四 成贪：福祥按，诸葛武侯有言，淡泊以明志。盖不甘淡泊，

必起贪念。贪则计功利而略是非，是非不明，祸患随至。昔人云：人心无厌，得陇望蜀，告之以蜀不必望，退而守陇，而其心且拂然怒，必至求蜀不得，并陇失之而后已。古今来悖入悖出，身败名裂者，皆一“贪”字误之，不可不察也。

五 省身：福祥按，吾人处世，遇拂意事，怨天尤人，恒情也。不知立身行己，主张在我。我能平心静气，返躬自省，清夜扪心，戒惧慎独，则此身已立于天地间而无愧怍。觉意外之遭遇，皆可视为身外之浮云，夫何怨尤之足云？人心自侮，然后人侮。欲不自侮，舍修省别无他道。坐对古人，益深警惕矣。

六 课勤：福祥曩读左氏传曰，“民生在勤。”楚田莘路篮缕之时，即重民生，又郑重而箴之曰在勤。知勤之一字，大之可以开国，小之可以承家，可以修身。盖不勤则怠，怠则百事废弛。不惟功亏半途，而祸患且随之而至。古今来由勤而成大业、树功名、垂为典型者，比比皆是。兹择其最著者数事录出，用以自傲。

七 睦亲：福祥按，戚串亲属，血族相关，邻里乡党，守望与共。凡此数者，非同陌路。或幼须施教，或贫待举火，或急难为之排解，或灾害为之消除。处之而得其当，缓急能使为助，患难均可相依。孟子曰：“亲亲而仁民”，盖谓仁者用心，必由近以及远也。因述前言往行，亲切而有味者数则，以资观感。

八 居家：福祥按，居家之道，开创与守成互有不同，开创之家，以勤俭而获成功；守成之家，以和睦而能持久，古今不易之理也。第开创虽艰，而守成亦不易。盖子孙众多，则贤愚错出，性情各异，处之不得其当，怨尤日滋，勃谿（争吵）时见。乘戾之气，中于家庭矣。善治家者，当能知之。

九 节用：福祥按，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塞其源，则涓涓长流，故吾人处世，首戒奢侈。盖奢侈必至糜费，糜费必至穷数日之用度，供一日之挥霍不已，必至竭蹶。竭蹶之时，必思罗掘。罗掘俱穷，而妄念生焉。妄念一生，而做奸犯科之事，相逼俱来。居官

而贪赃枉法，为民而诈财伤生。皆此滥用货财之一念阶之厉也。故居家首在节用，量入以为之出，有余以补不足。然而措置有方，丰俭得中。读陆桴亭《制用》之说，可以恍然矣。

十 交友：福祥按，德业规劝，道义观摩，皆藉友朋。古之人多闻直谅。取友必端，近则契合，远则神交。处常则他山改错，遇变则患难相依，故能获交友之益。第择友最难，择焉而不精，则座上宾成势利交矣。韩昌黎所谓游戏征逐强笑出肺肝所示。一日监小利害，若不相识者，比也。因取古今人论交之言，韦之以昭炯戒。

十一 应世：福祥按，吾人应世，如行舟海中，洪涛巨浪，滚滚而至。偶一不慎，即召倾覆之患，故事事须加检束，时时当为戒备。处常而有傲惧，遇变则措之裕如。横逆之来，则顺理应之。拂意之事，则平心处之，应世之良法也。天下事无不以化险而为夷，转危而为安。道古人之抉择，知有定向已耳。爰择名贤所言所行，以为准绳。

十二 恤贫：福祥按，易之言曰：君子以裒（取出）多益寡（取有余，补不足），称物平施。在井田未坏以前，农夫受田，商工藏市，各有常职，贫富极少，尚有裒益之举。况且今日，失业者众，贫富悬殊，加以旱涝灾侵，琐尾流离，邻里乡党中，得无有望贍养而付拯救者乎？因择恤贫数则，书之简编，盖其中立言行事，皆仁人之用心也。能勿圭臬奉之。

十三 远患：福祥按，防患未然，古有明训。盖祸患之来，尝发于不及觉。有形之患易防，而无形之患难防。匹夫怀璧，象齿焚身，璧与齿实患之媒介，而入犹及见之，若夫不测风云，意外灾害。人心险诈，层出不穷。世态变故，端倪莫判，与其处处戒备而为之防，不如事事斟酌而使之远。心思求密，眼界放宽，与人无争，与世无忤，虽处险境，如履坦途矣。兹採古今名人言行，凡见微知著者录之。

十四 明义利：福祥按，义利之辨，古人言之甚详，毋待赘述，

去世时 47 岁,生次子鸿炳及鸿燐(早歿)。四配前学部郎中马公女马汝邨(字书城)。五配山西田公女,田氏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后两位无生育,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是知书达理的现代女性。马汝邨能诗善书法,在当时回族妇女中甚为著名,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病逝于台湾。

马福祥两个儿子,马鸿逵从小跟随父亲,后独立带军。次子马鸿炳最为父溺爱,但吸食鸦片,令马福祥十分伤感,虽因父兄关系曾挂名军职,因身体瘦弱,终无建树。马福祥对三位兄长福财、福禄、福寿的子孙也很关心,故作家训,写家书,希望他们能成为社会有用之材。

在过去回族家族历史上,还很少见到如此完备的家训。尽管它与一般汉族传统家训区别不大,但将这一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手段引入回族家庭教育中,说明在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回族教育水平的提高,逐渐接受了汉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及对汉文化的认同。也表明在回族家庭教育中即注重伊斯兰文化教育,也开始用汉文化的传统家训教育后代。

所谓家训,就是家庭内部父母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在中国历史上家训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括治学之道,教子之道,修身、涉务之道等。具体分析马福祥手订的家训文化特征:一是其在内容上主要反映了儒家文化精神。二是其形式简明,语言通俗容易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把握。三是以血亲伦常为基础,即有家规强制,也有亲情感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传统家训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已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在现代社会与现代人正陷入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之时,认真研究、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对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家庭美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传统家训文化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一开始就络上了宗法等级制度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陈腐的思

作,但能兢兢业业,各勤其事,亦可绵至三世五世。至于仕宦一途,果能佐成文治武功,未尝不炫赫于一时,昭垂于万世。然必其人福德俱备,为守兼优。而后上可以光先人,下可以庇后嗣。否则始勤终怠,功败垂成。或父贤子愚,极盛难继。以乐书之小心,阅三传而灭族。以秦皇之神武,不二世而覆宗,转不若耕读人家,知稼穡之艰难,领诗书之滋味,继承弗替,永享其成。善乎,曾文正公国藩述其祖星岗公之言曰,“宽一^①虽点翰林,我家终不靠他吃饭”。又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诚居家者之龟监也。士食旧德,农服先畴,恪守家风,愿共勉之”。

二 勤学问:学问之道,所以求放心明道理,必使习之于身者见之于世,非徒读书作文欺世盗名而已也。故朱子曰: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孔子之诏弟子曰:孝弟谨信,爱众、亲仁为要务,而学文则付诸余力。子夏善体此意,乃必以贤亲君友各尽其道者谓之学。然学非问不明,问非学不精。大家子弟,往往自是,不肯下人,遂至一无所成。故孔子又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者谓之文也。今为汝辈粗言之,农家以勤四体,分五谷,物土之宜,顺天之时为学问。儒家以明人伦,察庶物,处则传道,出则保民为学问。兵家以定国难,捍民患,奇不害正,变不失常为学问。医家以通阴阳,辨脉络,功不期速,方不求奇为学问。工商以制器具,道货财,交易各当,利益不失为学问。其他职业,莫不如是。阅书而得古人之秘诀,应世而合当世之风尚,交友而赖他人之攻错,用人而资群众之心思。君子能自得师,圣人学于万物,学问之道,思过半矣。

三 修职业:凡人各有职业,大而报国防边,小而持家理纪,公而地方善举,私而家室经营。一日身在局中,即一日不

^① 即曾国藩,乳名宽一。

恶扬善，造成好人。舍短取长，奖掖后进，在我不过真心诚意，行其所安；在人便已戴德负仁，奉以为式。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既培植家庭之元气，兼养成乡邑之仁风。由是人人抱忠义之心，事事存厚道之想。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洵有力之家，与人为善之要诀也，可不勉哉。

七 慎交游：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必有尊德乐道之诚，始获劝善规过之益。则交游不可不慎也。朱柏庐云；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吾家子弟之中无论已成人未成人，往往未受益友之切磋琢磨，先受损友之浸润沾染。呼之不悟，怨之不悛，疾首痛心，莫此为甚。今为略讲朋友之道，俾知渐获交游之益。友直谅可以寡过，友多闻可以进德，然天下苦无全才。取友之长，尤当护友之短，方能彼此相助，得以全交。如交聪明人，须耐他几分妄气。交沉着人，须耐他几分滞气。交刚硬人，须耐他几分戾气。交圆活人，须耐他几分滑气。取友之道，方为无负。若夫鄙俗之子，邪妄之人，力能胜则斥而逐之，力不能胜则敬而远之。更可以全身而远害矣。

八 尊教典：吾教认主独一，尽性复命，即人见天。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义理之充足，始终之贯澈，为他教所莫能及。儒家者流，惟宋儒理学，其精深处，差堪比拟。然亦不能舍宏光大，包罗万有之至于斯也。我辈不通阿文，虽未能窥其深奥，然普通规则，如五功七聚二要之类，总须时时遵守，无须背离。至于性命神化之学，进而益上，有主命焉，非夫人之力所可企而及者，亦惟听诸自然已耳。

以上各事，要而不繁，简而不漏。果能一一领悟，身体力行，始终弗懈，则日进月累不但为克家之子，且将孚乡国之望。子孙贤，族将大，庶不虚此愿也。非然者，不遵庭训，日即匪异。举祖宗艰难困苦以成之者，任子弟骄奢淫佚以败之，将修

多做衣裳。又语云：第一期家庭教育，不在父而在母，因为未就外傅以前最亲近者，莫过于母。历史记载如陶母、欧母、柳母等教子成名不胜枚举。所以作母亲的，对于儿辈言动行止，处处留心，时时约束。以上二则，实属甘苦有得之言，允宜奉为金科玉律。

余自少承庭训兢兢业业，惟恐或失，故能任疆圻，匡扶时局。汝伯、汝父，幼时母教已不甚严，幸余随时提命，促其努力，始收今日之效果。现在汝等安居乡里，有逸乐而无顾虑。汝母等囿于闻见，随习俗而乏远图，以致爱而不教，纯任放弃。长此以往，诗礼之家风何在？纨绔之陋习更深。在家庭不能为优秀之子弟，在社会岂能为健全之国民？将何以上承庇荫，下畜妻孥？此余所拳拳难忘者也。

且余家一门节俭，可谓幸矣。大家巨室之于弟，必先有和平忠厚之心，恭俭谦让之行，方足以持盈保泰，绵先泽于无穷。果能如是，戚党感受薰陶，乡闾互知效法。积之久而地方浇漓之习、浮伪之风，或且为之一变。是汝等言行举动，实为乡人所注目，予以辩家教之宽严、家运之隆替。推而及于人心风俗，关系殊非浅鲜。顾可不自检束，受人指摘乎？书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每诵斯语，辄为寒心。余愿一乡之人，称汝等为善士，不愿一乡之人，称汝等为豪士也。

总之，书不可不读，学不可不讲，德不可不修，骄奢淫佚之事不可有，戒、慎、恐、惧之念不可无。带一分书卷气，则性情自免粗疏；存一分退让心，则礼节自无逾越。平日格外留意，临时攸往咸宜，持身之要道，抑亦处世之良规。况汝等年岁已长，俱各生有子女，若不奋勉振作，克自树立，试问为人父者，何以教子？余实为汝等危之。语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余又愿汝等勿以席丰履厚为乐，而以承先启后为急也。余因此事，日夜焦灼。

拟令汝等出门阅历，增长学识，求终身立足之地。奈连年战事，交通梗塞，以致未能实现，亦属无可如何。然日月云迈，荒废可惜。为汝等前途计，首宜培养心田。恒使方寸之地，善念油然而生。对于社会，时存救济贫穷之心。力行施舍钱米之事，不但以我之有余，补人之不足，尤应预为节省，藉便取求庶足。立博爱之初基，彰吾教之美德。而又慎重交游，近益友以扩见闻，屏损友以防习染，立身处世方有把握。

所有上列各语，务速切实奉行，毋再因循游惰，固步自封，或者有成材之希望。近阅关中王文恪公《六事箴言》，内中所载，皆前贤往哲治身涉世之圭臬，择要录后。汝等留心阅看，万勿疑为迂阔。现在世界潮流日新月异，生活程度愈来愈高。余家还处西陲，族大人众，支持尤为不易。加以近年天灾人祸，甲于各省，尤非崇尚节俭，不能养元气，而近祥和。修身、齐家、治国，事虽异而理相通。幼学壮行，当先尽其在我。先总理三民主义救国之道，无所不包，亦宜列为课程，逐条研究。必使确有心得，为日后出而应世之具。并将近日学业，详细函陈，以慰余意，至要至嘱。

云亭手谕民国二十年元月

第十四章 对现代回族文化教育的贡献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伴随这场历史性的转折,回族中一批先进分子发起了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他们提倡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以文化知识来唤醒民族的自强自立意识。马福祥作为现代回族中知名人士及爱国政治家,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和地位,积极发展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发起创办《月华》杂志,扶植成达师范,参与扩建上海伊斯兰师范,整理出版回族古籍丛刊,在宁夏及内地创建 60 余所清真小学,资助一批回族青年到国内外一些高等学府深造。由于他的热心支持及慷慨赞助及一批回族知识分子的努力,使我国 20 世纪初的回族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马福祥为发展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竭尽所能的精神,在回族人民心中留下良好影响,也奠定了他在现代回族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

在宁夏及内地创办回民学校

西北回族历经清末多次劫难,原有的经济文化体系及居住格局被彻底破坏,回族群余颠沛流离,为活命而四处奔波,数十年中根本谈不上有回族教育。中华民国创立后,社会局势稍有稳定,特别是民主思想和民族平等观念已深入人心,回顾几十年回族走过的艰难历程。一些知识分子惊呼:我们已经落伍了。他们认为,只有唤起整个民族的觉醒,普及民族教育,才有希望求得民族本身生

使福祥捐银 1500 两,余就地筹备。

县属清真初级小学 4 座:保家户、通昌堡、通贵堡、司家桥学校各一处,教员各一名,均属民国 8 年成立。学款:保家户,马护军使捐钱 110 串,通昌堡 100 串,通贵堡 150 串,司家桥捐银 60 两,余就地筹备。

宁朔县清真小学

县属清真初级小学 5 所:南关、西门外、新城门、新水桥、大礼拜寺各一所,教员各一名,均属民国 8 年成立。学款:南关,马护军使福祥捐钱 550 串,西门外捐钱 380 串,新城门 450 串,新水桥 300 串,大礼拜寺 90 串,余就地筹备。

中卫县清真小学

县属清真初级小学 2 所;要崖山(民国 9 年立)、马恩堡(民国 13 年立)学校各一所,教员各一员。学款:要崖山马护军使捐钱 50 串,余就地筹备。

平罗县属清真小学

宝丰清真高级小学,民国 7 年 2 月成立,教师 1 人,学生 20 余人,学款就地筹备,附设初级小学一所。

石嘴山清真高级小学,民国 7 年 2 月立,教员 1 人,学生 10 余人,附设初级小学校,学款就地筹支。

县属清真初级小学 14 所,均属民国 7 年成立,有黄渠桥、南长渠、北长渠、东永润东甲、东永润西甲、灵沙堡、红外岗、李岗堡、惠威堡、渠口堡、通福堡、清水堡、灵沙堡下甲、本城老户学校各一所,教员各 1 人。学款:李岗堡马护军使福祥捐钱 250 串,清水堡捐钱 210 串,余就地筹备。

灵武县属清真小学

崇兴寨清真高级小学校,民国 7 年护军使马福祥创办,教员 1 名,学员 10 余人。学款:马护军使捐钱 210 串,余就地筹办。

吴忠堡清真高级小学校,民国7年护军使马福祥创办,教员1名,学生20余名。学款:马护军使捐钱500串,余就地筹备。

县属清真初级小学校4所,崇兴寨、吴忠堡、吴东乡、胡回堡学校各一所,教员1人,学款就地筹备。

金积县清真小学

本城清真高级小学校,在城内,民国7年护军使马福祥创办,附设初级小学一所,教员1名,学生20余名,学款:马护军使捐钱600串,余就地筹备。

县属清真初级小学校8所,本城、金积堡、秦坝堡、汉伯堡、忠营堡、汉王堡、大红沟、马家河学校各一所,教员各1名,成立于民国7至10年,学款就地筹备。

镇戎县清真小学校

韦州堡清真高级小学校,民国8年立,马护军使福祥创办,教员1名,学生20余名,附设初级小学校。学款:马护军使福祥捐款1000串,余就地筹备。

预旺堡清真高级小学校,民国8年立,马护军使福祥创办,教员1人,学生10余人,附设初级小学校。学款:马护军使捐款500串,余就地筹备。

同心城清真高级小学校,民国8年护军使马福祥创办,附设初级小学1所,教员1名,学生20余人。学款:马护军使捐款500串,余就地筹备。

县属清真初级小学校6所,韦州堡、夹道堡、八方、沟南排、沟北排、顾家堡学校各一所,均属民国4年成立,教员各1名,学款均就地筹备。

这批清真小学的建立,开创了宁夏回族教育的先河,“蒙回师范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大多派到各地县清真小学任教,解决了各小

学师资缺乏问题,后来又设立贺兰中学,使宁夏回族教育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其影响非常大。“由于云老的躬亲擘划,以及用种种方法加以鼓励奖掖,一般人皆以读书为荣耀。一时读书之风气大开,各家长纷纷送其子弟读书。云老复于省垣设立‘蒙回教育劝导所’,随时派员到各地去视察学校,因之成绩尚佳。”^①

1928年,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人甘,其军长门致中任宁夏第一任主席,门致中以开发西北为借口,这些学校全被勒令停办。后来马鸿逵主政宁夏,社会各界要求恢复各地县清真学校的呼声很高,这时马福祥已经去逝,马鸿逵督促当时主管教育的时子周,拟定了一个办理回民教育计划,几经周折,成立“云亭教育文化基金会”,马鸿逵任董事长,筹措了一亿元教育基金,在各县设立“云亭国民中心学校”13所,帮助修建校舍,拨给教育经费。于是在宁夏各县建立起一批以马福祥字命名的小学校,它们是银川市云亭小学、贺兰县立刚云亭小学、永宁县纳家户云亭小学、新城云亭小学、通贵云亭小学、平罗县渠口云亭小学、通伏云亭小学、惠农县高庄云亭小学、宝丰云亭小学、金积县鸿乐府云亭小学、板桥云亭小学、灵武县吴忠堡云亭小学、同心县云亭小学,共计13所,96个班,其学生绝大部分为回民子弟。这些学校除公共课程与普通学校相同外,复加阿文两节。后因物价飞涨,云亭教育文化基金有限,至1948年以上学校经费列入省府教育预算金以内。

当时虽然办了不少云亭小学,但因教育体制不够完善,没有设立中学,许多小学毕业生仍陷于失学之中。后来马鸿逵在永宁县王洪堡创立私立中学,招收普通蒙回清寒学生入学。这些学校的开办及恢复是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要求马鸿逵继承其父遗志,发展回族教育而设立。此外,在回教协会倡议下,还办了20所高初级伊斯兰教研究所,附设在宁夏各县清真寺内,牌子虽挂出,但因

^① 马福龙:《伊斯兰教在宁夏》,载《西北通讯》第2卷第8期。

扶植成达师范

成达师范是1925年4月24日在山东济南创立,它是改革经堂教育,创建现代回民师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知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是全国建立较早,坚持时间最长的伊斯兰中等师范,在我国回族教育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当时在济南西关杆石桥穆家车门清真寺任教长的马松亭阿訇,为改革中国穆斯林的经堂教育,与时任山东济南道尹的唐柯三商议,准备创立新学制的伊斯兰师范学校,得到唐的赞同与支持,并得到当地一些回民人士的热情协助,公推唐柯三为校长,马松亭主持校务。创办时第一班只招收10名学员,因学员文化小平参差不齐,作为预备班上了一年,第二年才算为初级一年级。当地回民认为成绩尚佳,积极捐款,增添了校董,扩建了校舍,原准备在1928年秋季招收第二班新生时,不幸济南“五三”惨案发生,社会动荡,学校受到破坏,被迫停课。马松亭不忍学校就此终止,到处奔走呼吁,终无结果。有人曾向唐柯三建议说马福祥热心回族教育,曾在宁夏创办蒙回师范学校,建议唐向马福祥求助。当时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加深,马福祥以航空督办有名无权空职闲居京城。唐柯三见到马福祥后,详细谈了成达师范目前面临的困难,马福祥听后,力主将成达师范迁至北平,并愿将自己在东四牌楼清真寺后院购置为筹建穆民大学的几十间平房无偿提供做校舍。唐柯三听后很高兴,立即写信约马松亭来北平商议成达师范北迁事宜。1929年成达师范正式迁至北平,马福祥父子来校参观,认为办理得法,只是招收学生太少,建议续招新生,并捐开办费500元。回族实业家常子春先生1919年在宣武门外轿子胡同龙凤坑创立了永宝斋玉器工厂,生意非常兴隆。马福祥拿出4万元银元存入永宝斋,以其利息收入供成达经费,加上北平回民的捐赠,学校得以维持。据解放后曾任中国伊

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的马松亭阿訇说：“成达师范自 1929 年春搬到北平后，当年秋天招收第二班，学生共 64 名，以后隔年招生一班，马云亭给开办费 500 元，他还拿出一笔资金给北平的古玩商做股金，所得利息为成达师范开支之用。成达的经费一半是马云亭给的，一半是由中国回教促进会北平分会各寺乡老中募捐的。1931 年，马福祥从蒙藏委员会的经常费中每月拨给 700 元，这是成达师范当时惟一的一大宗收入。”

成达师范在经费比较充足后，规模逐渐扩大，迁北平后组织机构也健全了。1929 年重新组成了董事会，由当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兼董事长，聘请著名回族教育家马邻翼（振五）和北平市著名回族人士侯松泉任副董事长，唐柯三已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处长，仍兼成师校长，马松亭为教务主任，聘请北平各界热心回族教育的 60 余人组成董事会。马福祥热心扶植成达师范的举动，得到社会各界的称赞与支持，也有一些人或出于误解，或冷眼漠视与抵毁之，甚至有人“面诽成达于先生，而先生不惟不介怀，且霭颜婉词以答之，必使其衔怨面来，欣然而归，退而语吾师曰：‘松亭，子所为之事，非常之事也。应具有百折不挠之精神，虽毁之者比比，而未可恢志也。子且勇为，所有艰难困苦，余当殚身助之。吾辈凭主做事，复谁惧哉？’”^① 马福祥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给予成达师范以鼓励与支持。

1931 年，马福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后移职南京，虽然政务缠身，但时刻关注著成达师范的师生们，每次来北平，必莅校讲话，言词恳切，没有半点虚假。至 1932 年 6 月成达师范第一届学员毕业前夕，马福祥接到马鸿逵急电，约父前往信阳，有要事相商。马福祥到信阳、汉口一带，转眼间已一个多月过去。当时成达师范第一届毕业典礼即将举行，马福祥担心赶不上典礼，特意为毕业生每

^① 王国华：《悼马故董事长云亭先生》，载《月华》第四卷第 26、27 期。

人准备一份礼物,并写好训词一贴:“望诸君努力发扬圣教,以无负各方所期望勉之。”及对联一付:“研古典而会其通益信天经无剩义,竭全力以行所学乃知吾道有传人。”连同写给唐柯三校长的信一并寄出,信文曰:

柯三校长、松亭主任惠鉴:文电计达,前托平汉特快车带上瓷器一箱,计:印合小孟笔筒各十八份,系福祥赠本届毕业同学者,外食盒十八份,系鸿逵各赠。又《归真总义》、《蒙藏状况》、《先哲言行类钞》、《积善堂训戒子侄诸孙书稿》、《王阳明生活书》共五种,各十八册,统于本日特快车带平,到时并祈。察收,即希分交毕业诸同学,以作纪念,藉伸微忱!专此顺颂道祺。

马福祥拜启七月十二日

后来,马福祥得知经中国回教俱进会努力,与埃及有关方面达成协议,允许中国穆斯林派遣留学生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深造。“爱大当局对于外籍学生,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均给予他们以极大方便,尤其是各回教国所派遣的学生团,其团员所获得之优待,有超过埃及学生之上者。”^①当时埃及国王在扶植爱资哈尔大学方面不遗余力,并向许多外国穆斯林青年开放,吸收他们到爱大学习。1930年云南回教俱进会向爱大请求派遣留学生的报告得到批准,由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国珍率领马坚、纳忠等5名第一届中国留学生团于1931年12月20日到达开罗。1932年6月,成达师范向爱大请求派遣留学生的报告得到批准,于是决定在成达师范第一届毕业生中挑选4位到爱大深造。马福祥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乃于7月25日致函唐柯三校长曰:

^① 庞士谦:《埃及九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刊印,1988年。

族人士千余人,首先由马松亭阿訇圆经,王子馨阿訇祈祷,成达师范学生唱赞诗,几位代表做了演讲,回顾了马福祥生前在北平建立学校,修筑清真寺,发展回族教育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处处留下好的影响。

1932年12月,马松亭阿訇率领马金鹏等成达师范5位同学组成的中国留学埃及第二批代表团到达开罗,马鸿逵尊父嘱,资助留埃学生团半数旅途经费。经过几年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回国后他们在增进中国与阿拉伯人民友谊及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马金鹏后来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至今在学术界仍有一定影响。

参与筹建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

早在1925年,达浦生阿訇与哈德成教长共同商议,准备在上海建立一所较为完备的伊斯兰师范学校,旨在培养一批从事回族教育事业和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高级人材。当时达浦生阿訇刚从海外考察归来,寄居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朝夕与该寺教长哈德成阿訇商谈振兴回族教育事宜。他们认为,兴办回族教育,首先培养一批开明的教长及又足以担任小学教师的人才,以开明阿訇启迪教民风气,以合格教师灌输时代知识,创办新型的伊斯兰师范,实乃当务之急。两位阿訇即有同心,并征求上海各界回族知名人士意见。适马福祥来沪,得悉教胞有兴学之志,马上表示支持。据达浦生所撰《上海市私立伊斯兰师范学校述要》一文记载:“自外洋归来,寄寓上海浙江路回教堂,朝夕与该堂教长哈德成阿訇共谈,中国伊斯兰教务日颓,文化衰落,回教人民趋势日形于下,益思有以挽救,盖挽救之方舍教育则无以启发愚蒙。正筹商之际,马公云亭移节南来,凤轩(达浦生名,字满生)在甘办学多年,与之有旧,遂至其馆,即将夙抱兴学救教之旨,缕缕直陈。马公听之颇以为然,认

为当务之急,即提笔慨助五原县辖水田三千亩,并许办好再增,凤轩得此学田作教育基金,喜出望外,飞奔回寓始告德成……此即为学校筹办之开始。”此三千亩水田原为马福祥任绥远都统时所购置,如今划归正在筹建中的上海伊斯兰师范所有,所收租金以维持学校开支,缓解了经费不足问题。同时,在中国回教公会号召下,筹建校舍工作得到上海各界回民的普遍支持。至1928年,一座三层小楼的校舍在桃园清真寺旁建成,公推马福祥为董事长,达浦生为校长,哈德成则躬躬教育。为使学校日常工作步入正规,马福祥参与制定《上海私立伊斯兰师范学校章程》,并题写了书名。该章程对学校组织机构和学生学籍管理做了详细规定。在课程设置上强调中文、阿文、波斯文、英文“四文”并重教育,开设一般师范院校的课程。聘请一批著名教授和外籍教师授课,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培养了一批富有伊斯兰学术造诣的学者和阿訇,毕业生中有多人被选送到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在上海伊斯兰师范的影响下,当时全国范围内出现回民自办教育的热潮,如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云南明德中学,湖南偕进中学,山西崇实中学等不久相继开办起来。

创办西北公学

马福祥还是西北公学的发起创办人之一。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军统一全国,北平牛街的回族人士孙绳武、马邻翼等人商议,计划在北平创办一所回民中学,以解决当地回民子弟升学问题,当时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及白崇禧等国民政府中的军政要人均在北平,他们对孙、马等人计划表示支持,办学申请报告很快得到北平市长批准,校名定为北平清真中学,以白崇禧为董事长,马福祥、马邻翼任副董事长,于1928年9月开学。办学宗旨:“收纳回民子弟,教以艺能,历其品节,广开进身之途,藉储国家之用。”开办

见马福祥先生德业感人之深矣。

发起创办《月华》杂志

《月华》是我国回族伊斯兰报刊史上办刊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学术性刊物。1929年春季,成达师范在马福祥全力支持下顺利迁至北平。同年9月,马福祥与唐柯三、马振五、孙燕翼、马少云等成达师范主要负责人会晤于报子胡同马福祥公馆,讨论成达师范迁北平后复课及招生计划,当谈及回族文化教育发展问题时,马福祥认为:“欲求吾国回教振兴,首宜提倡教民知识,知识提高,则种种事业自然头头是道,易于着手。且陕甘西北一带,为吾国回民根据地。而教民知识落伍,较内地尤甚。非有以启迪之,不足谋整个回民的进步,欲达此旨,必要发行定期刊物,以沟通文化,开通风气。风气既开,则吾教易于普及。盖西北一带,多以读汉字书为危险事,虽有大力,未易夺其志,故发行刊物,实为振兴吾教之要图。”^①

1929年秋,“公与宝庆马振五、东鲁唐柯三聚于平邸,议及教民知识落伍,固当提倡教育以为挽救。然西北内地,多以读书为离经叛道,虽有大力未易其俗,必须先发行刊物开通民气,迨风气即开,则教育自易推行,众随其议,月华旬刊于以产生,公更月捐银若干为培植之。”^②经多次磋商,议即定,由马振五任主编,同年11月,第一期《月华》出版发行。《月华》办刊宗旨为:“发挥回教适合现代潮流之精义,介绍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增进中国回民之知识与地位,解释回教新旧派别之误会,发达中国回民之国家观念,提

^① 《悼马云亭先生》,载《月华》第四卷,第25、26、27期合刊。

^② 金吉堂:《故马云亭先生兴办教育事略》,载《月华》第七卷,第25、26、27期合刊。

职,马福祥遂转向内地,在北平报子胡同5号购置宅地一块,改造为马公馆,赋闲京城,潜心读书。在此期间将王岱舆的《希真正答》抄本进行校阅,并委托北平清真书报社刊印。第二年又为《清真指南要言》题签做序,捐资付印。

1928年4月,正当蒋、桂、冯、阎联合北伐,马福祥秘密从天津南下,到徐州晋见蒋介石,陈述统一北方,安定西北计划,提出“非团结各民族,无以立国;而团结民族,在疏通意见,俾了然于主义之所在,乃可图功。”一时成为名论。蒋第一次与马接触,很佩服马的才干,马福祥将自己前几年刊印的汉文经书送蒋介石一套。蒋鉴其熟悉北方政情,又与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吴佩孚交往较深,其子马鸿逵为冯效力,其侄马鸿宾为宁夏镇守使,实为西北回族中一位实力派人物,即任命马福祥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0年又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马福祥移职南京,他的寓所也迁至南京市门帘桥古狮巷。此时马福祥身兼数职,政务繁忙,但仍没有忘记对伊斯兰经典的研究,他说:“余武人也,颇嗜读书,公务稍暇,即披阅各家学说。觉其阐发至理,未如吾教之真且明。尝闻学者曰:‘吾圣穆罕默德,为圣中之圣贵者。余以为亦如儒教孔子,道教老子,佛教释迦牟尼也。’”

2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报刊和教科书中宣扬穆罕默德曾以武力征服一些国家,强行推行伊斯兰教的言论,引起回民抗议,马福祥对此议论及时给予辩驳,“余惜未习天方文字,不克详考其事迹,旋阅读他教记载,往往谓穆圣持武力征服各国,窃有疑焉。近获刘子介廉所著《至圣实录》,再三玩索,乃叹穆罕默德诚亘古一人而已;彼持异议者,如立万仞墙外,妄意揣测……世有以‘黠武’目吾圣者,何见之浅也。余幸为至圣教生,每思宣扬圣德,以唤醒同胞,因广印《实录》以饷斯世。”^① 1931年,马福祥对刘智《天方至圣实

^① 马福祥:《天方至圣实录·重印序》。

录》进行认真仔细校阅，题签作序，并请当时著名回族教育家马邻翼（振五）作序曰：“陇右马云亭都护乃于翻印《天方性理》、《典礼》及《大化总归》、《四典要会》、《五功释义》各编后，复将此书悉心校阅，逐一订正，将以付诸民手，嘱余纪其缘起。余自浮沉宦海以来，学殖荒落已廿年矣，岂敢率尔操觚，为天下笑？然独喜吾圣超群圣之实迹，得此益显，俾后世轻议吾圣，妄测吾圣，且虚构事实以污吾圣者，皆慄然而无所施其技；而云亭都护扶翊圣道，促进同人信仰之盛心，将与此书并传而不朽也。”^① 同年刊印的还有刘智所著《性理注释》、《五功释义》、《五更月歌》，王岱舆所著《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时中《归真总义》及清代另一回族经学家所著《真功发微》等。其中《希真正答》系王岱舆弟子根据其师生前言行教诲写成，成书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只有手抄本流传民间，马福祥收集到此书后，进行校阅，与王岱舆另两本书《正教真诠》、《清真大学》三书合刊，流传于世。

马福祥出身于传统的回族穆斯林家庭，从小受伊斯兰文化熏陶，耳濡目染，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尽管他后来身居高位，或移职内地，始终关心与支传回族文化教育事业，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官做三品必出教”，这是一般穆斯林群众对在历代朝廷或地方做官回族人士的评传。马福祥身居高位，不但没有忘记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并且把伊斯兰教义及伦理思想向外界解释宣传，对沟通回族与其他各族之间理解，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起了积极促进作用。他每到一处，维护一方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广大回族群众中赢得赞誉。

马福祥对自己从小未进过清真寺学习伊斯兰经典及阿拉伯文深表遗憾，“余生长回教，少年失学，即未识可兰经文字，亦未通亚刺伯语言，子回教奥妙，茫乎莫辨，遂从俗从宜。遵行回教规则，而

^① 马福祥：《天方至圣实录·重印序》。

行之不著，习矣不察，终身由之，不知其道，岂不大可哀耶。”^① 他教诲子孙要注重宗教功修，勿作违背教义之事，在《家礼》中称：“吾家素奉回教，行其礼，重在诚心。奉教、修己、养性，专意为善，其礼拜仪式之意义至重也，故应切实遵行之。”

刊印这批汉文译著，也是马福祥深入系统研究伊斯兰文化的一个过程，通过深入学习，他看到了伊斯兰哲学的高深，“自公余暇，得涉猎吾教王岱舆、刘介廉、伍子先、马文炳、张隐斋、马复初先生译述经典，恍然若有会于心。然管窥蠡测，莫穷高深，略见我教之清真，而所以清，所以真者，犹未得其要领焉。”^② 马福祥对刘智的《五更月歌》推崇备至，这篇不足千字的古典文学作品，运用我国传统诗赋的比、兴手法，通过月华在五更过程中生、新、高、辉、朗、圆、娇、偏、西、淹、落等动态，讴歌直宰、造化、参悟、归真、复命等伊斯兰教一系列哲理，寓说教于赞颂之中，音调和諧，具有鲜明节奏感，深受穆斯林欢迎。马福祥评价说：“惟研究刘介廉先生五更月歌，觉有味乎其言之。尧夫谓万物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玩此月歌，作者身中真有一乾坤哉，悠久不息，阴阳无间，得主有常，天人合一。先生本躬行心得之理，为觉世牖民之计，萃群经之精华，铸明德之宝剑，出以浅显之笔，作为唱道之文，言近旨远，守约施博，善道也，亦善言也。陇右马福祥跋。”^③ 民国12年9月，马福祥在北京三里河清真寺为王岱舆立碑一块，正面为《王岱舆先生墓碑记》，北面刻有《五更月歌》。在《碑记》中称：“明代江苏王岱舆先生比天方学者博通儒书，广择天方经典，为中亚学说讲通之鼻祖。福祥曾广求其著述，详加研究，知先生于天方学说独见其大……”足见马福祥对王岱舆及刘智等穆斯林学者的推荐与敬仰，对他们

① 马福祥：《性理注解·五功释义·五更月歌》跋。

② 同上。

③ 同上。

回族教育,提高回族人民整体文化素质。海涛后来曾对家人讲,他所以能上大学,全赖回族有识之士马福祥将军的资助。另一位曾受马福祥鼓励与资助的回族青年,在听说马福祥去逝的消息后,满怀悲痛之情写下了《回忆马福祥将军》一文,在该文结尾说道:“我曾遇到许多穆民和非穆民青年,他们只要是认识马将军的,都受过他的鼓励和资助。他的博大的胸襟,他对人才的珍惜,在许多要人显贵之间,我还没有发现能和马将军相伯仲的。马云亭将军无疑是西北的光荣,伊斯兰的祥瑞,可惜他离开世间太早了,未能尽他可能的贡献,在全国兵荒马乱的今日,在穆斯林百废待兴的今日,假使马将军还健在,他将怎样地焦虑,怎样地努力呢?”^①表达了一批回族青年学子对马福祥将军的怀念与敬仰之情。

竭力维护伊斯兰教内部及回汉之间团结

至民国初期,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近 1300 年。清代以后,中国伊斯兰教内部出现一些教派门宦,这些教派门宦有时处于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中。马福祥的家乡河州,是我国伊斯兰教一些教派门宦发源地,那里教派林立,各教派之间互不团结,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马福祥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回族政治家,对本民族内部出现的这种状况非常痛心,所以,他一生致力于发展民族教育、开启民智,改善民族关系,加强回族内部团结工作上。如前文提到出巨资修建各类回民学校,鼓励回民青年学习汉文化,刊印“汉克塔布”(即汉文经典),使教内外人对伊斯兰教精神实质有所了解;创办杂志,弘扬回族伊斯兰文化。这些举措在推动当时回族社会发展,加强回族内部及回汉之间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① 沙蕾:《回忆马福祥将军》,载《西北通讯》第二卷第 8 期。

起新旧教派的纠纷,积不相能,后来又为奸邪所利用,公然威胁群众造反,对汉民村庄攻占、惨杀,从而引起回汉两族相互残杀。”^①其实这也是马福祥自己观点,他把事变的原因归结为“愚昧无知,好乱成性的阿訇煽风点火”所致,从本民族上层探寻原因。

西北穆斯林群众,在伊斯兰教的作用下,保持了一种团结进取的凝聚力,也养成了服从教义,遵守教规的习惯。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认识上的差距,在一些穆斯林群众中存在狭隘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一些宗教界上层接受教民朝拜,特别是一些回族军人,他们深知伊斯兰教在西北穆斯林中有着巨大作用,认为教权与军权的合一是其割据称雄的资本,所以都极力将自己的军权与教权结合,以便利用宗教巩固自己地位。马福祥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伊斯兰教是统一体,反对分门立户,不主张党同伐异,对一些回族军人扶持某一教派的做法极表不满。“在云亭先生的家乡,就是西北方而,宗教派别太多了,标奇立新,不胜枚举。……云亭先生在宗教方面,从无一些分门立户的色彩,他把回教看做整个的,已分开的,他把它们联合起来。以马先生生长在派别最多,门户最杂的西北,他能拨乱反正,使派别化除。”

马福祥一生戎马生涯,为国事南北奔走,在家乡河州居留的时间不多,但他工作过的西宁、宁夏、绥远、北平、安徽等地都有回族聚居,每到一处,都十分关注当地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宗教生活。他致力于伊斯兰教内部团结的做法得到回族中有识之士的支持和社会各界好评,马福祥主政的西宁地区,此地是回、汉、蒙、藏民族杂居之地,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公运筹边塞,良费苦心,而公之民族意识,亦于是增加。深知欲挽起回族颓势,厥在振兴宗教;欲提倡回民文化,扩充回族政治势力,厥在提倡回民教育;欲巩固回民经济,厥在倡导回民农工实业。故凡公足迹所经之处,若建筑礼拜

^① 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略》,见《甘肃文史》1989年第5期。

以六白金赎还义塾，俾修小寺，附于磨川大寺，不得如前立异，恧前以恧后也。此外如与我密(迹)之新庄、烟洞山，大兄达□□□王家堡，毗连之马家沟及先叔殿人公所居之梁家等处各修小寺，亦附于我大寺，汇流而归源也。将来族□发达，数十里内外或再推修小寺，应均归我大寺范围，翁受敷施也。凡我同人，五时礼拜，各就小寺；七日朝参，与开斋、宰牲两节大朝，统归磨川大寺，以副海一名义。合群事主，善莫大焉。幸勿自越藩篱，致披本枝。

此寺自先兄后多历年所，教众弥增，礼拜拥挤，亟须改建，显扬正教。光绪季年，祥镇湟中，即欲鳩工，限于财，志勿逮。民国三年，祥由宁夏将军因公回河，始属静庵兄及本坊乡老扩充寺宇，改建大殿及卷棚各五间，并加彩两廊十间，对庭七间，唤醒楼三间，大门三间，水房火房仓房共十余间，蜈蚣墙垣，东西牌坊及照壁各种工费约万余金。静庵兄及侄雄图、鸿宾、显图各捐千金，余由祥捐廉垫给，并未摊派乡人。且筹的款，多购公产，得租以供大寺之用，而诸小寺亦取给焉。详细款目及管理保存规则，另有碑记。

祥致力于此，非为名义，诚以人情易涣，不有以萃之，不足以成地方之社会。无以和众，何以参真？爰取本大末小之义，维系人心，以期能固能久，有萃无涣云尔。

一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二等宝先嘉禾章，特加上将衔，陆军中将、勳二位、宁夏护萃使马福祥谨撰。

一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上大夫，宁夏道道尹陈必淮谨书。

云亭将军重修导河县西乡韩家集磨川大礼拜寺工竣，作记勒石，嘱必淮书丹。枹罕故无好石，不能大书深刻，永垂久远，此碑以重价购自綏远，舟运宁夏，质坚韧，花纹回旋如大理石，允推佳品。必淮与将军(同)官久，习穆教源流，昔曾补授河州知州，于此寺创建始末，知之尤祥。今书此石，益叹将军

之保教睦族，用意致为深远；并以见创业之难，而继世之不易也。书既竟，为跋数语其后，以志景仰，并为(合)邑人众勛焉。必准谨跋。中华民国六年十月谷旦勒石。^①

马福祥对近代中国回族文化教育的巨大贡献，并不是表现在他有鸿篇巨著，或有什么高深的学术见解。他作为一个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中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团结了一大批回族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充分发挥回族知识界群体力量，为推动近现代回族文化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远见卓识和对回族文化教育的关心和热爱影响了许多人，其夫人马汝邨在他影响下创办近代史上第一所回族女子学校——新月女中。许多回族青年在他影响下来到西北，投入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假如没有马福祥的关心与支持，当时西北就不可能创办那么多清真学校，成达师范也不可能顺利迁平，在近代回族中最有影响的《月华》杂志也不可能创办，西北公学、上海伊斯兰师范能否维持下去并发展壮大也很难说……“历史是一门科学，它应该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的进程，指导现实的发展，预见未来的前景……一个人在小节上有疵疵，进程上有失误，但在历史发展中做出贡献者，历史不能遗忘他。”^②

纵观马福祥一生，为人沉稳，勤于学习，关心时政，能识大体，他不同于西北各旧军阀，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和爱国精神，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如英勇抗击八国联军，拥护民主革命，主张共和政体，致力于民族团结，都是他做出的历史贡献。马福祥宦迹甘、宁、青、绥、鲁、皖、京、沪等各省市，所到之处对地方建设，兴办教育多有建树，办了许多实事，这就使他成为近现代西北回族中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① 见张思温编著《积石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04页。

^② 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55页。

甚深,得知马福祥逝世消息时,正在乘舟游览太湖,在舟中撰哀诗九首:

一

至德为精一,至性为忠孝;
雍雍马将军,遗风存古道。

二

五载同尤患,论交迈前古;
西望玉门关,雄图谁与语。

三

相约共西游,君去予淹留;
去者得长乐,留者独长愁。

四

波旬与修罗,跋扈与东西;
伏魔功未竟,股折将何之。

五

望君君不见,惆怅独徘徊;
德音终难忘,悠悠心永怀。

六

遗书犹在笥,音容已渺茫;
追忆别时情,泪水沾衣裳。

七

有始无终,灵长之性,
与天地而永存,修短复何足论。

(天方教义,无始无终为神性,有始无终为人性,有始有终为物性,因借用其意,是与中国通义不同也。)

八

嗟余无父怅何之，况是恩勤未报时，
秋草新坟空洒泪，一来祭扫一哀悲。

忆 父 吟

客夏驻信阳，我病原非轻，
父自汉皋来，冒暑劳感并。
子病日可渐，父病又偶纒，
行经琉璃河，登仙骑长鲸。
此去成永诀，家运嗟不亨，
始知无父难，欲哭不成声。
惟有继父志，西征诗载赓，
银疆睹遗迹，德化洽边氓。
父歿口碑在，死哀生也荣，
子愧不成材，尤心常怦怦。
忆父生我时，爱博而恩宏，
忆父教我时，语语而择精。
有善导我迂，有过迫我更，
使我鉴覆辙，指我向前程。
音容今杳然，襟上泪痕盈，
迷津赖谁渡，时失赖谁评？
名利早淡泊，偕母隐归耕，
只以勤继述，退志不敢萌。
一年一纪念，哀泣奠两楹，
犹忆金台畔，秋草碧孤莹。

全国各地回民团体悼念活动

1932年9月10日,北平市各回民团体在北平市政府所属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追悼大会。会前曾开过三次筹备会议,确定会议主席团成员有候松泉,马振五(邻翼)、唐柯三、杨仲山,司仪赵文府,文书陈鹭洲、赵振武,记录为王农村、薛文波。一切准备就绪,不料9月10日大雨如注,参加追悼会之人数较之预定,虽为减少,但仍有千余名穆斯林群众和各界人士冒雨前来参加马福祥追悼大会,其中有北平四十几坊清真寺的阿訇教职人员,成达师范全体师生,西北公学教职员工及全体学生,北平伊斯兰学友会。回民职业团体有玉行、马行、驼行、羊行、菜行,总共有70余个团体。马鸿逵因病不能亲临,派十五路军总参议海啸云参加追悼会。上午8时追悼会宣布开始,大会主席候松泉先生首先讲话:

今天北平各回教团体,追悼马云亭先生,云亭先生生前致力于宗教与公益事业,处处留下好的痕迹。在北平对于回教社会方面,如建立学校,修建清真寺,所惠实多,我们以北平人之立场,不能不追悼他。所以由回教俱进会,召集各回教团体前来追悼,以表追念前贤之意。在云亭先生之归真,我有二感想:第一就是云亭先生之死,不但是我回教之不幸,在国民政府亦为不幸。因为在我们宗教上,缺一致力宗教及公益事业之一人,固然蒙最大损失,在国民政府亦缺一致力国家,斡旋和平之一人,亦当然为不幸。但是人虽无常,他所经营的好事业,仍然存在……第二就是关于云亭先生的葬仪,很值得我们钦佩,即简朴又合乎宗教。金钱并没少花费,但都施舍在穷人身上了……

孙燕翼先生致词如下：

一、马云亭能代表伊斯兰真精神，我宗教最要的意义，就是求安宁。中国连年内战，满目疮痍，先生南北奔走，苦口婆心，以求安定的意志来维持和平。看他对于各方面，消除误会，化除意见，很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先生所到之处，莫不以为他是一位慈祥老者，他这种精神，是不是伊斯兰真精神？二、马云亭先生不私不党，在我教，无论在何处，教派常常有纷争。在中国内部，尚差强人意，在云亭先生的家乡，就是西北方面，宗教派别太多了，标奇立新，不胜枚举。他们派别不同，绝不是教义的冲突，更不是教民互相的积怨，实在是各派各别都有背景，一般野心人来操纵。云亭先生，在宗教方面，从无一些分门立户的色彩，他把回教看作整个的。已分开的他把他们联合起来。以马先生生长在派别最多，门户最杂的西北，他能拨乱反正，使派别化除，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三、马云亭先生不隐灭宗教，在过去历史看来，表回教人，如果在政治与社会上，有一些地位，便立刻抛弃宗教。惟有马云亭先生，不隐灭宗教之精神，很使我们钦佩。在西北，教民宗教意识最为浓厚，在黄河流域的教民，对于宗教亦有相当之认识，惟有长江一带，教民较少，认识宗教，最为薄弱。云亭先生所到之处，毫不隐灭宗教，他对于任何人，都承认自己是回教人，旁人有怀疑的，有误会的，先生便析疑辩难，详为解释，使必达于心服而后止。四、先生之振兴回民教育，是先生看得最重要的，办得最有成绩的一种功业。在西北的河州、甘州、兰州、宁夏及绥远，皆有先生手创的回民学校，至于内地也所在皆是。若十七年成立的西北公学，由济南移至北平的成达师范，莫不由先生之筹划赞助。南方如上海伊斯兰师范，先生创立之功亦多。此外关于宗教事业，也是到一处，维持一处。表

记得有一件事，无妨和大家来说一说，上海清真寺，差不多都在华界，有一次，来了许多兵，便在各处礼拜寺门首贴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某军、某旅、某团驻”。本地回民恐慌极了，这件事叫云亭先生知道，便星夜派人于阻止。要知道此时，先生与该军毫无往来，硬往疏通。不料第二日，礼拜寺门首居然换了纸条，上面文字也换成“回教寺产，不得驻兵”。后来一切清真寺，都来曾驻兵。此时我们不能不追念他老先生的勋在青岛礼拜寺，该寺本是官产，市政府方面，常想收回放租。自云亭先生长青岛市以来，便把此寺看得很重。一方设法把标价减轻，一方自己捐款，再劝他人来捐，把寺产所有权，由官方移转到私有来，到如今，青岛教民莫不回思先生之功。所以在云亭先生，已兴办之宗教事业，我们不要中断。他还有已举意，尚未办理的有二：一、刊印清真丛书。我回教，关于教义教律以及汉字“克他布”，零片断简，所在多有，然毫无系统可言。云亭先生，欲搜罗众书，荟为一集，曰清真丛书，今云老已逝，然此关于我宗教至大，不可不使之搁置也。二、云亭先生意欲在北平、天津，设立工厂，作一工业策源地，使一般教民有所凭依，还有在西北有许多田地，云亭先生意欲把它划出一部分作农林策源地。

十五路军总参议海啸云也做了演讲，内容大致如下：

方才主席说马云老不隐灭宗教，这是云老一生最可钦佩之事，要知道，云老再要隐灭宗教，我们回教二百年的沉冤，更无处洗白了。有清以来，回教受的压迫很大，不曰“回匪”，即“回乱”，我们回教人不知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性命，故回教人在社会政治上有了相当地位，就不敢说自己是回回，不然，当真受人排挤，天下之不平，宁有甚于此者？……马云老

马福祥逝世的消息传到上海,8月26日,上海各清真寺在同一时间为马福祥举行诵经祈祷。9月4日上海回教学会举行追悼会,参加者有中国回教学会负责人,上海清真董事会,上海城内清真西寺、南寺、北寺,城外外国清真寺,上海伊斯兰经学研究社,上海敦化小学,回教孤儿教养所及上海穆斯林近千人前来参加追悼活动。上午10时,追悼会准时开始,由大会主席哈少甫报告开会宗旨及马福祥事略,哈德成教长用阿拉伯语致祷词,达浦生教长口译成汉语。追悼会上还宣读了一些上海回教团体寄送的唁文,文中皆称马福祥兴办回族教育,振兴伊斯兰教,刊印伊斯兰经书及立意翻译《古兰经》各要旨。最后由马醒东演说,下午1时追悼会圆满结束。追悼文谏词曰:

维山巍巍,公勳之垂;维水泱泱,公德之长。
公莅上海,振翼穆教;殷昌景铄,无光不曜。
殿宇明阳,公来拜颺;清真之寺,资公赞襄。
习礼厉贤,高馆照朗;学会仁施,道心运广。
曰伊斯兰,其艰其难;月供薪火,经训斯传。
茕茕孤儿,教养是赖;五十田顷,功德弥大。
公于教也,以言提斯;公于学也,以力护持。
纯懿密清,曷粹缘督;上通苍宰,下宏恩育。
思公不忘,感公逾伤;长城已失,吾道茫茫。
追悼不文,临哀静默;祝公脱离,诞登天国。

马福祥生前曾任安徽省主席,芜湖是安徽穆斯林聚居地之一,8月26日,芜湖回族穆斯林自发召开追悼大会,西湖清真寺客厅、讲经堂挂满挽幛、挽联,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各行各业职员臂缠黑纱,沐浴后进入大殿,由大会主席报告马福祥经历,会场内肃静无哗,至晡礼时,追悼会结束。

悼歌毕,全体来宾向马福祥遗像行三鞠躬礼,全城阿訇列行跪诵《古兰经》,至下午1时,追悼会圆满结束。

马福祥逝世后,除上述几个大城市召开追悼会之外,马福祥曾主政过的绥远及西北的银川、兰州、西宁和马福祥的家乡临夏等地均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许多清真寺连续多天展开为马福祥的诵经活动,全国各地回族群众对马福祥的逝世均表示深切地哀悼,对他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及边防建设,振兴回族文化教育,提高回族政治地位,维护回族宗教信仰方面所做出的功绩给予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像如此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的隆重悼念活动,在数百年的回族社会中也是少见的。

马福祥去逝已半个多世纪,在我们行将跨入21世纪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用新的历史视角重新审视马福祥生平活动和对现代回族文化教育的影响时,我们发现,他不仅仅是西北一支回族马家军阀势力崛起的奠基人,而是一个有政治头脑,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致力于国家和平统一的爱国者,同时也为发展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回族人物。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史学研究更多了一点实事求是的学风,片面性才少了一点。于是拨开重重历史迷雾,重新认识马福祥,公正地分析他的历史功过,正确地理解和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已成为人们的愿望和行动。历史评论,往往受着人们的历史观、社会观以及当时的政治斗争的需要等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然而,历史事实终归是客观存在的,“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随着我国史学研究逐渐摆脱左的影响,史学研究正在向着更深入、更全面的健康道路发展,从批判的史学观转移到根据历史实际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就要求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新审视,以确定他们在近现代回族史上应有的地位。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9页。

附一家训^①

宗法废而谱法兴。谱者，所以维持族类也，最重在教眼下有几种规模，胸中有几段道理，何患无行？是故诲人期于无倦，不厌详也。兹编分作明伦、治家、修己、涉世四门。惟古训以是式融经史而一之，文从部居，事引常行，情以感之，理以道之，不觉言之长矣。如曰立训忒繁，取法忒广，则自有说。震于百家之论，而不成一家之书，此自小也；限于一家之见，而不通百家之义，此自私也。私也，小也，抑君子所以自期耶？

明 伦

百行孝为先，五刑莫大于不孝。

不孝之由人自忽焉、不察焉耳：一曰逞骄，二曰习惯，三曰玩纵，四曰恃恩，未尝无真性。骄则忘恩而致怨，怨则积久而生嫌，渐见亲恩之少，益觉怨亲之深矣。清夜扪心，所宜猛省。勿谓亲心仁慈，我可自恕；勿谓世情浇薄，我犹胜人。正恐由小不孝而渐成大不孝也。

人子不孝而竟忘其为不孝者有七焉：父母爱惜过甚，常顺其性，骤而拂之，便违拗不从，甚至抵忤，一也。父母先事勤劳，听子安逸，偶令代劳做事，便多方推诿，二也。语言粗率惯父母前，亦直

① 按家训共四章乃云亭公所手订。

戇冲突，行动无礼惯，父母前亦傲慢放驰，三也。见同辈礼貌委和，见双亲则颜色阻滞；见妻子则情意蔼然，伴二尊则胸怀忧闷，四也。财入吾手，便为己财，而在父母者又谓吾当有之也。财足则忘亲，财乏则强求窃取于亲，不得遂意则怨亲。亲不能自养而寄食于子则厌亲。甚至独子而与亲争财，少长互推而弃亲不养，五也。恣情声色，二更三鼓，挑灯望归，不顾也；游戏赌钱，破荡财产，双亲忧郁成病，不顾也，六也。父母于兄弟姊妹或有私与，则怨亲偏党关防，争论无所不至，甚且成仇，七也。此皆不孝之成于习惯也。

初生时不带一钱来，自孩提至成人，百端需用，皆父母之财也。乃至分析，各听妻子言，争较财物，且谓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财皆当为我所独得，而兄弟不当有，并父母亦不当有者。噫，何其愚也！不孝可知矣。

诸子有独贫者，父母常怜而私之，此父母均一之心也。若使我贫，父母亦移此心于我矣，而众子以此怨亲，岂非不体亲心而造成其不孝乎？

父母之取厌于子孙者，亦有数种。一曰守迂阔：衣冠礼教老人家不合时，当思斑白之老，常在家门之幸，所宜爱敬者也。一曰惜物力：耄年人备尝艰苦，禁子滥用，当思为谁艰苦，日所食用，是谁所留也。一曰苦冠弱：起止不便，扶持维艰，当思欲报劬劳，养儿待老，正在此时。一曰偏爱憎：少子少女，推给衣食，不免偏护。当思爱及童仆，尚应体心，况我同气骨肉，谊应推分。倘于此处起一厌心，渐人不孝而不自知也。

世有四种父母待孝最甚，不孝则其罪亦最甚。一曰老，一曰病。父母壮盛时，食息起居，犹能自理，暂失顾养，尚克安然。乃至龙肿鹤立，扶杖易仆，寒热苦楚，伤风久病，遍体不适，遗溲丛秽席荐可憎。子所难奉者，惟此时，亲所赖子者，亦此时也。一曰鳏寡，老境失偶，寒暖谁问，形影相对，心话莫提，有孝顺儿孙颇能顾养，犹将冷意暂托热肠。不幸而祖我母我者，乘惯撒泼，翁我故我者，

横面阻绝。只护半点骨血，空博一生凄楚矣。一曰贫乏；抚字财匮，婚娶力竭，健少年经营肥暖，老穷人搔首踟躇，望一味面垂涎，丐三餐而忍气，夜灶晨炊，犹骂闲食，纺织抱孙，尚咒速死。此种罪曷有极？教孝者当于此吃紧云。

至于后母，而子更易遭不孝之名。非母之性皆好虐，而其子皆不孝也，后母于子分则亲面意多疏，子于后母意虽疏而分则尊。但妇人性愚多执，不曰恩而曰分，不能先施吾爱，为子者又曰“彼遇我寡恩”。上下分相争子恩与礼之间，而不慈不孝之端，由此而生矣。是在为子者常念从吾父者，吾母也，吾尽吾礼者，分也，岂论报施哉。有悍气戾性者，吾得以礼周旋之；礼不能动者，吾得以情孚之；情不能孚者，吾得以诚感之。敬之所以尽其礼也，顺之所以孚其情也，爱之所以致其诚也。子自托于骨肉，母有不以骨肉亲之者乎？夫世俗之变，子不得于母由于情伪而心疑。情伪则天性隔，心疑则间隙生。子母不协，妇姑逾睽。凡辞色、礼节、衣服、饮食、货财之类，皆足为生嫌起衅之端。果能小心以承之，无私以感之，至诚以格之，天下庶无不可事之继母也。

唇齿犹有齟齬，门内岂尽如意，亲生者虽有时呵让，或疏略久缺，过则忘矣。而异生者遂执以求备，展转不化，气色间不觉拂怒，纵百般调娱，不能如无事时也。事积一事，日甚一日，而家人构斗其间，即欲消遣而不能，暂时摆脱，触则复起，几忘其为母子矣。

双亲垂白而艰嗣孤嫠，青年而守志，不得已或以犹子称儿，或于本支立爱，或从襁褓相依。在嗣父嗣母，此生之命脉精神，已全属于承嗣之子矣。为人后者，割本生之爱，奉抚育之亲，绪妣祖而答恩勤，匪徒袭承桃之虚文，享承嗣之资产也。每因立继之后，情事易迁，聚顺偶乖，辄生嫌隙。更兼细人之媒孽，旁观之凯觎。为嗣子者，全在平日委曲周旋，以至诚相感，不得以一言不合而生携贰之心，不得以一事偶乖而怀怨望之志，不得以不属于毛不离于里而存“合则留，不合则去”之思。承欢膝下，情必倍于所生，尽哀尽

昔人谓父母以非理杀子，子不敢怨，其不敢怨者，盖以我本无身，自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然至于身受父母之杀，则平日之不能孝感父母可知矣。

昔王者合万国之欢心，以事先王，此语最妙。吾谓吾人亦当合一家之欢心，以事父母。古人亲在，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羊，正识得此意。

儿孙自有儿孙福，父母方知父母恩，孝莫辞劳，转眼便为人父母，善无望报，回头但看尔儿孙。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到极处，只是合当如此，着不得一毫感激。居功念头，如施者见为德，受者见为恩，便是路人，成市道矣。

孝道多端，总在“体”字上用心，即已弃养，犹当想像亲心，未毕之事而续成之，既无愧于生前，又无悔于身后，则孝近矣。

人子一生大事，其如送终，于此而不尽心，则无复可尽之心矣。

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是也；君子有终身之养，邱墓是也。

慈者，所以致孝之本也。每见人家尽有中才子弟，却有父母不慈，打人不孝一边。遇顽器而成底豫（由不欢乐至欢乐），大舜后能有几人？是故教孝亦当教慈。父之教子当于稍有知识时教之，勿伤生物，以养其仁。教之致敬尊长以养其礼，教之言笑不苟以养其信。稍有不合，即当正言以谕之，不必暴戾鞭扑，以伤其忍。

幼子最戒轻肥。幼而轻肥，费亦无多。父母最易骄养其子，侈心从此起矣。他日不给，服粗茹淡，遂觉难堪。

子弟少年无论士、农、工、贾，各报一业，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习世务，谙练人情，长进学识，这便是大利益。若任其游闲，终成废人，是送了穷贫道路。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此亦不过奖诱幼学之言，若信以为真，便眼空一世，非远大器所宜，是在贤父兄之教诲耳。

教子弟只是令他读书，他有圣贤几句话在胸中，有时借圣贤语

教他行，开导之，他便易有省悟处。

庠序之子，亦多败行，遂启薄视读书之心矣。不知攻浮文以资进取，得志斯淫，失志斯滥，彼固非真读圣贤书者。因噎废食，可乎？夫诗书虽误人，而未必终误人，误者自误耳，诗书不任其咎也。

教子须自以身率先。每见人家子弟，虽未尝着意督率，而规模动静，酷肖其父母，身教为之也。念及此，岂可不知自省！

子弟须令不失故家风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实，信其所当信，耻其所当耻。待人不敢有虚骄之气，遇事不敢有容易之心。虽造诣自有浅深，规模各有大小，要皆君子路上人也。君子路上人多，培得几辈世家，安得不绵长？《正蒙》云：“子孙贤，族将大。”

隐恶扬善，他人且然，自家子弟之失，逢人告诉，且又增饰，使彼遂成不肖之名，于心忍乎？长善救失，故人乐有贤父兄也。

败家子有两种：游荡赌博，骄奢淫佚，耗弃祖父之货财者，败其门也，此则愚顽不读书之子弟为之；妨贤病国，罔上行私，贪赂肥家，害人利己，辱没祖父之名节者，此则聪慧读书子弟为之。

人情于子弟，钝鲁则憎恶之，俊敏则爱惜之，不知钝鲁者犹不敢有悖慢之心，或可免有狂妄之行。惟俊敏慧巧者，才足济恶，贵益长傲，人以为可喜，我正以为可忧也。倘不预加防检，禁绝浮夸，则傲诞之气渐长，谦逊之意绝无。溺爱过甚，人皆从旁窃笑，而进见时反加浮誉，谁肯于贵人前而言其子孙之不肖？是虽弥天之恶，祖父既不觉察，母氏或又曲护其短。是故党群小以凌人，饰浮伪以败词，颠倒事理，曲庇犯法。即因家世余绪可得一官，而从情败检，既乖家训，必干国法。故共叔（即郑庄公之弟，共叔段）之死，母实杀之；赵王之戮，父宝使之也。

父母之下，尚得容其骄；兄弟之间，实难容其傲。

仁人之子弟，不敢曰无怒、无怨，而曰不藏怒、不宿怨，正恐猜嫌有种浸人，半句消咽不下，遂至横决矣。

人情最不可解者，兄弟之间，一富一贫，一贵一贱，顿起嫉忌。

而有自得之休，故人乐有良师也。

一族之人，有贤，有不孝，当体祖宗均爱之心，不可有取舍之见存也。贤者敬而礼之，不肖者亦无失其亲焉。

聚族而居，牲畜之侵害，童仆之争斗，言语之相角，行事之错误，势不能免。惟在以心休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责人。若不慎小忿，遂生嗔怒，必至仇仇相寻，终无了日矣。

富贵之家，常有穷亲戚来往，不戏虐父执贫交，能礼遇破衣亲友，自足称厚道矣。

治 家

齐家较难于治国；国家诸事，皆有法度可守。士庶之家，苟不讲明古制，即欲教家，而无其具。是惟导之以经史典故，惕之以法律报应，四季集长幼讲贯，习闻既久，即愚昧亦有所知，桀傲者将渐变而循良矣。

我辈动谈经济，且看他在家中设施布置如何。近处不能感动，未有能及远者；小处不能调理，未有能治大者；亲者不能联属，未有能络疏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备，未有能养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规矩，未有能化及他人者。

家长为一家观瞻，我能勤，众何敢惰？我能俭，众何敢奢？我能公，众何敢私？我能诚，众何敢伪？上行下效，自然之理也。即有不率，亦当尽其在我者。

门内罕闻嬉笑怒骂，家范可知；座右多书名论格言，志趣可想。

凡人须有宽和之气，处家亦须有宽和之气，此是阳春景象，百物由此生长。若一向刻急烦细，虽所执未为不是，不免秋杀气象，百物随以凋殒。

家和万事兴，阴阳和而后雨泽降，夫妇和而后家道成，此和气之所以致祥也。夫妇不和奴婢欺，兄弟不和邻居欺，此乖气之所以

易之，则将结不可解之怨矣。听言者正须达此机。

兄弟同居，美事也。其间有一人早亡，诸父子于子侄，其爱稍疏，其心不齐，长而欺瞒其幼者有之，幼而悖慢其长者有之，交争相嫉，其甚于路人者矣。同居之不美，固不若分居之反为美也。

人家分析，不宜太早，亦不宜太迟。太早则恐少年不知艰难，浪费致败；太迟则事变多端。一人掌管不到，一应服食，人人取盈，每无体贴之心。稍有高低，则比例陈情，甚有明知家道渐衰，而取用如常。目睹家务就废，而委之僮仆，且任其暗窃，亦不提防。若不分析，立见其败矣。

人家最不可养闲汉出入，人口虽多，各有事做，不特自食其力，省费不少，且免其闲暇为非。

用仆用拙勿用巧，用老成勿用俊少。老拙者虽不能便捷，亦不至坏事。家无狡童，不惟省己防闲，且免人疑议。

婢仆虽贱，亦须养其耻。频骂频责，虽辱不耻。廉耻既无，不可用矣。

司灶仆夫最为可怜，酷暑则炙砖薰蒸，汗如雨下，刻期供箸，难偷一瞬之凉；隆冬则敲冰汲水，淘米洗菜，渗人心骨。享用子弟，勿视饔飧之易，当知服役之劳。

官仆入市买办，人多避匿，何也？盖仆欲有所染指，自不得不腴于人。岂知小民斗粟、尺布、针头削铁，要养一家性命，我却在他身上讨便宜，所得几何？顾令人当面咨嗟，背后讥议耳。

张安世家僮数十人，皆有技业；虞宗治家，亦使奴仆无游手，此缙绅之最有家法者也。至邓禹位极侯王，有子十三人，亦令各习一业。正恐空闲放荡，一旦爵除禄去，便无以资身矣。贤者之治家，谋何远也！

治家人生产，非必如今人封殖，只是调理得停当，使一家衣食无缺，自不至轻易求人，轻为非理之事。然后可立定脚跟，向上做人。

豪桀之士，往往以衣食不足，不矜细行，因而丧其生平者多矣。许鲁齐谓学者以治生为急，司马温公每问士大夫生计足否，正此意也。

居贫之家，惟有勤劳刻苦，守本业，以经营足食之路，当以穷乃益坚自励。勿妄想、勿妄求，妄想坏心术，妄求丧廉耻。贫穷，命也，奚足为忧？所忧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亲耳。

起家之人虽富遮，而日夜忧惧虑，不免于饥寒。破家之子，虽生事日消，而轩昂自恣，谓不复可虑。所谓吉人凶则吉，凶人吉则凶，此也。

天地间有盛必有衰。富之后，甚可危也。是故行能加勤，谨小惧微，能持盈保泰，即是君子路上人。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夏禹，圣人也，寸阴是惜。况吾辈乎，有国有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惰而衰者。

起万事于积废，图富有以日新。功崇惟志，广业惟勤。有振作之气者，天不能穷，是故人贵自立耳。

精神不运则愚，血脉不运则病。是故君子习劳，盖晏安鸩毒，不可怀也。

罗景纶先生曰：“农夫昼则力耕，夜则頹然甘寝，故淫念不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勤可以远淫邪矣。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论文王之寿，归之“无逸”，则勤可以益元寿矣。

范文正公每夜寝，即自计日间所为之事与饮食奉养之费，果能相称则熟寐；若无益己利人之事，则终夜不能安，明日必思有以补之者，可为自课之法。

晨起，天地清旭，神新气爽，及时为事，倍觉有味。此时一失，亦倍觉可惜。

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童则垢面，婢则蓬头，庭除不扫，灶突犹寒，成何景象！况家长晏起，防管无人，家多隙漏，子侄奴仆

人家当其盛时，每一婚嫁丧葬，辄费千百金。及至衰落，遇此等事，即数十金、数金亦可敷衍发脱。可见丰俭原在乎人，纵使豪华满眼，不过一瞬。虚名有何实济？

嫁娶一节，度德量力可耳。奢靡之习，每伤元气。古诗云：“婚姻几见斗奢华，金屋银屏众口夸，转眼十年人事变，妆奁卖与别人家。”此意殊有深致。

世有婚嫁而卖产者，噫，愚甚矣！有男女自有婚嫁，亦以量吾家耳，奈何鬻累世仰事俯畜之具，以侈一时之华？岂既婚之后，可不食不衣乎？

刘忠宣公将娶妇，或传妇家以罗为幔，愀然曰：“罗绮岂可帷幔哉？吾家清俭，安得乱吾家法？”不许持至。又曰：“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馈送礼物，贵于适用，亦免糜费暴殄之过，否则竟用仪函。丰俭随人，受者款之，不受璧之，彼此两便，交接可久之道耳。

庆吊以诚为主。世俗浮奢，不足循也。称物以施，亲亲有杀，尊贤有等，礼也；量力而行，富而怯财，贫而求备，非礼也。

富贵受贫贱人礼，以为当然，殊不知几费设处而来，即一扇一丝宜从厚速答。

俭与慳别也，当于礼之谓俭，吝于财之谓慳。乞丐呼号不施，婢仆饥寒不惜，三党困苦有求不赈，百般利济有募不应者，慳也。盖俭者用财不过，则之谓非无良。残忍，只知有财，而不用之谓也。

钱财不可不惜，亦不可刻，我能宽一分，则人受一分之惠。如小本生理，肩挑负贩，全为养家活口，倍当优恤。在我毫厘之宽，所去有限，彼得一厘一文，所喜无穷矣。

俗子每好建寺烧香，自谓功德，殊不知寺不建，佛不必露处；香不烧，佛不必饥寒。若移此费以济人之穷，佛倘有灵，自必大悦，福报当百倍也。

市中甘肥之物，一二家不可买尽，须留些于众家一尝，方有滋

金边有戈，禾边有刀。君子见利防害，所以安身而立命也。

积财可以避患，患亦生于多财，孰若少财而无患也。

财者，天下之财也，流通之物，专之不祥。故其聚也以贪吝；其散也，避祸殃？与其祸散也。以累吾身，孰若善散也，是以积吾德乎？

“奸利”二字，所指甚广。凡非本分中事，皆奸利也。谚云：“越奸越巧越贫穷，奸巧原来天不容。”斯言其近道矣。

只为一点贪心，造出无端罪恶，转盼之间，天灾人祸，害且莫测，则亦何利之有？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墨子曰：“非无足财也，无足心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积厚之家，其害有十：一则审编屈指，加以重徭；二则贪墨垂涎，罹以他罪；三则为盗贼所睥睨，性命不能自必；四则乡邻嫉妒，幸其灾而乐其祸；五则为士君子所鄙，羞其俗而笑其浊；六则为天道所忌，恶其吝而害其奢；七则为子孙殃，益其过而损其志；八则为乱世之虞，弃之不忍，携之不能；九则为此身之累，日筹算而夜烦劳；十则为临死牵心，恐子孙不能保守。

人生适意事有三：曰富，曰贵，曰多子孙。然是三者，善处之则为福，不善处之则为累也。夫位高者责备之地，怨尤之府也。利害之关，忧患之场，谤讪之的。有荣则必有辱，有得则必有失，有进则必有退，有亲则必有疏。惟使己无大谴过，而外来者平淡视之，此处贵之道也。厚积者则必有亲疏之请求、贫穷之怨望、童仆之奸骗、穿窬之鼠窃、盗贼之劫掠、经商之亏折、行路之失脱、田禾之灾伤、攘夺之争讼、子弟之浪费，种种之苦。贫者不知，富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为累，则取之当廉，而不必厚积以招怨；视之当淡，而不必深恃以累心。我既有此财货，彼贫穷者不取我而取谁？俭于居身，裕于接物，薄于取利，而谨于厚藏，此处富之道也。至于子孙之累尤多，少小则有疾病之虑，稍长则有功名之虑，浮奢不善治

病也。

天地间人与万物都是与草木同腐，惟忠孝、节义、道德、文章卓然与乾坤并存不朽。奈何只争一时之名利，而不思不朽之事也？

浮气一动，只责此志便不浮；怠心以生，只责此志便不怠。以及侈心、躁心、矜心、忿心、贪心、吝心，只责此志，一切皆消。故君子无一息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处非立志责志之地。

吾人在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作人道理，只看经典便是，从古圣贤豪杰，只于见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万古不可磨灭。

读书见一件好事，则便思量我将来必定要行，见一件不好事，则便思量我将来必定要戒；见一个好人，必定要学他，见一个不好人，则将来定勿效他。如此自省，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苟，便为天下第一等人矣。

看古今文字，立意求其佳处，则竟得其佳；立意求其疵处，则亦染其疵。君子于人之善恶亦然，故取长略短，道必日益。

陈士贤遇格言即手录于册，以为力行之助。胡康侯性稍峻，凡书有宽者即录之。吕东莱性亦隘，读《论语》至“躬自厚”节，遂悟从缓。三先生皆自知质性未纯，而善变者。如此读书，方算得变化气质。

释氏以意见为障碍，象山诸儒多附和之。予谓意见所伤，私见偏见不可有。若诚意，真见安可无？无诚意真见，何以为学，何以为人也？

凡议论，非讽刺亦非空言，偶有见闻感触，利害不眩于前，是非易于著见，一切回护迁就，胸次尽无。或商榷身心，或辩难经史，或区处政教，或匡正事体，自是详悉稳当。若论之久，记之熟，应事时种种义理相逼而来，大小常变，皆可从容应之，事有成绩，过人远矣。

王鉴明先生曰：“功名心须是放淡。”问：“何以能淡？”曰：“只是

安个命字，命字上再加个义字。”

凡事物之际，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义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归之义命而已。

顾泾阳先生曰：“就义上看，男儿七尺之躯，顶天立地，如何向人开口道个求字。孟子《齐人》一章，便是这个字的形状。”至今读之，尚为汗颜，不可作等闲观也。就命上看，人生穷达利钝，即堕地一刻，都已定下了，如何增损得一些子。若富贵可求，那不会求的，便没有分，造化亦炎凉矣。就分上看，但在自家志向如何，若肯刻苦读书，到得工夫透澈，即功名亦自不难。若肯寻向上去，要做个人，布衣自成大儒，即功名亦自无用。苟能识得此数层道理，省多少闲心肠，省多少闲气力，省多少闲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

寒微之家有骤兴者，必是先世积有阴德，而自己心地好，志气好，所以能有今日。世人以为骤，而不知先世之积德非一日矣。若视为今日骤起，回忆先世苦寒。今日思量报某仇，明日思量快某忿，乡里侧目，则元气损伤，立见其瘁矣。

人生宫室、车马、衣服、饮食、童仆、器用，事事要整齐华丽，稍不及人，便自愧耻。这是一副俗心肠、低见识。你看老成君子，外物皆不及人，却学问强于人，才识强于人，存心制行强于人，功业文章强于人。较量起来，那个该愧耻。

有学问人如山蕴玉，如渊藏珠，虽不现出，而精彩自然光润。从来成事业者，未有不从学问中做出来也。

士君子尽心利济，使海内人少他不得，则天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人生宜立大规模，具大识见，不可沾沾焉，贪目前安卑。朱子曰：“天下事坏于懒与私。”最切中今之弊。懒则不肯勤励，学殖荒而志气亦堕；私则至亲间尚分畛域，有私心尚望其有气识，有所建立哉？

自来拂意之事，自不读书者处之，只见为我所独遭，怨尤日积，

宁过于周密；有一烦恼至极人，我宁过于简易；有一贪淫至极人，我宁过于廉正；有一放肆至极人，我宁过于谨慎；有一浮躁轻薄至极人，我宁过于谦厚。正须矫枉过正，乃为得中，如此方能全身远祸，并可解此人于厄。

遇疾恶太严之人，不可轻易在他前道人短处，此便是烧油人火，其害与助恶一般。

或曰：与倾险人处甚有害，吾谓正有益。盖使人言语动作，一毫轻易不得，岂惟过失可少，于敬之工夫，亦觉有增。

谦字、谄字，本大悬绝。今人多把谦字看作谄字，谄字看作谦字，不知敬德礼贤，谦也。趋焰慕势，谄也。此处看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坏。

凡人皆不可侮，无用人尤不可侮。盖无用人无势力，无才智，天至此也穷了，惟天穷而无处，则天必深怜悯他。世间千人万人，遇著无告之人，便惻然动心，此便是天心可见处。天怜悯他，我反欺侮他，便是得罪于天。

君子不迫人于险。当人危急之时，操纵在我，宽一分则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鸟穷则攫，兽穷则搏，反噬之祸，将不可救。

锄奸杜恶，要放一条去路，若使之一无所容，譬如防川，尽绝其流，则堤岸必溃矣。

韩魏公谓：“小人不必远求，三家村里便有一人。知其为小人，以小人处之，如与之相较，则自小矣。且不必三家也，兄弟四五人中，便有一小人，安得有许多闲气与之相较？”此最识得透者也。

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鄙。观人者看其口中所许可者多，则知德之厚矣；看其口中所未满者多，则知德之薄矣。

老成之人言近迂阔，而更事已多，情理自透。后生虽天质聪明，而见识终有弗及。迨年长阔事已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险阻备尝之后矣。

人宜近君子而远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长厚端谦，此言先入于吾心，及乎临事，自然出于长厚端谦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华，此言先入于吾心，及乎临事，自然出于刻薄浮华矣。且如日近气矜者，自尚气矜；日近游荡者，自习游荡。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渐染之患。

观富贵人当观其气概，如温厚和平，则荣必久，而其后必昌；观贫贱人当观其度量，如宽宏坦荡，则其富必臻，而其家必裕。

周全人争辩事，必期于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谅，只以至诚动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肉间，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慎之。

局外而瞥人短长，吹毛索垢，不留些子余地，试以己当其局，未必能及其万一。故曰：“在古人之后议古人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

责得人深者必自恕，责得己深者必薄责于人，自责以至于圣贤地步，何暇有工夫责人？

待己者当从无过中求有过，非独德进，亦且免患；待人者当从有过中求无过，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忠信笃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后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未尽而以责人，人亦以此责我矣。然在己者既尽，在人亦不必深责矣。必欲责之，亦非有容德者，祇益贻怨于人耳。

讦人之短，攻发人隐私，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不以乐受而心感之乎！凡朋侪问难，纵有浅近粗疏，或露才扬己，只因病而药之可耳，若遽怀鄙薄之意，非君子与人为善之心矣。

一友常易动声责人，阳明先生警之曰：“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人不是，不见己非，何益？”惟能反己，方知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舜能化象，其机只在不见象之不是，若舜见得象不是，要力正他好恶，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彼此讲论，务要平心易气，即有不合，亦当再加详思，虚己商

附二 马福祥年谱

马福祥,字云亭,回族,1876年正月初十日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城西韩家集。曾祖玉玺,祖泰。父千龄,字松坪,号建成。千龄原配王氏,生长子福财,续配马氏,生次子福禄,三配韩氏,生福祥,四配马氏,生福寿。

1881年

入清真寺诵习《古兰经》。

1883年

入私塾读书

1891年

随兄长马福禄习武,韩夫人正色道:“儿挽两石弓何如识一丁?武达文不达而非通才也”。马福祥白天习武,晚上用功读书,韩夫人色乃解。

1893年

马千龄择同乡马载德与福祥完婚,同年福祥与兄福寿同游武庠。

1895年

4月,河湟事变爆发,清廷兵力不足,为镇压事变,飞檄甘肃各地,准回绅招兵买马,“练士勇以资防卫”。马福祥与兄长福禄征得父亲同意后,在亲族中招募士勇二百名,取名“安宁军”,分步骑两营,马福祥为骑兵管带,前往镇压。起事回民以马福祥兄弟“助官军,戮同教”,纵火烧毁阳洼山马福祥家宅。10月,董福祥率30营

充装备、整训后,改名为“志胜军”,取消甘军番号,任命马福祥为统帅,担任官禁警卫及北轘周围防务。

1901年

当年9月,《辛丑条约》签定,清廷与八国联军达成协议和,议和有一条,不许甘军进驻北京。马福祥护驾两宫返京,至河北正定火车站,将扈驾重任交与袁世凯,自己率志胜军回西北。

1903年

马福祥应甘肃学台杨增新之请,协助地方兴办教育。之后赴任靖远协副将。

1904年

任甘肃庄浪镇协。

1905年

出任兰州中协协台武职。

1906年

任西宁镇总兵,出面调解十三世班禅与塔尔寺主持阿嘉图克图之间冲突。旋遥领阿尔泰护军使。

1907年

出任西宁矿务局总办,主持开矿工作。

1909年

甘肃总督升允实行新的军队编制,成立马步四标,马福祥任步兵第二标标统。

1910年

亲往甘肃临洮下八沟处理藏民抢劫洮州商民财物案。

1911年

3月凉州(今甘肃武威)会党起义反清,马福祥率部驰往凉州弹压。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陕西革命党人响应起义,建立陕西革命军政府,甘肃封建官僚聚集反革命力量,准备围剿陕西革命,并对原有的甘肃武装进行改编调整,马福祥任昭武军统领。诸将

会集,商计进军陕西事宜,马福祥认为“今日之事,惟保境安民为上策”。由于马福祥的消极态度,长庚命马福祥率昭武军驻守兰州。

1912年

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马福祥与王之佐、水梓、慕寿祺、周学务等30余人组成甘肃省临时议会,主张承认共和。6月7日,马福祥出面与黄钺领导的秦州“甘肃临时军政府”签订《和平解决条约》,秦州军临时政府宣布取消。7月,赵维熙再次任命马福祥为西宁镇总兵,因马安良竭力反对,改任为宁夏镇总兵。8月,马福祥率昭武军步骑13营约3000人赴宁夏就任。

1913年

6月,在内蒙古汇德城智擒分裂祖国活动的旺丹尼玛。之后进京向袁世凯述职。袁为马母韩夫人题写“萱闹春永”四字以贺寿。

1915年

与扰后套及宁夏一带会匪弓占元激战于狼山一带,并击毙悍匪弓占元、包永华。

1916年

白彦公、金占奎纠合各股悍匪进犯五原,被马福祥、马鸿宾击败。民国总统黎元洪授马福祥勋四位证。

1917年

经过几次围剿,河套会匪基本肃清,并于贺兰山中擒获伪皇达尔六吉。民国总统冯国璋授马福祥勋三位证。同年马福祥在宁夏设立“蒙回教育劝导所”,用种种方法鼓励回族子弟上学读书。

1918年

马福祥自捐及募筹资金数万元,在银川创设“蒙回师范学校”,马福祥在宁夏护军使任8年,先后捐资创立高初级清真小学60余所。

1919年

马福祥回临夏,途经兰州,得知几位回学生生活困难,需要资

玉祥为在西北争夺地盘,调自己部下李钟鸣旅长为绥远都统,调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

1925年

冯玉祥为削弱甘肃回族诸马实力,电调甘肃所属西宁马麒,凉州马廷襄力,宁夏马鸿宾各出一旅赴绥远参战,并任命马福祥为师长,统帅三个骑兵旅,与张作霖作战。因三个旅分头行动,马福祥的师长也是徒有其名。

1926年

段祺瑞任命马福祥为“航空督办”,驻节山西平地泉(今山西丰镇)。

1927年

马福祥移居天津、北京,潜心钻研伊斯兰经典,先后捐资刊印王岱舆所著《希真正答》和马注的《清真指南》,并为之作序。主修的《朔方道志》出版,并仿曾国藩家书撰《训诫子侄书》,刊印《昭元秘诀》。并南下投靠蒋介石,向蒋介石陈述统一安定北方大计。

192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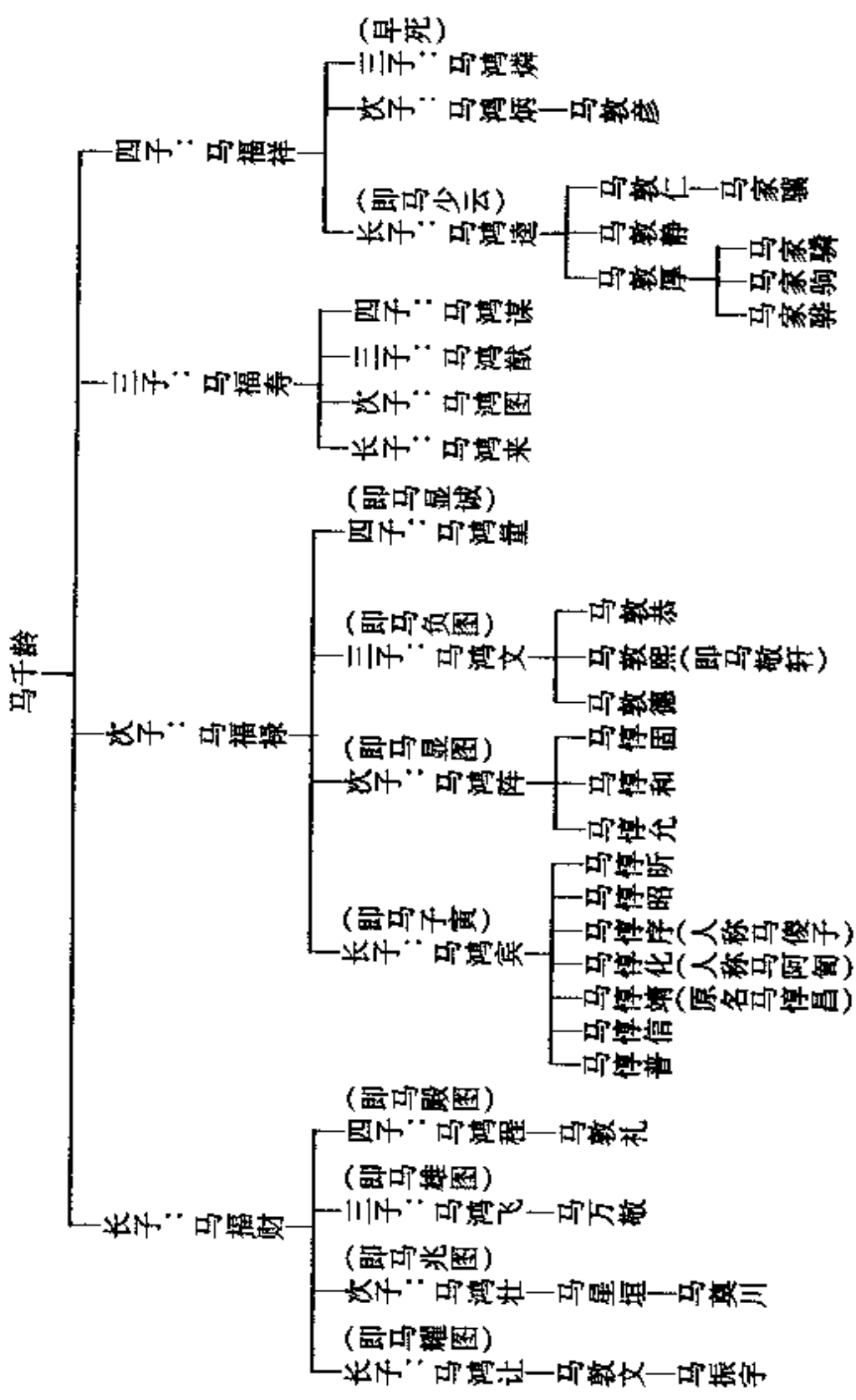
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马福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夏,“河州事变”发生,马福祥力劝马仲英悔过息兵,遭马仲英拒绝,马福祥河州老家被马仲英放火烧毁。不久,马福祥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北平、开封政治分会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赈务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编遣委员会委员。当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利害冲突,勾心斗角,马福祥奔走三方之间,纵横捭阖,人称“和事老”。9月,马福祥与白崇禧等回族上层人士在北平创立清真中学,马任董事长,越二年改为西北公学,参与筹建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

1929年

在马福祥支持下,成达师范迁到北平,与马振五、唐柯三等发起创办《月华》杂志,给西安回教公会捐助教育费2000元,创办女

南效琉璃河车站，忽痰喘发作，于当日晚 9 时 45 分去世，终年 57 岁。次日葬于北平三里河回民公墓。国民政府及各地各界回民群众以不同方式举行隆重悼念活动。

附三 马福祥家族世系表



发生了,那时冯玉祥和政府军作战,而原隶冯玉祥部马少云将军的倾向政府和冯部的程兴民师和庞炳勋师有了一次战役。

我们教导团全部被程师所俘,我逃脱而去,就一直回到了南京。

再遇到马云亭将军,他依然是那样慈祥而亲切,他听到我愿意到国外继续读军事,便叫我赶快补习德、日文,好将我保送出去。那时我和万治已失去联络,只得一个人在上海读外国文。

不久,马将军就在河南良乡火车旅行车中风,永不再回到人间了。

当马将军在北平安葬,我恰巧也在那面,在报子胡同他的公馆里瞻仰他的遗像,心中有说不出的凄凉。那凄凉不是一个后进对先进的知遇之感,而是对整个宗教和国家兴起的。

马将军的令兄福祿将军在八国联军之役阵亡,他便袭了官爵继续为国效劳,慈禧太后非常嘉奖他的劳绩。往后他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航空督办,无不恪尽本分,博得各方面的好评。他是清代的武举人,可是国学和宗教学造诣极深,能写很好的字、做很好的文章。他的诗集《磨盾余墨》也是音节铿锵、灵感丰富的,他曾大量地捐印伊斯兰书籍,大量地捐助兴修清真寺,栽培了无数的教内外清寒学子,他私人办的小学有64所之多。

为了国内各巨头政见的分歧,马将军曾不辞辛劳,到处奔走呼号和平统一,他的美德嘉行和远见诚然是罕有的。

我曾遇到许多穆民和非穆民的青年,他们只要是认识马将军的,都受过他的鼓励和资助,他的博大的胸襟,他对人才的珍惜,在许多要人显贵之间,我还没有发现能和马将军相伯仲的。

马云亭将军无疑是西北的光荣、伊斯兰的祥瑞,可惜他离开世间太早了,未能尽他可能的贡献,在全国兵荒马乱的今日,在穆斯林百废待兴的今日,假使马将军还健在,他将怎样地焦虑,怎样地努力呢?

(原载《西北通讯》1947年第2卷第8期)

安葬。我们在三里河清真寺院内发现马福祥生前所立的两方石碑尚保存完好,一方为马福祥于民国 12 年所立,碑名为《王岱舆先生墓碑记》,北面刻有刘智的《五更月歌》,另一方为《清封一品夫人马夫人墓表》,是马福祥民国 14 年为三夫人马韵兰所立。同年 8 月 10 日,我又专程赴甘肃临夏韩集阳洼山马福祥故乡,拜谒马福祥、马福祿陵墓,考察了其家宅遗址、海一清真大寺及云亭中学。临夏马东先生和兰州海大宏先生给我提供了他们收藏马福祥手写草书“虎”字及对联照片,他们认为马福祥是近现代西北回族中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此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我的尊师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杨怀中先生,原宁夏社会科学院院长、现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余振贵先生的鼓励与支持。宁夏区党委统战部李岚副部长在百忙中为此书作序,我的学兄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所长马平副研究员给了我很多支持,学弟李有智对《家训》做了细致的校勘工作,我的妻子李红梅也给了许多帮助,创造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同时非常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李树江先生及政史编辑室何志明先生对此书的厚爱,使之能够顺利出版。当然,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00 年 8 月 24 日

